

周恩来

烽火东南行

龙彼德 著



此日中兵接越日相期能渡吹我信
徽信英军军成速势坚故忘士乳

扬成改区，老英雄中华件文虎

大星

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
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

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

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周恩来烽火东南行

一烽火连三月

1937年12月24日，浙江省会杭州沦陷。接任不到二十天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于前一天的晚上离开杭州，沿公路线过桐庐、建德，向兰谿、金华方面转移。也就在这一天晚上，钱塘江大桥被炸毁，全市停水、停电，全城五十多万人中有近二十万人被迫疏散、逃难。

国破家亡，到处是一片兵慌马乱景象。

随着“嘎”的一声，前面的大卡车停住了，黄绍竑乘坐的轿车不得不来了个急刹车，把坐在后座上闭目养神的黄绍竑弹起来，额头重重地撞在车篷上。

“你没事吧？”坐在旁边的黄夫人蔡凤珍关切地问道，同时伸过手来摸摸丈夫的额头。

“我没事。”黄绍竑拍了拍妻子的手背，感激地说，他整了整风纪扣，对前座叫道，“陈副官，到前面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了？”

少尉副官陈亦南连忙推开车门，向前跑去。

前面公路中间围着一大堆人，一个瘸腿老汉倒在地上，一对年轻夫妇正搀扶着他慢慢坐起身来。

开大卡车的司机就站在他们的跟前，破口大骂：“老不死的，你眼睛瞎啦？也不看看这是谁的车队，就懵懵懂懂横穿马路！你丢了老命不要紧，耽误了我们长官的公务，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那年轻丈夫不服气地顶道：“什么责任不责任，大家都在逃难，犯不着吹胡子瞪眼睛的。”

站在旁边的一位商人提醒道：“他们是省政府车队，得罪不起的，年轻人千万不要使性子。”

那年轻妻子更火爆，接嘴道：“省政府车队有什么了不起，有本事的话跟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干一场，何必当缩头乌龟到后方来跟老百姓撒气！”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瘸腿老人可吓坏了，连连摇手道：“先生，夫人，快别说了，全是我不对。我一听车笛就懵了，辨不清方向，本来是靠边站却错成横穿马路，阻塞交通……我向这位老总陪罪了。”

而司机老总却不依，指着那对夫妇的鼻子，跳脚吼道：“你们好大的胆子，敢骂我们黄主席是缩头乌龟，老子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们，就是我姑娘养的……”他返身从驾驶室里拿出一根摇杠就要揍人。

“你想干什么？”陈亦南急忙上前，加以阻拦。

“哦，陈副官，这两个出言不逊，诬蔑党国，我猜他们八成是共匪……”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共匪’、‘共匪’的，小心破坏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局面，你小子吃不了也得兜着走！”

“他们骂人，也不管吗？”

“算了！”

“好，我听陈副官的。”司机说罢，便钻进了大卡车的驾驶室。

陈亦南转向那位瘸腿老人，亲切地问：“老先生，请问仙乡何处，府上哪里？”

老人这时已站起来，回答道：“鄙人祖籍杭州，家住十五奎巷。由于躲日本鬼子，走得匆忙，与家人失散了。”

“原来这二位不是你的儿子、媳妇。”

那年轻的丈夫接口道：“我们是上海人，从嘉兴方面逃难过来的。请问这位副官。为什么你们浙江省政府也不抵抗，就把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拱手让给日本鬼子呢？”

陈亦南说：“不是我们不抵抗，而是整个战局所致、战略所需。我们黄主席是主张抗日的。今年他在山西就指挥过与日本鬼子的战斗。打过几场硬仗。这次奉调浙江不久，刚刚跟朱家骅朱主席办完接交手续，还来不及部署。请相信，我们会收复杭州，收复失地的。”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老百姓就放心了。”瘸腿老人和那对夫妻异口同声地说。

遣散了逃难的人群，疏通了前进的道路，陈亦南回身向轿车走去。他发现黄绍竑夫妇正站在车前，向他微笑。

“钧座，情况是这样的——”陈亦南开口就要汇报。

黄绍竑摇了摇手：“我都知道了，你回答得很好，对民众我们就是要积极做工作。”

车队启动之后，黄绍竑靠在后座的软垫上，又陷入了沉思。

黄绍竑两次主浙。第一次是在1934年冬至1936年冬。由于浙江是蒋介石的故乡，又是国民党内部C·C与复兴社两大派系倾轧的大本营，作为桂系四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处在蒋桂之间的矛盾冲突中，经常受到C·C与复兴社两派的进攻与包围。别看这两派平时争风吃醋，相互排挤，纠葛不断，可在对付外来官员特别是桂系方面，却能联合一致，“同仇敌忾”，致使黄绍竑有抱负也无法施展。反被攻击调离，而将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交给了C·C健将朱家骅。第二次就是这一次，由于抗战爆发，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浙西沦为战区，南京势将不守，蒋介石对浙江的控制已大大放松，这对黄绍竑来说正是大好时机。所以。当浙江省主席朱家骅呈请辞职，蒋介石又要黄绍竑去浙江主事，黄便欣然答应了。其时，黄在山西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并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他接到任命，先到武汉作了交代，再沿用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行营的旗号，带着阎锡山送给他的警卫营一营南下，于12月17日到达杭州。18日，即与朱家骅办理了交接。家未安稳，坐未暖席，便又撤离了杭州。

“对，陈副官说得对，我们要收复杭州，收复失地，我们会收复杭州，收复失地的！”黄绍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抬起右掌向前排靠椅拍去，仿佛那不是靠椅，而是占领杭州的日本兵。

“叭！”

随着一声脆响，陈亦南被弹跳起来，脑袋碰在车篷上，不由得惊叫道：“钧座，你怎么啦？”

“哎呀呀，失手了……”黄绍竑伸出双手按住陈亦南的肩头，帮他在座位上坐稳，并歉意地说。

还是蔡凤珍最了解自己的丈夫，她顺着黄的思路启发道：“怎样做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呢？”

“概而言之，是三句话：发动群众，刷新政治，掌握武装力量。”

“发动群众？”初听这个名词，蔡凤珍有点吃惊，但她脑筋一转便释然了，她叫着黄绍竑的字说：“季宽，你大概又想起了山西娘子关那场战役吧？”

“可不是吗，吃个甜枣记一下子，打个败仗记一辈子。那场战役我吃了亏，被狗日的日本鬼子重重包围，差一点儿全军覆没。要不是八路军及时增

援救助，我哪有今天乘车与你讲话的份儿？人家中共对合作抗日就是诚心，他们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的办法也真灵，要打开浙江的局面，非得向人家学习不可。我已经向周恩来先生正式提出，请他派一些人来帮帮忙。他答应了，并不指明是哪一个，当然不止一个。”

“周恩来先生挺喜欢吃我烧的武昌鱼的，他要能来一趟浙江该多好啊！”蔡凤珍忆起往事，有些激动。

“来浙江？恐怕办不到吧！他可是中共方面的头面人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呀！”

“他不也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吗？”

“一语成讖，但愿夫人，不，我们的愿望不会落空。”

黄绍竑到达金华，刚把省政府机关安置好，蒋介石派白崇禧会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就到了。他们于12月28日召开了一次军政紧急会议，对浙江的军事和政治作了新的部署，同时还推定黄绍竑兼任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要他组织部队，深入陷区，展开游击，对敌后作有效的活动。黄绍竑便把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行营改组为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部（设在金华城内成美女子中学），并把从山西带来的警卫营改编为游击总部的特务营，还派人四出招兵买马，建立部队。

按照黄绍竑的计划，从杭嘉湖撤退下来的军警，都改组成游击队伍。所谓撤退下来的军警，即省会公安局长赵龙文带出来的武装警察、内河水上警察局长朱炳熙带出来的水警队、翁光辉的诸新嵊游击总队、徐图远在松阳一带搞起来的自卫队。此外，还收容了由前方失散下来在金华兰谿一带的散兵游勇。很明显，这批士兵都是军警中的“老油条”，成分复杂，战斗力薄弱，所以C·C和复兴社的人都称这支队伍是“乌合之众”。

然而，黄绍竑热情未减，于1938年1月中旬在永康县召开了“全省士绅会议”，以图“刷新政治”。所谓“士绅”者，无非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常务委员（当时还没有书记长）、县商会会长和其他告老还乡的官僚等。这些人参加会议的目的，与黄绍竑的要求并不一致，一般都是到战时省会来探听时局的消息，窥测省政府当局的意图，以便决定今后的对策与行动。在会议上也有唾沫飞溅，慷慨陈词的。但尽是些空洞无物的高调，无法兑现的虚论，散会之后，各有各的打算，对抗战动员工作，并没有发生什么推动作用。

黄绍竑眼见这个会议没有收效，便决定以“战时政治工作队”的名目（简称政工队），把流亡的爱国知识青年组织起来，进行战时宣传和抗日动员工作。他首先跑到兰谿，指示县长陈佑华召集退到该县的流亡青年举行座谈会，并亲自与他们谈话，宣布组织政工队的设想，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青年都表态乐意参加政工队。黄绍竑又叫他们各写一份自传，测验他们的学识与意向，作为甄录的依据。浙江第一个战时政治工作队就是通过这样简便易行的手续，于1月下旬成立了。

有了样板，立即推广。2月初，金华、义乌，永康等邻近县的政工队相继成立，并很快地普及到全省其他各县。

2月下旬，黄绍竑以浙江省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名义，陆续制订了四个法规，颁行全省各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和县政府。这四个法规是：

1. 浙江省各县战时政治工作队组织通则；
2. 浙江省各县战时政治工作队队员守则；
3. 浙江省各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工作实施纲领；

4. 浙江省各县战时政治工作队补充规则。

4月，浙江后方地区绝大多数县份都建立了政工队。为了总结各个政工队的组织与工作的经验，鼓舞工作情绪，统一工作步调，以便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新的政治工作高潮，黄绍竑专门召集四区（即金华专区）所属及其邻近交通较为方便的诸暨、萧山、绍兴、嵊县等十多个县的政工队全体人员约近一千人，在金华监狱内举行初次集中训练。为了不让C·C和复兴社分子插手，他亲自主持，并派定助手和所有训练工作人员。集训了两个星期，黄绍竑从受训人员中抽调了青年男女16人，组织了一个战地政工队，由省抗卫会直接领导，深入浙西沦陷地区开展敌后政治工作，其余人员仍各回原县工作。

黄绍竑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C·C与复兴社分子的不安与惊恐。他们听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枪口对外，齐步前进！”等嘹亮雄壮的抗战歌声，感到刺耳；他们看到“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拥护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等墙头大字标语，感到刺目，一致认定：他们的政敌黄绍竑重回浙江，与共产党有勾结，并且已在省县各个部门起用了大批共产党、左倾分子。

首先他们攻击游击总部。游击总部的产生，是由白崇禧在金华召开军政紧急会议时决定的，事前并未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请示过，所以这一组织始终没有得到军事委员会的承认。为C·C分子把持的浙江省临时参议会，便就这个组织向黄绍竑提出质问：“游击总部是干什么吃的？没有军事委员会的承认，算不算‘私生子’？”“第三战区长官部认为浙江的国防，已由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负全责，早已形成了一个指挥系统，不必并驾齐驱的来一个第二者插手，以免意见分歧，权力分散。”“既然是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部，那么，总部和所属部队的全部经费，应该由第三战区长官部统筹开支，不应由浙江负担。如果长官部不出钱维持，我们并不需要这个组织，应即予以裁撤。”

其次，他们诬蔑政工队。说什么“政工队乃是赤化青年的反动组织”；“是黄绍竑为扩充自己的实力而搞的招兵买马”。黄绍竑为安定人心，动员民众，贯彻中央抗敌自卫的国策，而制定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也成了他们指责的目标。如C·C头目、省党部书记长方青儒就气势汹汹地说：“为什么中央的抗战纲领还没有制定，浙江省先单独制定？名称为什么不用施政纲领而用政治纲领？岂不是想把浙江当作独立王国吗？”

在权力分配与人事安排上，C·C与复兴社也极尽捣乱破坏之能事。黄绍竑设置了“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简称政训团）”与“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简称青训团）”，并亲自担任两个训练团的团长，但两团的副团长都是C·C分子，训练实权一开始就落入C·C手中。黄绍竑虽然兼了全省保安司令，而指挥保安团队的实权，却操在保安处长兼副司令宣铁吾的手里。宣铁吾是复兴社中的主要骨干分子，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经当过国民政府警卫团团团长、蒋介石的侍卫长，常自诩为“老头子身边的亲信中的亲信”，蒋介石门生中的“得意门生”。宣铁吾到浙江是在黄绍竑第一次主政浙江的期间，黄绍竑第二次主浙，宣仍未离开。宣对黄的态度，是外尊而内倨，对黄的意图，是阳奉而阴违。黄对宣的态度，是表面倚重，而心怀疑忌，信之未便，去之未能。

正是由于这一连串的干扰与倾轧，6月间，黄绍竑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

报：

“季宽兄，据各方反映。本任政府声名狼藉，须切实注意。中正。”

“真是岂有此理！”黄绍竑朝八仙桌重重地拍了一巴掌，震得刚泡好的盖碗茶盖翻碗砸，茶水横流。

蔡凤珍吓了一跳，担心地问道：“委座在电文上说了些什么？”

“你自己看吧！”

从丈夫手上接过电报，只扫了一眼，蔡凤珍也激愤起来：“又是恶人先告状，我早说过临时参议会的那几个老家伙不是好东西，还有宣……”

“什么叫‘声名狼藉’。我到任仅仅半年，并没有做过一件坏事，怎么就会弄得‘声名狼藉’了呢？难道发动群众抗日打鬼子，就是‘声名狼藉’，贪赃枉法、欺男霸女，就不是‘声名狼藉’吗？”黄绍竑在蒋介石手下干了将近十年，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严厉的责备，气得浑身直打哆嗦。

蔡凤珍听出丈夫话中有话，“贪赃枉法”指的是C·C头目方青儒，“欺男霸女”则指的是复兴社骨干宣铁吾，宣不仅奸险，而且好色，曾经妍居过杭州虹月楼酒菜馆女招待洪碧筠；为了占有杭州清和坊元泰布店老板范某的女儿，他授意参谋主任杨树农派人将范逮捕，逼其以女来缓颊；宣铁吾现在的小老婆何敏，原是杭州吴山路西悦来菜馆老板的女儿，就是被宣先奸后娶的。

“既然嫌我‘声名狼藉’，那我还当这个劳什子的省主席做啥？”

“对，干脆打电报去辞职算了，大不了再回广西去办农场。”蔡凤珍附和道，她忆起1927年的粤桂战争，黄绍竑曾弃官从农，在柳州办了一个种植桐子的农场——“茂森公司”。后来还到香港做过寓公，到南洋一带去漫游过。

“陈副官，”黄绍竑向门口大声叫道，“马上打电报给蒋委员长。提出辞呈。”

早就守候在门口的陈亦南，双脚立正叩了一下鞋跟。应道：“是。”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接受他的辞呈，而在复电中说“耳有所闻。则以之告”，并加以慰留。

“怎么办呢？”一向聪慧的蔡凤珍，手捧复电，也不知所措。

“我去意已决，还是驰往武汉，找委员长坚辞。”主意一旦拿定，便不轻易改变，这是黄绍竑的脾性。

“跑一趟武汉也好，省得人家无事生非，暗箭伤人。”

当月，黄绍竑就到了武汉，托病住在武昌东湖疗养院，过了几天才去见蒋介石面陈辞职原因。

蒋介石说：“季宽呀，不是我怪你，你自去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纪律好，长于游击战，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团结民众，军民配合如何默契……各级党部、黄埔学生、士绅听了，自然不服气，要说你的闲话。你的战时政治纲领和用人方面，都有令人指责的地方。我打电报给你，无非是使你知道说闲话的人多，要你注意，希望你改正。你仍旧回浙江去吧，不要再辞了。”

黄绍竑专门解释了一下“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我觉得在国家空前

大变的全面抗战时期，政治上必须有一个崭新而为大众所拥护的政治纲领，作为政府与人民共守共行的准绳。这本来应该由中央政府制定公布，由于中央忙于搬迁，没有时间考虑，因此，我们便汇集各方面的意见拟订了……”

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你那纲领的末尾，关于巩固抗日战线的一条，终是欠斟酌吧？”

黄绍竑要求继续组织和发展青年政治工作队。

蒋介石答复：“青年是要组织的，但在国民党中央的青年组织__没有健全以前，你组织起来岂不是替共产党组织，供他们利用？以后一定要由三青团统一。”

黄绍竑本来还想赖在东湖疗养院不走，适值李济深闲着，也住在那里，不久李宗仁由台儿庄回来，也住了进来，白崇禧也时常来闲谈，惹出了许多谣言。为避“桂系聚会”之嫌，黄绍竑于7月下旬返回浙江。

既然辞职不准，黄绍竑就利用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发动并加强民众自卫组织”的有关条文，把原有的游击总部和游击队伍，编为抗敌自卫团队。

10月，武汉失守，中央政府迁往重庆，山高皇帝远，蒋介石管不了浙江许多，黄绍竑利用这个机会，不仅扩充自卫队，而且办起了兵工厂。

紧接着，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政策，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全国抗战形势开始逆转。

就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从重庆来到东南抗日前哨的浙江。

黄绍竑夫妇大喜过望，一齐惊呼道：这是真的吗？

二 欢迎周副部长

1939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还不过3月中旬，桃李花已经盛开，红的似鲜血，白的如雪片，把一个战时的金华打扮得花枝招展，不能不使人想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

金华，因“金星与婺女争华”而得名，位于浙江中部偏西，是沪杭至湘赣的必经之地，向来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由于浙江省政府移设金华附近的永康方岩，金华已成为战时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一天丽水到金华的长途汽车晚点，快到傍晚时分才进站，从风尘仆仆的车中，走下来一个戴淡墨色眼镜的商人，他就是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

一个卖香烟的小姑娘跑上去，用清脆的嗓音叫道：“老板，要香烟吗？白金龙，大前门，老刀牌……”

刘英客气地摆了摆手，表示自己不会抽烟。

一个衣衫槛楼的瞎眼老妇扶着一个半大的拖鼻涕的孩子，求告道：“先生、老板，行行好……”

刘英从长衫中掏出一把铜元。放在那只伸出来的手掌中。

他心中有些酸楚，长久不来金华了，金华人民的生活还这样贫苦……

刘英匆匆地出了车站，按照金衢特委的安排，住下旅店后，当晚便到紫墩巷15号省委文委机关住所，找骆耕漠、邵荃麟、葛琴三人了解工作。

骆、邵、葛三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刘英，对他多年来在闽浙边同粟裕一起领导和坚持革命武装游击斗争十分敬仰，都惊讶地说：“刘英同志，你怎么来了？”

刘英兴奋地说：“听到这么大的喜讯，我怎能不来呢？”

骆耕漠说：“你是指周副主席要到金华来吗？”

“可不是咋的，”刘英接过葛琴递过来的一杯茶，喝了一口接着说，“看来，你们都知道了？”

“是的。”邵荃麟答道，“消息是从新知书店咱们的秘密交通站传来的，周副主席已视察完新四军军部，即将从岩寺到达金华。”

新知书店与生活书店，都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性文化岗哨，也起着秘密交通站的作用。岩寺在安徽歙县，设有新四军兵站（站长忻元锡），是新四军的一个公开联络点，负有来往人员的护送和物资运输任务。兵站初建立时，因为国民党的干扰和封锁，交通条件极差，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局面才有所改观。如上海煤业工会，经地下党员对一些工商业进步人士做工作，为新四军捐募了七八辆卡车，组成了新四军的交通运输队，往来于温州（是当时浙江通上海的唯一口岸）和岩寺、太平之间，同时也构成传递消息的一条线路。

“这事由我们安排好了，你何必冒着风险，亲自赶来呢？万一发生了三长两短，对革命的损失就太大了。”葛琴担忧地说。

“刘英同志，葛琴说得对，你的人头前几年可是悬过赏的哦，应该特别注意安全才是。”骆耕漠接着说。他们都为刘英这次秘密来金华担心。

“你们看我这身打扮，”刘英从座椅上站起身来，抖了抖长袍，摸了摸墨镜，风趣地说：“像游击司令呢，还是像省委书记？”

邵荃麟说：“都不像，倒像个闯过三江四码头的木材商人或银行大亨。”

“哈哈哈哈……”刘英爽朗地笑了，笑罢，他严肃地说：“我偶尔化装

外出，倒不怎么要紧。我担心的倒是你们的安全，你们就在省政府的跟前，长年跟他们打交道，国民党前不久又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你们可要提高警惕呀！”

“刘英同志，请放心，我们的真实身份至今也没有暴露，我们会严守党的机密，注意安全的。”骆耕漠是文委书记，他代表三人回答。

“那就好，那就好，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如何欢迎周副主席吧！”刘英招呼三人坐下，同时将座椅朝前挪了挪。

“好的。”骆耕漠答应道，“金衢特委、金华县委和我们省委文委昨天专门开会研究过。大家商定，由特委负总责，县委具体负责组织群众欢迎，文委负责进行上层活动。”

“知道周副主席住什么地方吗？”

邵荃麟说：“我已打听清楚了，周副主席在金华逗留期间，将安排在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的宾馆休息，该宾馆位于金华城外的火车站附近，是金华最好的旅社。”

“国民党方面有什么动作？”

“国民党省主席黄绍竑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准备派党、政、军方面的上层官员，在宾馆迎候，还要设宴为周副主席洗尘。”

刘英站起来，沉思着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对三人说：“周副主席这次来浙江视察，是我们浙江党内的一件大事。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当然要与国民党的省主席和党、政、军各方面的要员打交道。但他又是我们的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将代表党中央检查和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赶在国民党组织的欢迎前面，及早迎接到周恩来同志。”

邵荃麟建议道：“是不是兵分两路：一路由我与金华县委的杜麦青同志负责组织群众，到金华火车站西边公路上的一座小桥侧，欢迎周副主席的专车；另一路由骆耕漠以《东南战线》月刊总编辑的公开身份，去宾馆迎候？”

刘英说：“这个设想是可行的。但欢迎的群众不能是一般的群众，应该是有觉悟的骨干分子和靠近我党的进步青年。”

邵荃麟说：“我明天一早就通知《浙江潮》、《战时生活》、《刀与笔》、省儿童保育会、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抗日救亡歌咏队、金华读书会等团体，让他们各派出七八位代表好了。”

“行。”刘英转向骆耕漠：“你不要单独一人到宾馆去，应该找几位积极抗日的民主人士一道去。”

骆耕漠回答：“好的。”

“日本特务机关和杭州汪伪政权，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会不会也得到消息，有所行动呢？”刘英缓慢地说，像是在问他们，又像是在问自己。

骆耕漠说：“金衢特委与金华县委尚未接到这方面的情报。”

邵荃麟说：“我们《东南战线》月刊最近接待了一位从杭州沦陷区来的同志，亦未提到日本宪兵队、‘梅机关’以及汪伪的‘四十六号’有什么异常活动……”

刘英说：“这种事情是极端机密的，一般人不会知道。”

葛琴说：“也许敌人压根儿也不晓得周副主席来东南前哨视察吧？”

“不，我们不能这样估计，这会使我们麻痹大意，丧失警惕。”刘英严肃地说：“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飞机空袭，武装骚扰，甚至于派人暗杀……一定要向接待的同志们讲清楚，即使牺牲个

人的生命，也要保证周副主席的安全！”

邵荃麟说：“我一定把这个精神告诉给大家。”

骆耕漠说：“我决心以鲜血和生命，保卫周副主席。”

葛琴说：“这也是我的态度。”

刘英禁不住激动起来：“等周副主席一到，我们就召开省委工作扩大会议。请周副主席作指示，全面部署今后的抗日工作……浙江的革命历史马上就要翻开新的一页了！”

骆耕漠关切地说：“刘英同志，根据目前的形势，你还不能公开露面。欢迎周副主席。你就不要去了吧！”

刘英答道：“好的，我准备让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汪光焕同志参加。”

就在同一天晚上，在省保安处处长兼 91 军军长宣铁吾的官邸，几个人头挤在一起，也在商议周恩来来到金华的事。

三角眼的密探组长说：“浙江是我们委座的天下，共产党周恩来跑到这里来做啥？”

吊梢眉的特工科长说：“还不是仰仗他那政治部副部长的合法身份，以视察抗日和回绍兴省亲为借口，行联络浙江共党分子之实，煽动民众，蛊惑人心呗！”

“那为什么委座来电，还要求‘热忱欢迎，保障安全’呢？”

“这个，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全身陷在沙发中、正吞云吐雾的宣铁吾，从怀中掏出一封电报，扔给了吊梢眉。

几个脑袋一齐凑了上来。

吊梢眉手捧电报如捧圣旨，一字一板地念道：“惕我吾师，奉委座口谕：周恩来即日来东南视察，并回绍兴省亲，希热忱欢迎，保障安全。严密监视其言行，特别注意浙江异党的活动和黄周会晤。生雨农”

三角眼听了，仍然有些迷惑不解：“又要热忱欢迎，又要严密监视；又要保障安全，又要注意异党活动和黄周会晤。岂不是矛盾吗？”

宣铁吾用右手食指掸了掸烟灰，不耐烦地说：“这就叫政治家风度。文章写在明里，工作做在暗里，又拉又打，外宽内严……”

“究竟以哪一个为主呢？”

“对于我们来说，当然以严密监视为主。”

“哦，我明白了。欢迎的事情，我们不用管，放给黄绍竑他们去做。我们只要盯牢他们的一切活动即可，稍有越轨之处，立即向委座或戴老板报告……”

宣铁吾对这个机械地理解他的意图的下属不置可否，转而向吊梢眉吩咐道：“黄绍竑现在还在天目山，主持沦陷区政治工作队会议，三五天内回不来。关于周恩来明天要到金华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让他府邸上的任何人知道。这样，也可以推迟或取消黄周的会晤。”

吊梢眉恭敬地答道：“是。”

三角眼还没有回过味来，主动关心地问：“处座，黄绍竑不在，是不是你亲自去会周恩来？”

宣铁吾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我不去会他。黄绍竑与刘建绪早已安排了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徐旨乾与抗敌自卫团司令部参谋长张绍棠二人全权代理了。”

“听说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曾当过处座的老师？”

“你还有完没有？”宣铁吾将抽了一半的香烟重重地按熄在烟灰缸里，大声吼道：“我对你多次讲过，不要耍嘴皮子而要用脑子，不要捕风捉影而要抓事实，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三角眼没想到讨了个没趣，连忙闭嘴，不吱声了。

还是吊梢眉会察颜观色，立即转移话题：“报告处座，今日金华街头，发现了一些不明身份者。”此话果然引起宣铁吾的职业性的反应：“是不是共党分子？有没有他们的省委书记刘英？”“他们稍纵即逝，暂时还不清楚。”

“你负责查一查，如发现是刘英或其他首要分子，设法引到无人处，秘密逮捕。”

“是。”

“我估计，共产党肯定要组织一批群众去车站欢迎周恩来，你们得派几个弟兄混进去。”宣铁吾对另外两个部下说。

“是。”

“周恩来将下榻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政府官员明日下午要到那里迎候，你们也跟着去。”

“是。”

“至于你，”宣铁吾转向三角眼说，“马上通知省党部调查统计室，就说是我的意见，要他们从明天开始，将周恩来在浙江的一切活动逐日记录下来，随时准备上报中央，你们密探组配合他们的行动。”

“是。”

3月17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早就空出来的四间上等客房，已被打扫数遍，布置一新。

勤杂工小杨问女招待小方：“你知道新来的客人是谁吗？”

小方是个年轻、爱美的姑娘，正把一束李花插进写字台上的花瓶中，她答道：“不知道。只听说打从重庆来，好像是个大官，待人挺和气的。”

“我可知道他的来历，他叫周恩来，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也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你怎么知道的？”

“是《浙江潮》主编严北溟先生告诉我的，他还叫我关照一下你，一定要侍候好周副部长，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去找他。”

“哦，周恩来，周副部长，‘西安事变’就是他去解决的，他可是个大智、大勇、名闻中外的大人物呀！我能够侍候他，太幸福了！”小方沉浸在激动与向往中。

中午刚过，浙江省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第十集团军等各方要员或代表，以及民主人士、《东南战线》月刊总编辑骆耕漠等都来到旅行社，等待周恩来的到来。

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批欢迎群众则向城外走去。他们中间，有《东南战线》社的邵荃麟、葛琴、徐进、毛冷，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沈馥，《浙江潮》主编兼省军管区干部教导总队政治指导室主任严北溟，《青年团结》社的胥哲夫、匡莘芜、杜青野，文化资料室杜麦青、查民愈，县政工队的徐旭，第四区专员公署的王耘庄，《妇女战线》社的丁浩及其他机关人员，还有汪光焕等，约四五十人。他们一直走到金华火车站西边公路上一座小桥的

西侧，才停住。

桃花如火，李花赛玉，烂漫的春色使严北溟十分兴奋。他激动地对邵荃麟说：“荃麟兄，今天的天气也在欢迎周副部长啊！”

“说得对，”邵荃麟答道，“周副部长这次来金华视察，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确实值得我们同声庆贺。”

“你见过周副部长吗？”

“见过。那还是在1927年底，在上海。一晃十二年，不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我不如你幸运，只在斯诺先生写的《西行漫记》中，看到过他的照片。身着戎装，骑在马上，英姿逼人，真一代伟人也！”

汪光焕与杜麦青也在交谈。

杜麦青说：“我们设想，周副主席上午从太平岩寺乘车出发，到金华大约是下午二三点钟；我们还设想，他有可能是坐小卧车或吉普年来金华，那么就会必经此桥……”

汪光焕掏出怀表看了一眼，说：“现在是二点三十五分。怎么还不见车影呢？”

“等一等吧，再过半点钟就会到的。”

这天下午公路上的车辆不多，来来去去的不过是些货车与敞篷车。间或有几个做小买卖的商人经过，也是肩挑、背背、汗流浹背、忙忙碌碌的样子。问问他们看见过小卧车或吉普车没有，都是千篇一律的摇头。过了半点钟，没有踪影。

又过了半点钟，依然没有踪影。

欢迎队伍不由得焦急起来。

邵荃麟问严北溟：“周副部长来浙抵金的通知，你是从哪里听到的？”

严北溟说：“是第三战区下达给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我从总司令部听到的。”

“按理不会有什么偏差吧？”

“我想是不会的。”

汪光焕比别的人更着急，因为这批欢迎群众名为抗敌自卫团所组织，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起主导作用。他受刘英委派，做这支队伍的暗地组织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周副主席的安全了。

他问杜麦青：“不至于出什么事吧？”

杜麦青答：“不至于。”他嘴上如此说，心中更没底。

终于出现了一辆吉普车，但方向不对，是从金华火车站那边开过来的。车子开到小桥边，“嘎”的一声停住了，从车窗口探出一个脑袋。对严北溟招呼道：“严先生，周副部长久等不到，在旅行社迎候的人都等急了，张参谋长派我到前面去看看。”

严北溟认得那人是自卫团司令部的马副官，忙回答：“马副官，你去看看最好，说不定还能接到周副部长呢！我们仍在这里等你的消息。”

随着“唿隆”一声，吉普车开过小桥，向兰溪方向驰去，迅速消失在前方迷雾处。

人们继续等待，一直等到太阳落山。方始见到车影，近了，近了，略有疲惫的人们又兴奋起来，争着拥上桥头。

汪光焕问杜麦青：“你看是吉普车吗？”

杜麦青年轻，眼睛尖，答道：“是吉普车。”“几辆？”

“一辆。”

“怎么是一辆？”

严北溟走过来说：“好像就是刚才那一辆，是马副官回来了。”

“马副官的车？”人们的心头不由得一沉。那车越开越近，看得清车头的国旗与党徽，随着“嘎”的一声，车停在小桥上，跳下来的果然是马副官。

“怎么，没迎到？”严北溟问。

“是的，没迎到。”马副官答。

这时，从火车站方向传来了摩托声，尘土过处，一个勤务兵高叫道：“严先生，马副官，总部刚刚接到兰溪来电：‘周今日不能来金’。张参谋长叫你们回去，让欢迎队伍解散。”

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三 “一切为了抗日”

就在欢迎队伍解散不久，标号为 07、203 的二辆大卡车出现在公路上。车里乘坐的有周恩来、随行副官邱南章（原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少校科长）、警卫员刘九洲，以及新四军曾秘书、科长张金铎夫妇、中国茶叶公司屯溪分公司主任章秋阳、新四军速记员吴波等。

原来从皖南云岭到浙江金华，道路崎岖，要涉河越岭，经茂林到太平县后，才有公路通车。周恩来到太平时，发现附近有国民党驻军，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机立断，同随行人员一起乘新四军兵站预先准备好的二辆大卡车，直奔金华。6 时进城，在大东旅社开了三个房间。

虽然经过了一整天的长途跋涉，周恩来却无一丝一毫的倦意。他兴致勃勃地说：“谁跟我到军人服务部去一趟呀？”

“我去！”

“我去！”

好几个嗓门同时应答着，随行人员中多数是年轻人，他们有的是青春的热情与旺盛的精力。

军人服务部在金华铁岭头 10 号，刚进门，就碰到该部歌咏队队长刘良模。刘惊喜地说：“周副主席，骆耕漠和邵荃麟他们等你一下午了！”

“是吗？”周恩来也有些意外，他急着来军人服务部是想了解一下情况的，连忙说：“快把他们请来！”

骆、邵二人闻讯，别提心中有多么高兴。邵荃麟虽因肺弱，身本不好，但仍喘着粗气，不断加快步伐。

铁岭头 10 号原是教会的房子，环境优美，地方宽敞，里面还有一个小花园，只留有看房子的人。刘良模因有教会关系。得以借用为军人服务部的住所。刘的办公室虽然比上海居民普通洋房的客堂大一些，但放了一张大写字台后，也只能坐五六个客人。邵、骆二人赶到时，室内已有十多个人，全部站立着，房间显得很挤。

邵荃麟一眼就认出了周恩来：身穿黄呢军服，肩披军大氅，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双雪亮的眸子，由于刚刚刮过胡须，下巴上和脸颊边青里泛红，不觉热血翻涌，紧走了几步，一把握住了那双向他伸过来的大手，激动地说：“周副主席，我们终于把你盼来了！”

周恩来摇了摇对方的手，高兴地说：“荃麟同志，我们大概有 12 年没见过面了吧？记得那次分手时是在上海……”

“周副主席的记忆力真好！”邵荃麟赞叹道，抽出一只手，将骆耕漠拉到写字台前，向周恩来介绍道：“他就是骆耕漠，公开身份是《东南战线》月刊总编。”骆耕漠向周恩来鞠了一躬，说：“周副主席，路上辛苦了！”

周恩来微笑道：“我们再辛苦，也不如你们坚持在抗日前哨的同志辛苦呀！”说着朝对面一位同志一指：“你看看他，是不是你在上海就相识的老朋友？”骆耕漠眼睛一亮，这不是章秋阳——章乃器的胞弟吗？不禁喜出望外：“秋阳兄，你什么时候到的金华？”

见到老朋友，章秋阳也很高兴：“才到不大一会儿。我是同安徽省地方银行的一位稽核一起来金华出差的，正好与周副主席同路，顺便也参加了护送的工作。”

骆耕漠想起了在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的人，忙对周恩来说：“周副主席，

旅行社里已为你准备好了房间，还有十几位国民党省级党政军要员在等着迎接你呐！”

周恩来问：“要员中有哪些人？”

“有省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参谋长张绍棠、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徐旨乾……”骆耕漠扳着手指头，一一报告道，“他们中午就到了旅行社，一直等到现在，你再不去，他们就要散了。”

周恩来笑道：“他们大概不会想到，我会一竿子插到底，插到金华的基督教军人服务部刘良模队长这里来了。好吧，我们现在就去旅行社。”

房子里的人都开始往外走。

周恩来走到门边，指着一台家用式木盒大收音机，对刘良模说：“良模同志，你们有大院子，有小花园，有收音机，真有点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味道，工作条件不错嘛！”

刘良模说：“多承周副主席夸奖！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繁重的任务还在后头哩！”

周恩来走到院子里，接着说：“军人服务部和歌咏队都是抗日必需的重要工作。组织群众学习抗战歌曲，用歌声来激励人民的抗日情绪，很受广大群众欢迎。你们要努力克服艰难险阻，好好地干！”

刘良模和队员们齐声说：“我们决不辜负周副主席的教导，一定加油干！”

周恩来微笑着点点头，步出10号大院，向大家挥挥手，便登上了停在门前的大卡车。

尘头起处，刘良模和队员们一叠声地喊着：“再见！再见！”

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宾馆。在这里等了一个下午的国民党浙江省党政军要员们已经走掉了一部分，但张绍棠、徐旨乾二位参谋长尚未走，从城外公路小桥处回来的严北溟、马副官也在这里，他们听到周恩来已到金华的消息都很兴奋。

会见是在热烈盼气氛中进行的。因为天色已晚，张、徐二位寒暄了一阵就告辞了。严北溟也跟着退出，打算第二天再来造访。刚刚到家，外面响起汽车的引擎声，周恩来的副官邱南章走了进来，热情地说：“严先生，刚才人多，不便单独留你，现在客人都走了，周副部长请你去谈谈。”

“我没听错吧？”严北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千真万确，是周副部长派我来的，车子就停在巷口。”

“好，那咱们走吧！”

“你不需要加件衣服吗？”

“不需要。”严北溟连礼帽也不戴就朝外走，周副部长要单独按见他的决定使他激动不已，全身热得就像一个火炉。

再度来到旅行社，果然客人们都走了，客房里静悄悄的，四下无人。严北溟看见对面一扇门半掩着，便信步走了进去。只见周恩来正坐在一张小凳上就着一只木盆在洗脚。

周恩来抬头看见严北溟，笑着招呼道：“对不起，对不起，你先到客房里坐一下，我马上就来。”他三下两把擦干脚，穿上鞋立即来到客房，请严北溟坐在沙发上。

邱南章恰在此时端来了茶点，放在茶几上，又退了出去，并顺手关上了房门。

“北溟兄，你的情况我们早有了解。你为人正直，爱憎分明，为团结抗

日做了大量的工作。你主编的《浙江潮》周刊也是不错的，发表了不少进步文章，在民众中有良好的影响。”

周恩来时年41岁，比严北溟大八九岁，却开口称呼他“北溟兄”，这使严北溟十分感动。他答道：“谢谢周副部长的慰勉，北溟才疏学浅，还有许多事情想做而未做哩！在这国土沦丧、国难当头之际，只要周副部长吩咐，北溟即使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

“难得北溟兄有如此热肠赤胆，我今天找你，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浙江各方面的情况。”周恩来说罢，站起身来，拿过桌上的热水瓶，就要给严北溟续茶。

严北溟惶恐地站起来：“周副部长，这怎么敢当呢？我自己来吧！”

周恩来用左手按住严北溟的肩膀：“你给我坐下！在金华，虽然你是主，我是客；在这间房子里，则我是主，你是客。中国有一句老话，‘客随主便’，北溟兄不是不知道吧？”

“真不好意思。”严北溟只好坐下，听任周恩来为其续茶。

周恩来的和蔼可亲，使严北溟的一切拘束顿时消除，他从两个方面向周恩来汇报了浙江的情况：一是国民党内部派系，主要是蒋桂之间的矛盾；一是国共之间的地方磨擦，而这两项矛盾又是错综交织在一起的。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政治上比较开明，但他力主抗战、容纳进步力量等新政措施，无一不遭到浙江C·C系和复兴社分子的反对。

听到这里，周恩来站起来插话：“北溟兄，你能否将协助黄绍竑主席开展工作的情况，讲得具体一点？”

“可以。”严北溟连忙从沙发上站起。

“不，不，不，你还是坐着讲好。”周恩来亲切地伸出双手，把严北溟按坐在沙发上。为了不使严有丝毫紧张，他也重新坐下。

严北溟继续汇报道：“我协助黄绍竑主席主要做了这样一些工作：代草《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加强刊物宣传。黄主席为轮训部队基层干部，在刚成立的‘浙江省军官教导总队’下设立了一个政治指导室，他怕政训大权被复兴社分子夺去，特派我兼任该指导室主任。我借此机会，延揽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如王平夷、黄继武、萧卡、童超、沈任重、周凯等，担任政治指导员。这件事引起了C·C系和复兴社分子的更大敌视。”

“浙江的C·C系和复兴社有没有矛盾？”

“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不过是争权夺利，狗咬狗罢了。前年冬天，杭州沦陷，后方震动。以宣铁吾为首的省保安处——他们属于‘军统’，系复兴社骨干——为了乘机扩充实力，指示诸暨、绍兴等县招兵买马，发动在乡军人组织壮丁队或自卫队，准备‘打游击’，与此同时，以方青儒为首的省党部——他们属于中统，为C·C系把持——也不甘寂寞。号召各县党部运用抗敌后援会一类组织，发动群众，组织队伍，跟省保安处分庭抗礼。”

“这下子，可有热闹好看了。”

“可不是吗？如省党部浙东特派员、诸暨县党部实际负责人、C·C骨干傅文象，立即奉命执行，以‘抗日义勇队’名义，大量吸收青壮年进行所谓的‘游击训练’。诸暨是复兴社的巢穴之一，宣铁吾和他在保安处的重要骨干都是诸暨人，岂能袖手不管？便挑动在乡军官周破浪、杨步飞、翁国华等跟傅文象大起磨擦。再加上傅文象在进行过程中有些专擅，就此种下祸根。周破浪等以傅文象不懂军事为由，多次暗示他适可而止，让出领导权交军人

掌握。但傅文象自恃有靠山、有人，不听那一套，终于在一次下乡路上——诸暨王家井千秋桥头附近——遭遇周破浪等布置下的伏击，饮弹毙命。C·C方面不甘示弱，在城内文庙给傅文象大出丧，对复兴社分子示威，互不相让，势成火并。最后由宣铁吾亲自返乡，主持调处，才告结束。”

周恩来听到这里，又站起来插话：“不管C·C系与复兴社有多少矛盾，在对待人民，对待我党上，他们是一致的。”

严北溟了解了周恩来的习惯，这次没有站起来，仍坐在沙发上说：“周副部长讲得对，C·C系与复兴社都信奉‘攘外必先安内’的准则，对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亡运动都进行过疯狂的镇压，如遂昌事件、龙泉事件、温州事件等。我主办的《浙江潮》周刊，因为宣传团结、抗战、进步，早被C·C系和复兴社势力视为跟中钉、肉中刺，只碍于黄绍竑主席全力支持，还来不及下手。这一切，都暗示着在浙江有一股反共逆流正在高涨。”

“你跟黄绍竑黄主席的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那是前年年底的事。我因受不了C·C系与复兴社分子的攻击，从《东南日报》愤然辞职，准备奔赴解放区。第二次来浙主政的黄绍竑找到我，对我说，他在山西太原第二战区时曾同周副部长你面谈，受到极大鼓励，决心不辜负你的嘱托，坚持团结抗战，大力支持浙江的青年文化运动，希望我利用同浙江的许多进步青年和文化人有联系这一有利条件，协助他工作。两年多来，我就是在地党的赞助和支持下，跟黄绍竑发生政治关系的。”

周恩来听完，嘴角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说：“北溟兄，你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现阶段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我和你都在为完成这项任务而努力奋斗。只不过地区不同：我在重庆跟他们打交道，你在浙江跟他们打交道。”

说着，说着，周恩来又站了起来，走到严北溟面前，用手拍了拍严的右肩，接着说：“北溟兄，我相信你是懂辩证法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人也一样。对黄绍竑，我们就是要看到他的积极的一面，充分发挥他在团结抗日中的作用。请记住，你是站在我们党的一边对黄做统战工作的，应该继续下去，相信你在浙江是会大有作为的。”

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严北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与快慰，他决定向周副部长倾吐自己多年来的隐秘与苦闷。

原来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下，严北溟在长沙曾由郭亮同志介绍，加入过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爆发后，他同组织失去了联系。虽然他信念未泯，初衷未改，在白色恐怖下依然坚守民主进步的立场，随时争取与地下党联系，配合进行工作，但环境终究对他不利，甚至十分险恶。黄绍竑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与之打交道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而C·C系和复兴社特务早视他为“准共党”而严加监视。因此，他向周恩来表示，希望重新恢复组织关系，并离开浙江去解放区工作。

听了严北溟的肺腑之言，周恩来也有些激动。他说：“北溟兄，了解了你的经历，我们是很欢迎你到党内来的。可是，你想过没有？黄绍竑黄主席要在浙江开展工作，为什么不找一个共产党员或一个国民党员做助手，却偏偏要找你这样的无党派人士呢？”

“还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免得给C·C系和复兴社等国民党顽固势力以口实或把柄，有利于抗日呗！”

“说得对呀！一切为了抗日，这是我们观察事物处理事物的基本出发点。”

就目前形势看来，你还是不入党为好，这样有利于抗日，有利于统战工作。一入党，对黄绍竑就只好说话了。你想想，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严北溟略作沉思后，应道：“有道理，有道理。”

周恩来深情地说：“北溟同志，你入党是我们的人，不入党也是我们的人呀！”

严北溟热泪盈眶，一把握住周恩来的手说：“谢谢组织的信任，谢谢周副部长的信任！”

春夜长谈不觉快，严北溟低头一看手表，惊叫道：“哎呀，12点了！今夜晚时间怎么过得这样快？”

周恩来笑道：“没有关系，还有什么情况，可以再谈谈。”

“不了，不了，你今天坐了一天车，本来就很累，又让我打扰了近三个小时，再不走就太不近人情了。”严北溟说着，便站了起来。

“好吧，那我们明天再谈。”周恩来也站了起来，并打开客房的门，走到门外轻声叫道：“邱副官，请代我送送客人！”

邱南章从隔壁房间走了过来，对严北溟说：“严先生，请！”

严北溟跟周恩来握了握手，道声“晚安”，便走了出去。

此时已过子夜，整个宾馆悄无声息，其他房间灯火皆灭，走廊、过道阒无一人，连夜鸟也似乎全部睡去，唯有天上的繁星在粲然发光，庭院的桃李在蓬勃怒放，空气中充满了宁静与芬芳。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春夜啊！”严北溟边走边想，跨进汽车的驾驶楼，他竟觅得了两行诗句：

婺滨春夜喜邀谈，
教导亲承作指南。

他正琢磨着续完这首七绝，蓦地人影一闪，一个穿军便服的人从车窗前过去。阴阳怪气地丢下一句话：“严先生，好忙呀！”

严北溟大吃一惊：这不是保安处宣铁吾手下的得力干将三角眼吗？他深夜到旅行社来干什么？连忙朝旅行社大门望去，但见一高一矮两个便衣从里面出来，对三角眼嘀咕了几句，又一起走了进去。

原来宣铁吾在旅行社布下了暗探！今晚所有的会晤都在他们的密切监视之中！

严北溟不禁愤慨起来。他在黄绍竑那里看到过蒋介石的电文，不是说“周恩来即将来东南视察、省亲，希热忱欢迎，保障安全”吗？宣铁吾是怎么搞的？严北溟哪里知道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戴笠还另有电报给宣铁吾，又作了“严密监视其言行，特别注意浙江异党的活动和黄周会晤”的指令……他不禁担心起周副部长的安全来。

车子开离了旅行社，严北溟的诗兴已一扫而光，那首未完的绝句，直到三十七年以后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才完成。

车子开过沉睡的街道，严北溟的头脑却越来越清醒。他在想：明天一定要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张绍棠参谋长，请他派一班警卫来，保障周副部长的安全。

“嘎”一声，汽车停住了。邱南章下车给严北溟打开车门，并叫道：“严先生，府上已经到了，请下车。”

严北溟这才回过神来，走下汽车，走出两步又转过身来，对邱南章说：“邱副官，刚才我在旅行社门口，发现有复兴社特务。请转告周副部长注意安全。”

“好的。”邱南章答道，“谢谢严先生的关心。咱们明天见！”

“明天见！”

四 对罗店的造访

3月18日，周恩来一早就醒来了，艰苦的战争环境与日理万机的繁忙，使他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他打开窗户，听到了婉转的鸟鸣，闻到了扑鼻的花香，精神不觉为之一振，伸开两臂，作了次舒展。勤杂工小杨正在清扫庭院，亲切地向周恩来招呼道，“周副部长，你起来了，我马上告诉招待小姐给你打洗脸水。”

“谢谢你，小师傅，这些事情我们自己会做的，不麻烦你们。”

周恩来的话使小杨颇为吃惊：“侍候人是我们份内的责任，怎么叫‘麻烦’呢？”

“小师傅，你领会错了，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互助的关系，不是侍候与被侍候的关系。我们反对压迫、剥削与歧视，提倡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小杨第一次听到这种提法，感到十分新鲜。

这时，走廊上响起了争执声：

“这壶，应该我来拎；这盆，应该我来端。”“不，你不用管，全部交给我好了。”

周恩来走出门外，发现是自己的警卫员刘九洲抢了女招待小方的活计，便微笑道：“方小姐，他年轻力壮，身体好，你就让他干吧！”

小方诧异地说：“你们是贵人，也干这种下人干的活计？”

“人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不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真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官……”小方在心中嘀咕道，不禁肃然起敬。

从8时开始，来访者便络绎不绝。先有龙泉民众教育馆东乡分管主任蒋克伦进见，继有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徐旨乾、新四军科长张金铎夫妇、曾秘书、军人服务部歌咏队队长刘良模、严北溟等人入内会谈……不到一小时的功夫，桌上的名片就放了一大堆。9时整，邱南章又拿进来一张名片，向周恩来报告道：“省保安处的杜科长求见。”

严北溟说：“他是宣铁吾的心腹与智囊人物，大概是代表宣铁吾来拜见周副部长的。”

徐旨乾是炮筒子脾气，一听到“宣铁吾”的名字就反感，他说：“宣铁吾是周副部长的学生，学生不来见老师，却派个特工科长来，这算哪门子事？依我看，干脆给他碗‘闭门羹’——不见！”

周恩来摇摇头说：“不，还是要见的。我来浙江视察抗日工作，不管什么样的人物都得打交道，何况他代表宣处长，在礼数上可不能让人家挑毛病。”

严北溟脑子灵活，建议道：“他来了，还可以问问他，宣铁吾干什么去了？”

徐旨乾想了想，说：“那也好。”

随着邱南章的一声“请”，吊梢眉西装笔挺地走了进来，对着周恩来连连鞠躬道：“周副部长好，周副部长辛苦了！”

周恩来礼貌地说：“一切为了抗日，谈不上辛倒是徐旨乾心直口快，不待吊梢眉坐稳，立即发问：“你们的宣处长哪里去了？他的老师来了，怎么也不来看看？莫非是居官自傲架子大吧？”

“哪里，哪里，宣处长本来昨天就要到车站去接周副部长的，因为前线

出了点事，他连夜赶到诸暨去了。临走时再三关照属下，务必做好接待工作，保障周副部长的安全。”吊梢眉连忙解释道。

“那你今天是代表宣处长来的啰？”

“不敢当，有这么点意思。”

“你准备怎样保障周副部长的安全呢？”

“周副部长不是要到下边视察。还要到绍兴去省亲吗？我准备全程陪同——”

严北溟想到昨夜三角眼的活动，分明是以“保障安全”为名，行“严密监视”之实，心里着急起来，便打断吊梢眉的话说：“‘全程陪同’就不必了，周副部长所有的活动，都由抗敌自卫团总部与省政府安排。”

吊梢眉不满地瞪了严北溟一眼。他素来就讨厌这个左倾分子，把严看做是黄绍竑的笔杆子与“高参”。心里想：你小子跳吧，等周恩来走了，老子不收拾你才怪哩，但在嘴上却说：“严主任有所不知，这保卫工作与政治指导室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必须由我们这些专人负责。再说我们宣处长又是抗敌自卫团队的副司令，抗敌自卫团总部的事也就是我们的事……”

“哎呀，你这弯弯肚肠怎么有这多弯弯理由？！”徐旨乾在一旁听得不耐烦，不客气地打断道：“告诉你吧，这陪同、警卫、保护的任務，张绍棠张参谋长早作安排了，用不着你脱裤子放屁，多管闲事！”

“此话当真？”吊梢眉了解徐旨乾的脾气，不敢与之较真章，硬碰硬，他有点傻眼了。

“这是真的，张参谋长今早对我说的。”严北溟一心为了周恩来的安全，无意却暴露了自己。

吊梢眉还想说些什么，就在这时警报响了，尖锐刺耳的哨音旋过城市的上空，带起惊恐不安的声浪，顿时引得金华一片混乱。

“日寇飞机进城了！”

“据说轰炸的重点是党、政、军。”

“快跑呀，再不跑就没命啦！”

呼喊之声不断传来，吊梢眉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拔腿向门外奔去，但他刚跨出几步就站住了，因为屋子里的人都没有动，无数双眼睛正冷冷地瞧着他，瞧得他身上起了层鸡皮疙瘩，连忙回到原座，搭仙道：“这年头，听到警报就跑防空洞，已成为条件反射……我看这日寇飞机是冲着周副部长来的，是不是请周副部长到后院防空洞里暂避一时？我们大家也跟到那边去吧！”

徐旨乾却说：“请问杜科长，你怎么知道这飞机是冲着周副部长来的？难道你与日本人通过电话？”

严北溟也附和道，“是呀，保安处的保密工作一向做得不错，曾经受到过委座的嘉奖，周副部长到金华的消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

吊梢眉暗叫一声：“糟了！”由于自己的不慎失态，让这二人抓住了辫子，不觉为之语塞。

周恩来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这时解围道：“杜科长叫我们防空，也是一片好意，你二位就不必追究那些细微末节吧！”

周恩来的副官邱南章说：“既然拉响警报，说明敌机已经入侵，大家还是到后院去躲一躲为好。”

“好的，好的。”人们应答着走出房间。狼狈不堪的吊梢眉乘机溜走。

一会儿功夫，房间里只剩下周恩来、邱南章、徐旨乾、严北溟4个人。

严北溟关切地说：“周副部长，你不去防空洞避一避？”

周恩来说：“不了，据我在重庆的经验，这警报有预报、正报、解除等多种，由于情况来源不一，有的警报也不一定正确，我们不必把它太当一回事。现在人少，正好去抗敌自卫团总部拜会张绍棠参谋长，商议一下去罗店造访的事。”

果然不出周恩来之所料，当人们散去不久，消息传来：刚才的警报是假的。

周恩来在马副官的陪同下，到抗敌自卫团总部会见了张参谋长与杨处长。

张参谋长说：“黄主席尚在天目山，主持沦陷区政治工作队会议，罗店的黄公馆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周恩来说：“我与季宽先生有过约定，到浙江后一定要好好畅谈几次。我已经到达金华，怎能不去他府上拜访？听说有人想推迟甚至取消黄周会晤，我去罗店就更加必要了！”

“既然如此，我们马上安排。”

罗店在金华郊区，离城15公里。黄绍竑会馆位于罗店东山岗，由于战时条件有限，建筑比较简陋，但靠山面坡，林木扶疏，风景优美宜人。

这天过午，黄绍竑的副官陈亦南正在客厅看报，突然听到一连串的汽车喇叭声，连忙跑出门外，但见二辆军用吉普、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从轿车里走出一个穿黄呢军装、佩中将衔的将军来。

陈亦南一阵激动，欢呼道：“周副部长，你已经视察完新四军军部，到金华来了？”

周恩来与陈亦南握了握手，高兴地说：“我是昨天傍晚到达金华的。季宽先生有消息吗？”

“黄主席昨天下午刚刚来电，询问周副部长你到达金华没有，只待副部长一到，他马上下山，赶来与你会晤。”

“季宽先生不是在主持沦陷区政治工作队会议吗？不必打扰他了，还是我去天目山找他吧！”

“这怎么行呢？此去西天目，要经过兰溪、建德、淳安、分水、于潜，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有的路段还得弃车步行……这怎么行呢？”陈亦南双眉一皱，犯起难来。

“陈副官，你是担心我的身体吃不消吧？”周恩来抡了抡胳膊，踢了踢腿，微笑道：“老实告诉你，我的身体结实着哩！要不信，你可以跟我比比试试……”

二辆军用吉普中的人均已下车，有马副官、邱南章、刘良模、邵荃麟、翟毅（中共金衢特委青年部长兼金华县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浙江潮》编辑）、匡辛芜（共产党员，公开身份是《青年团结》周刊主编）、徐进（共产党员，公开身份是《东南战线》编辑）等。

刘九洲始终跟在周恩来的身边。这时插话道：“陈副官，我们周副部长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雪山、草地都过来了，还在乎到西天目山这点路程吗？”

众人都说：“小刘讲得对！”

周恩来笑着埋怨道：“小鬼，不要耍贫嘴！”

陈亦南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说：“好吧，那我护送你去。什么时候出

发？”

马副官接口道：“明天上午10点钟，总部派我护送周副部长，咱们一起去。此事其他部门尚不知道，张参谋长要求严格保密。”

“好的，今晚我便电告黄主席。”陈亦南一边答应，一边请大家进入客厅，落座，献茶。又应周恩来之请，带领他们在黄公馆周围走了一圈，就某些情况作了介绍。

黄公馆里有一个鱼池，面积不大，但清可鉴人，黄绍竑公余常常来这里垂钓，是个幽僻、安静的地方。

在鱼池边，周恩来同陈亦南拉起了家常，问陈是哪里人？家庭情况如何？陈亦南就谈了怎样从广西家乡出来，现在当上黄绍竑的少尉副官的经过。

周恩来说：“看来，季宽先生还是挺器重你这个小同乡的嘛！”

陈亦南说：“所以，我很感激黄主席的知遇之恩。中国有一句俗话，‘士为知己者死’，为了黄主席的大业与安全，我将竭诚努力，不惜一切……”

“难得你有这份忠诚，季宽先生能找到你这样的副官，也算不错了。”

“黄主席是个工作起来就不要命的人。在杭州，各方面的条件还可以；日本鬼子来了，把我们赶到金华罗店，吃住都不方便，近来他比过去瘦多了。”

周恩来点点头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只有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中国才有出路，家庭才有保障，个人才有前途。你尽一切努力照顾好季宽先生，是对的，是符合抗日这个大方向的。”

“可有人却不这样看，还在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黄主席每干一项工作都要遇到重重困难与阻力。去年6月，竟有人背着他打报告给蒋委员长，说‘本任政府声名狼藉’，以致于委座来电批评，黄主席一气之下向中央提出了辞呈，幸亏委员长多次慰留，总算没有卸任。”

“这说明：坚持团结抗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每一步胜利都需要斗争，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与汪伪反动势力斗，与我们队伍中的投降派斗，与一切分裂主义的倾向斗。同时注意团结，团结最广大的人民，团结所有拥护抗日的党派与团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周副部长，你讲得太好了！”陈亦南激动地说。

与此同时，在鱼池的另一侧，在假山下，邱南章与邵荃麟、翟毅、匡辛芜，围坐在一张石桌边，轻声地商量着什么。

邱南章问：“刘英同志到金华没有？”

邵荃麟答：“刘英同志是前天到的，他正急着要见周副主席哩！因为国民党特务对他盯得很紧，他不便于公开露面，只好托我来请示会面地点与联系办法。”

“周副主席也急于要见到他，今天一早就吩咐我，乘来黄公馆的机会，找你们几个商量。”

匡辛芜说：“会面地点就在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好了，白天人多不方便可以改在晚上。”

翟毅反对道：“不行，旅行社早让保安处控制了，从掌柜到茶房多换了他们的人。原来的工作人员只剩下勤杂工小杨与女招待小方等不几个。要不是严北溟严先生与张绍棠张参谋长坚持，这几个人也换了。”

邵荃麟想了想说：“新四军张科长、曾秘书他们不是住在大东旅社吗？何不以探望张、曾等人为由，把会面地点定在大东旅社呢？”

翟毅眼睛一亮，高兴地赞成道：“大东旅社好，张科长、曾秘书他们是与周副主席一起到金华的，周副主席原拟住在大东旅社，从旅行社走到大东旅社去看他们，不会引起什么怀疑。”

匡辛芜也同意道：“还是大东旅社好，张科长、曾秘书都有新四军的合法身份，到时候还可以派几个人在屋外站岗，保证会见的绝对安全。至于会见的时间嘛——”

“就定在今天晚上！”邱南章接过匡辛芜的话头说：“今天晚上，张绍棠参谋长与徐旨乾参谋长要分别代表黄主席与刘总司令宴请周副主席，席散后我陪同周副主席来大东旅社，刘英同志则请你们通知。”

“好！”

“就这么办。”

其余三人十分愉快地答道。

恰在此时，张副官从外面进来，找到了鱼池。

他对邱南章说：“邱副官，周副部长不是想游双龙洞吗？我已找来轿夫，备好轿子，请你转告周副部长，可以去了。”

邱南章忙绕过鱼池，将张副官的话转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问陈亦南：“双龙洞离这儿远不远？”

陈亦南答道：“不远，就在北山。”

“就是你们屋后这座最高的山吧？”

“是的。它实际上是金华山与赤松山的合称。金华山又名长山、常山，是我国道教的第三十六洞天；赤松山传说为晋代皇初平得道之处，初平号赤松子，所以叫赤松山。最高峰 1308 米，风景区位于 500—800 米之间，面积约 2.5 平方公里。这里的地质为流纹岩区，周围有石灰岩显露，水溶后形成许多千奇百怪的岩洞，著名的有双龙洞、冰壶洞、朝真洞，合称北山三洞。其他古迹，还有智者寺、鹿田书院等。”

“哎呀，看不出来，陈副官你年龄不大，知识蛮丰富的嘛！”

“哪里，哪里，这都是黄主席栽培的结果。他喜欢游山玩水，每到一处都要搜集有关该处名胜古迹的志书、资料，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季宽先生这个爱好，我早有所闻。双龙洞，你们一定常去啰？”

“去过不止一次。它是北山三洞之一，由于洞口两侧的钟乳石像龙头，所以叫双龙洞。它分外洞与内洞两部分。外洞石质腻洁，纹如肌理，有冬暖夏凉之妙；内洞钟乳极多，千姿百态，使人留连忘返。内外之间有一条 12 米长的水道，有巨石横其上，必须仰卧轻舟，方能牵引入内。古人有诗说：‘洞中有洞洞中泉，欲觅泉源卧小船’，历来誉为‘水石奇观’。”

“洞中采光程度怎么样？”

“还不行，黑咕隆咚的，要点汽灯火把。”

“双龙洞附近有旅馆、饭店没有？”

“目前，都没有，只有几家民居，做点香烟、糖果的小买卖。”

“那么，平时去玩的游人也差不多了？”

“是的。这与交通不便大有关系，都是山路，又窄又陡，一般来游的人都得坐轿子。”

“如果把山路改成公路，在洞内装上电灯、汽灯等照明设备，再在洞外盖上几家旅馆、饭店……你觉得怎么样？”

“那就太好了！”陈亦南高兴得叫起来，“到那时，游客将大大增加，

穷人也可以光顾双龙洞了。”

看到陈亦南略带天真的喜色，周恩来也露出了宽慰的笑容：“等打败日本鬼子，等抗战胜利，你来办这些事情怎么样？”

“那敢情好。我一定要把双龙洞，不，是整个北山建设成为最美丽、最舒适的风景旅游区……不过，这一定要得到黄主席的批准。”

“那是自然，到时候，我替你跟季宽先生说去。季宽先生会批准的。即使情况有所改变，不批准你留在金华，也会批准你上别的地方。像双龙洞这样需要建设的风景名胜，在咱们中国是相当多的……英雄永远会有用武之地。”

“周副部长，你讲得太好了！”陈亦南又一次沉浸在激动之中，他感到周恩来既平易近人——这一点在国民党高级军官中是很少见的——又见识高远，跟这样的伟人接触，心胸会变得开阔，思想会变得高尚，自己几乎成了另外一个人……

离开黄公馆的时候，邱南章悄悄地向周恩来汇报了与邵荃麟等人商量的意见，周恩来原则上同意，希望他们考虑得再细一点，充分估计到一切可能性，务必保障好刘英同志的安全。

在春日午后的太阳照耀下，一行人向北山双龙洞方向开去。

五 春宵一刻值千金

欢迎宴会在当天晚上于太平天国侍王府的议事厅举行太平天国侍王府是金华的一处名胜古迹，与八咏楼（原名元畅楼）、天宁寺（旧名大藏院）、双龙洞等齐名。1861年春，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由安徽、江西进军浙江，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攻克金华。修葺原试院，又在于户所旧址构屋数重，为侍王府。分东西二院，东院有照壁、大殿（即议事厅）、穿堂、二殿和耐寒轩。西院有侍王书房及住宅筹建筑四进。此外，还建有练兵场和花园。西院有大量的壁画，内容大都以太平军的军事活动、居民的劳动生活为题材；还有形象凶猛的飞禽走兽等画面，有较高的文物价值。由于年代久远，房屋旧、漏，壁画残、损，急待修理，又因战乱，戎马倥偬，事事忙迫，无暇顾及。

宴会由张绍棠参谋长与徐旨乾参谋长共同主持。应邀作陪的有严北俱、省军管区干部教导总队副总队长谢家驹、省抗敌自卫团参谋处长裴时杰等17人。

张、徐二参谋长曾邀请省党部书记长方青儒参加，方将请柬看了一眼，便扔进了字纸篓。

“书记氏，你的意思是？”他的秘书惴惴不安地问。

“他们也邀请了宣铁吾啦？”方青儒不答反问，更使人莫测高深。

“没有。”

“为什么？”

“听说宣铁吾昨天就到诸暨前线去了。”

“避而不见，暗中监控？哈哈，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方青儒笑罢，指示秘书：“他宣某人会躲，我方某人也会装，你打个电话给张参谋长，就说我病了，无法参加。”

张、徐二人当然清楚方青儒婉言谢绝的原因，绝不是因为什么“病”，而是为了贬低周恩来的影响。

开宴前，周恩来先后听取了谢家驹与裴时杰关于浙西军政情况的汇报。

张绍棠首先致词：“值此战乱之时，周副部长不避流弹矢石，不顾个人安危，不远数千里，从重庆大后方来到我们浙江前线视察，这种精神确实使兄弟感动。在此，我谨代表浙江省政府黄主席，向周副部长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祝周副部长身体健康！”说罢，他举起酒杯与周恩来手中的酒杯碰了碰，热情地说：

“干！”

周恩来一仰脖，喝光杯中之酒，以空杯示人：“干！”

“真爽快！”周围的人都一致称赞道。

徐旨乾接着祝酒：“周副部长来浙江视察，是我们浙江的光荣。浙江地处东南前哨，直接靠近敌伪政权的中心，是兵家必争之地。相信通过周副部长的视察，必然军容整肃，政纪严明，实力增强，胜利有期。我代表第十集团军刘司令，预祝周副部长此行顺利，圆满成功！”

徐旨乾举起了酒杯，周恩来也举起了酒杯。

随着玻璃杯的一声碰撞，两人都叫道：“干！”同时将空杯相对。

“好酒量！”座中人无不翘首敬仰。

周恩来在一片掌声过后讲话。他说：“今夜能与大家一起在金华聚会，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首先，我要感谢省政府黄主席与第十集团军刘司

令的关心，没有他们的关心，这次聚会是不可能的；其次，我要感谢张参谋长与徐参谋长的安排，没有二位的安排，这次聚会也是不可能的；最后，我还要感谢在座诸位的光临，没有诸位的光临，今夜的聚会同样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中气十足、音调铿锵的讲话，使议事厅中所有的人的精神为之一振。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里聚会呢？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强盗侵略中国，广州、武汉已相继沦陷，浙江成了东南抗日前线。由无足轻重的地区变成——正如徐参谋长说的——敌我必争的地区，由偏安的形势转变为中心的形势，由沉寂转到紧急，我们是为抗日聚会到一起来的，因此，抗日也就成了我何这次聚会的主题。诸位请想一想，当前还有什么事能比得上抗日这件大事？还有什么任务能及得上抗日这项主要任务呢？”

“没有，确实没有。”

“哎呀，讲得太好了。”

二张酒桌上的人都纷纷议论道，厅内气氛顿时活跃。

周恩来扫视了一下全场，继续说：“所以，是否有利于抗日，应该作为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正确的态度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巩固和扩大浙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推动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以争取抗战第二阶段的胜利。”

“见解深刻，鞭辟入里。”

“真有政治家的风度，不愧为共产党的大人物！”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人人都竖起了大拇指。

周恩来高擎酒杯，大声说：“现在，我建议，为了浙江省团结抗战的大业，为了黄主席与刘司令的健康，为了张、徐二位参谋长的健康，也为了在座诸位的健康，干杯！”

大家一致起立，同声应和：“干杯！”

酒过三巡，一个蓄小分头、穿西装的青年，拿着采访簿走到周恩来面前，恭敬地说：“周副部长，我是《东南日报》的记者，我想占用你一点时间，对你进行采访。”

周恩来从旁边拉过来一张椅子，请那位记者坐下，然后说：“你有什么问题就提吧！”

“请问周副部长，你与浙江有何关系？”

“本人原籍浙江绍兴，生长于江苏淮安，此次系属初履乡土，深觉快慰。”

“这次东南之行的目的与任务？”

“代表陈诚部长，参加第三战区政治工作会议，并与赣省熊主席、浙省黄主席约晤，洽商公务，顺道赴前线视察。”

“听说你要去绍兴省亲，不知何日启程？”

“是的，本人在浙勾留日期，拟与黄主席电约后决定，返绍兴原籍省亲当抽暇进行。”

“对于当前时局，不知副部长有何高见？”

“这次来浙江之前，我在皖南前线勾留了两星期，观察敌人的动作。发现日寇正建筑堡垒，巩固占领区域，利用平地与交叉纷歧的河流，妄图‘肃清，我游击部队。与此同时，配合军事行动，他们加强了政治经济侵略步骤。如尽量吸收安徽的茶叶、大米，江苏的蚕丝等，换取外汇，以达到利用我国财力、物力以残杀我国人的目的。这些，都是日寇对我速战速决失败后，应

付我第二期抗战的新阴谋。”

“请周副部长对今后作一展望，”

“今后日寇进攻之路线，恐将着重于西北。由于我军配备力量雄厚，又有黄河天险，与冀晋我部队的牵制，一经前进，补充不易，估计敌人不敢冒此大险……整个形势是从一期抗战进到二期抗战的时期，而二期抗战照蒋委员长的解释，是我们转弱力强，转败为胜，走入反攻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照我们党中央毛主席的解释，是进入持久战时期，由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过渡到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再过渡到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最终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周副部长，你讲得真好，谢谢你！”

宴会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直到9点钟，方告结束。

省保安处的吊梢眉科长主动“出击”，殷勤地说：“周副部长，请乘我们保安处的车子，回旅行社吧！”

严北溟一听急了。心想：乘谁的车子都可以，就是不能乘保安处的，连忙阻拦道：“还是乘抗敌自卫团总部的车子为好，保安处就不劳驾了。”

吊梢眉恶狠狠地瞪了严北溟一眼，不满地说：“严主任，你怎么老是跟我作对？”

“哦，请别误会，我是说抗敌自卫团总部的车子已供周副部长用了一个下午，司机跟周副部长也熟悉“如果论及安全，哪个部门的车子都比不上我们保安处的！”

“不，不……”严北溟一句“不见得吧”正要脱口而出，周恩来怕他过于暴露，及时插话打断：

“北溟兄，杜科长，你们不要再争了！你们的盛情，恩来心领，我们自己有车，此刻也不准备回旅行社——”

吊梢眉有些失望地问：“周副部长，不回旅行社，你准备到哪里去？”

“去大东旅社，找新四军科长张金铎。”

周恩来明白无误的回答，反使吊梢眉无隙可钻，无疑再问。

金华的春夜是迷人的。虽然处在战时，店铺早就打烊，家家关门闭户，但馄饨担、酥饼摊、香烟篮仍活跃在街头，即使灯火管制也不受影响，那一盏盏风灯发出甜香、诱人的光，那极富浙西韵味的叫卖声更使人驻足停步。

周恩来一到大东旅社便问：“刘英同志来了没有？”

张金铎答道：“已经来了，现正等候在我的房间里。”

“注意做好警卫工作，在我与他密谈的时候，务必不让任何可疑人员闯进来。”

“我已安排妥当，在门外、走廊与天井都设哨巡守。”

“好，我们现在就去吧！”周恩来说着，便同张金铎、邱南章一起，走进了19号房间。

正在看报的刘英正待离座起立，周恩来已走到他的面前，双手握住他的右手说：“刘英同志，你好！”

刘英起立站好，也用双手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副主席，你好！”

“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看望你，看望浙江省委，看望在浙江前线艰苦卓绝为党工作的同志们。”

“谢谢周副主席，我们浙江省委和浙江人民，无时无刻不想念党中央，

想念毛主席呀！……’说着，说着，刘英竟哽咽起来。

他怎能不激动呢？自从主力红军离开江西北上，特别是自从抗日战争开始，他和他的同志们便远离党中央，很难得到党中央的直接指导，而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完全靠自己来判断，该有多么困难啊！

1936年6月，以刘英为书记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福鼎县排头村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在民族危亡的重大关头，把闽浙边地区的苏维埃政权改称为“人民革命委员会”，以利于更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的爱国人士一致抗日。会上推定郑丹甫为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郑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而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闽浙边区，特别是前歧地区的人民群众中颇有威望，并善于做统战工作。

这年冬天，闽东党开始了抗日活动。浙江平阳的黄先河、福安的郭文焕，从外地弄来了一批文件，其中有我党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上所载的《共赴国难宣言》、《告国民党书》等。他们即根据这些文件进行工作，把闽东苏维埃政府改为闽东人民苏维埃政府。1937年春，成立了闽东抗日政治委员会，主席叶飞，副主席阮英平、范式人，并把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改为中国人民红军独立师，发表布告，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提出了我党方针政策所作的改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被迫接受了在全国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背地里却下达了“北和南剿”的密令，妄图以武力摧毁我党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国民党军闽、浙、皖、赣四省边区绥靖主任刘建绪，奉命统帅大量正规军“进剿”我浙南游击区。当此严重的形势下，刘英一方面按照省委峰门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分兵七路，坚持自卫，开展游击战争，坚决迎击进犯之敌；另一方面仍决定任用一批政治上坚定，在浙南地区的上层社会和一般群众中有威望而又善于独立地做统战工作的干部，如黄先河、黄耕夫、董启文、陈铁军、杨进、吴毓等，在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1937年3月，浙南地下党的吴毓从上海回到温州，带回了2月10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准备转送给在平阳北港坚持斗争的刘英。由于国民党军“进剿”，一时无法找到，只得折返温州。经与省委派驻温州的白区工作团团团长黄先河和黄耕夫等研究，决定不失时机，“先斩后奏”，根据党中央文件的精神，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闽浙军区的名义，拟了一份“快邮代电”稿，主动提出与国民党浙江地方当局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国民党当局在经过一番试探后，于4月23日在《浙西日报》上刊登了“紧急启事”，要求我方派代表与之联系。吴毓、黄先河等见报后，不敢自专，再次辗转跋涉，绕过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线，终于在瑞安的山门纸山找到刘英，汇报了前后经过。刘英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以党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文中所提出的条件和保证为依据，指定吴毓、陈铁军、董启文为我方谈判代表，同国民党当局商谈在浙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5月，双方代表在闽浙边游击根据地的平阳县山门纸山小学举行了第一次和谈。后因国民党当局违背了两党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精神，企图在谈判桌上达到其在战场上所未能达到的彻底消灭红军和游击根据地的反共目的，谈判宣告失败。

七·七“卢沟桥事变”，导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刘英闻讯，彻夜未

眠。第二天，便以临时省委名义发出通电与宣告，敦促国民党当局，“应无条件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此之前，党中央曾以刘建绪旧时同学贺龙将军的名义给刘建绪写过信，晓以民族大义，呼吁一致抗日。加之“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东南沿海战局危急，国民党军实际上已无力再进犯红军，因此8月下旬，刘建绪同意重新进行和平谈判。刘英当即决定由吴毓、黄耕夫作为中共代表，同刘建绪指定的国民党当局代表邓切，在温州申江旅馆进行了两党的第二次和平谈判，并顺利地达成了原则协议：一、闽浙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按照国军的编制，待遇与国军相同；二、闽浙红军在瑞（安）平（阳）泰（顺）三县边界以峰门（在泰顺县境内）为中心集中，期限为半个月；三、红军集中时，如遇国军或地方部队攻击，由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负责，如红军发生暴动，则由闽浙边省委负责；四、无条件释放政治犯；五、一切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和谈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在实际行动上确曾有所表示。先将关押在监狱里的中共党员邓扫空、陈急冲、张忍之等释放；接着衢州、瑞安、平阳等地监狱中的一批政治犯也陆续出狱。

为了进一步巩固第二次和谈的成果，刘英还以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的身份，于9月13日同国民党当局的代表王裕光、詹行烈，在平阳县凤林乡会见，并请对方到山门继续谈判。在谈判中，刘英在肯定第二次和谈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如把红军集中的地点由泰顺的峰门改为平阳的山门；将原协议中“根据国军编制”的措词改为“根据任务编制”：关于红军部队的调动则加上“必须请示我党中央才能决定”；同时还与对方商定“目前宣传工作应根据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原则进行”等等。由于第二次和谈已奠定了团结抗日的基础，我方的接待热情礼貌周到，所提修改意见也都合情合理，因此王、詹二人的态度也较好，有些问题当场就表示同意；有些问题难以作主，则留待以后解决，实际上后来基本上采纳了刘英的意见。

至此，在闽浙边区（主要是浙江）境内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终于得以实现，为抗战初期地处东南前线的浙江省抗日救国高潮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想到这一切，刘英怎能不激动呢？

“你们的情况，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了解的。”周恩来也止不住澎湃的心潮，带着感情说，“远离党中央，政治形势又那么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完全靠自己决定战略、战术，是多么不容易呀！今天看来，你们的处置与决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符合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浙江抗日新局面的形成，是与你们的努力分不开的。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感谢你们，感谢浙江省委和全体同志。”

刘英再一次握住周恩来的双手，感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时，张金铎已给他们泡好了茶，向邱南章打了个招呼，邱便跟着张一起退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周恩来与刘英二人。他们便坐在墙角的沙发上密谈起来。

刘英向周恩来汇报了最近一年的工作。

周恩来向刘英介绍了当前全国的局势。

周恩来指出：日寇进攻武汉，蒋介石惊恐万状，几十万兵马溃不成军，仓皇指使其部下在洞庭湖畔搞什么“焦上抗战”，火焚长沙古城，损失惨重，民怨沸腾。最近，衡山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我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会上详细分析抗战形势，提出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的方针。这是大义凛然，无可辩驳的，镇住了会场上的歪风邪气，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和蒋介石一部分嫡系部队的将领均表示支持，蒋介石也只好被迫表示接受。当然，也有一些人私下议论不同意的，但没有一个敢公开站出来反对。你们可以根据这个方针，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做工作。

周恩来说：“目前浙江的政治形势还算好的。自然也有反共磨擦的逆流，我们要提高警惕。今后工作的困难会多起来，但只要我们正确对待，坚持原则，同时十分注意策略，这些困难是会克服的。”说到这里，周恩来离座在室内绕了一圈，又回到刘英面前，接着说：“要正确认识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这个人。他是属于桂系的，有爱国抗日之心，自前年12月第二次来浙主政后，起用了一些进步人士，颁发了有利于抗日的战时政治纲领和施政措施，跟复兴社、C.C系产生了相当大的矛盾。充分调动他的积极因素，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但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迫于蒋介石的政治压力，也有可能发生动摇，做出些不利于我党、不利于抗日的事来。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工作。”

刘英已经很久没有直接听到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了，今夜听了周恩来的分析，顿感心明眼亮，回答说：“周副主席讲得对，对黄绍竑我们要坚持一分为二，充分利用他的积极面，设法限制他的消极面。”

“同时要抓紧做好群众工作，广大工农群众还有革命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我们依靠的主要力量。至于党的工作，”周恩来坐下喝了一口水，接着说，“浙江党的组织经过了——你刚才讲到的——1938年的大发展，今后要加强巩固工作，也要继续发展，但要重视质量，对来历不明、政治面目不清的党员要进行审查，严防国民党特务、汉奸混入党的组织。”

“对，周副主席讲得对。但不知我党同抗日友党友军交往时，应遵循什么原则？”

“同抗日友党友军交往，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不卑、不亢，不骄、不躁’。所有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要埋头苦干，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以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行为，吸引更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一道进行工作。”

“周副主席，你讲得太深刻了！我跟几个省委常委商议过，准备马上召开省委工作会议，请你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作指示。”

“这个会议恐怕要推迟一下。我明天上午就动身去天目山，与黄绍竑会晤，商谈浙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大政。然后顺道去绍兴省亲，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搞些调查研究，取得对浙江问题的发言权。”

“好，那我们就等周副主席回到金华时再开会吧！届时，东南局副局长兼组织部长曾山、东南局宣传部长兼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江西省委书记郭潜、福建省委常务兼组织部长范式人等同志也会到金。”

周、刘密谈一直到午夜一时，方告结束。

刘英站起来就要告辞，让周恩来一把按住了：“怎么，你忘了事先的安排，应该告辞的是我，而不是你。”

刘英以手加额道：“哎呀，都怨我，心情过于兴奋，把事先约定的忘了。”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在前线工作的同志，更应该注意安全，因为你们的生命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党的。”“对。”

“今天上午有两个年轻人来看我，我送他们出门，他们连身也不回一下子径自走了，这个告别的动作不合秘密工作方法，如果门外四周有人窥视，他们就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将转告这二人。”

金华的春夜是迷人的。三月的夜风带着暖意，宁静的夜空充满芬芳，那一天闪烁的寒星仿佛也具备了温情，提示着哲理，显示着希望。

刘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赞叹道，真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六 目标：天目山

3月19日上午，在接见了新安旅行团张杰、朝鲜义勇队战地通讯员韩志成等人以后，周恩来即往抗敌自卫团总部辞行。于10时15分，由陈亦南、马副官护送，偕同邱南章、刘九洲，乘车前往大目山。在车中，周恩来问马副官：“天目山，你去过吗？”马副官答：“去过一次，走的就是这条路线。”“那你算是旧地重游了……”

“哈哈哈哈哈……”

周恩来转向陈亦南：“你是第几次？”

陈亦南答：“第三次。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为什么？”

“因为前两次，都是跟着人家走，稀里糊涂的；这一次，则是当向导，陪周副部长，头脑清醒得很。”“你这话讲得很有道理。”“其实，‘向导’我是担当不起的。具体路线，我比你们熟悉；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你比我们熟悉。真正的向导应该是周副部长你，而不是我。”“陈副官，过谦了。”

车子迅速地驰过金华大桥。

到兰溪过渡时，发现人头攒动，车塞于途，呵斥声、争吵声聒噪于耳。

“怎么回事？”司机停车，探首窗外发问。“顾祝同顾司令的宪兵队封锁了白沙渡口，过往车辆、人、货都必须接受检查。”一个老板模样的中年人答道。

“检查快吗？”

“慢得很哩！严得要命！证件不全，便不放行；稍有嫌疑，便于扣留。轮到你们，恐怕要过两三个时辰哩！”

“这怎么行？！”司机着急起来。

“没关系，我去跟他们的队长说说。”陈亦南说罢，打开车门，穿过车队、人群，向渡口走去。不一会儿，他回来了，后面跟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宪兵。

“让开！让开！”宪兵们粗暴地驱赶着拦路的车辆与人群，“你们长眼睛了没有？这是省政府黄主席的专车，上面有中央政府的大员，耽误了他们的公务，老子让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一条大道立即出现在眼前，渡口那边专管车辆过渡的轮渡也准备好了。

在羡慕、敬畏、不满等各种意味的眼光中，他们的车子顺利地上了轮渡，并过江到了对岸。

刘九洲赞扬道：“陈副官，幸亏你去打了招呼，要不然傍晚也到不了淳安。”

周恩来微笑着没有说话，他一向遵守秩序，从不僭越抢先，但考虑到是战时，军机紧急，也不反对陈亦南的这一做法。

马副官没有插话，他双眼正视前方，蓦地欢叫道：“淳安，淳安已经到了！”

一座山城向他们迎来，独具特色的淳安方言使他们感到快慰。

在县政府吃晚饭时，陈亦南看见桌上菜蔬不多，颇有意见，正想找县长加菜，被周恩来一把拦住了。

周恩来问：“陈副官，你吃过‘梢子饭’吗？”

“没有。”陈亦南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我连‘梢子’是什么也不知道……”

“‘梢子’是一种野生植物的种子，江西的田野多的是，可以当代食品。当年我们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物资相当紧张，特别缺少粮食、油和食盐。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更为了渡过难关，党中央号召红军干部和战士用‘梢子’代替一部分粮食。我们便拿水淘洗干净，然后放在小篓里蒸熟，群众给它安了个名字，叫做‘梢子饭’。”

“这种饭，你也能吃吗？”

“红军干部和战士都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呢？”

“周副部长，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说：过去连‘梢子饭’都能吃，今晚这顿饭怎么不能吃？”

“是呀，与缺粮少盐的日子相比，今晚可是在享福了。”周恩来带头拿起筷子，夹起一筷青菜豆腐，“哧吧哧吧”地吃起来，吃完他点头称赞道，“这菜很好吃，好吃，大家吃吧！”

“哈哈哈哈哈……”众人都被逗笑了。

刘九洲一边吃饭一边说：“陈副官，我们的周副主席不仅能吃‘梢子饭’，还能吃烤青棵、苦苦菜哩！”

“烤青棵？苦苦菜？那是什么时候？”

“那是1935年8月，红军过雪山到达松潘草地附近的毛儿盖。当时，正值青黄不接，部队已经断粮。而地里的青棵刚刚灌浆，只有七八成熟。红军向藏族同胞买了地里的青棵，因为没有磨，就拔青棵烤着吃。周副主席身体虽然不好，也跟大家一起围在篝火边，边烤，边搓，边吃。还有一次吃苦苦菜，是周副主席带的头。他首先端起碗来吃，并且鼓励红军干部和战士：明天要战斗了，同志们吃饱肚子好上战场。我们今天吃苦苦菜，是为了共产主义幸福的明天。他的话音刚落，大家都呼噜呼噜地吃起来。”

“周副部长能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太不容易了！”马副官赞扬道。

“这叫率先垂范，身先士卒。”陈亦南说。

“小鬼，你又在耍贫嘴了！”周恩来则批评刘九洲道，“古人云：食无言，寝无语。你这么哇哩哇啦的，小心我们把饭菜全部吃光了，让你饿肚子，明天走不动路，可别喊娘哇！”

“哈哈哈哈哈……”又是一阵欢乐的大笑。邱南章说：“要不是周副部长提起，我倒忘了。陈副官，明天到分水的路怎么走？”

陈亦南说：“明天到分水要一步步上坡，然后一步步下坡，路窄不好走；分水到于潜从河边走，路平。”周恩来说：“既然如此，吃完饭，大家都早点安歇吧！”

这天晚上，他们住在县政府后面的院子里，周恩来睡里面的一间，邱南章、刘九洲、陈亦南、马副官四人睡外面的一间。

周恩来走进里间便开始办公，根本没有要睡的样子。

陈亦南说：“周副部长叫大家早点安歇，他自己怎么不安歇呢？”

刘九洲说：“这是他的习惯，不管白天怎样劳累，每晚都要工作到深夜。”

马副官说：“你进去劝劝他吧，明天一早启程，还是早点睡吧！”

“没有用，谁劝他，他都要办完公。”

“真是智慧过人，精力过人。”

陈亦南说：“反正咱们这会儿也睡不着，还是请小刘讲讲周副部长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吧！”

马副官应和道：“好！”

刘九洲推托道：“不行，不行，我可讲不了。”

陈亦南诧异地说：“刚才吃饭时，你不是讲得很好吗？”

“我是现买现卖，从邱副官那里批发来的。”

“那我们就请邱副官讲讲。马副官，你赞成吗？”

“我赞成。”马副官答道。

“我也是听来的，如有叙述上的差错”，由我负责，与周副主席无关。”邱南章在作了简短的声明后，便讲起来：

“长征开始的时候，周副主席就病了（听说患的是肝脓疡），整天高烧不退，疼得不能功，全身流汗。看护员打算从部队弄点药来给周副主席治病。这事让他知道了，严肃地制止说：‘战士比我们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有什么呢？除了止痛片，就是退烧药，没办法，只好每到一宿营地，就赶紧到处买药。幸好，在一个集镇上买到了二两木耳，这就是在整个长征途中给周副主席弄到的唯一高级‘药品’。

“翻越邛崃山时，周副主席的病情越来越重。毛主席十分关心，指示警卫连，绝不能让周副主席步行过雪山！警卫连准备了一副担架抬他，周副主席却忍着剧痛，大部分时间步行，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勉强在担架上躺一躺。爬山前，他把自己的重病置之度外，召集各部队的主要负责人研究工作，布置任务，还要他们通知部队，准备好衣服、粮食。这种精神，使全体官兵都十分感动。大家说：‘有周副主席作榜样，红军面前，没有翻不过去的大山，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进入草地后，生活更艰苦。原来带的马肉、青棵面都吃光了，周副主席的病也更重了。草地的气候说变就变，刚才烈日当头，转眼会下起冰雹。春、夏、秋、冬可以在一天中轮回。宿营的时候，警卫员们选择干燥一点的高岗地，燃起篝火，请周副主席在担架上休息。单薄的夹被，哪里挡得住刺骨的寒风？大家都为周副主席的身体担心，不增加点营养，何时才能康复呢？于是，想方设法，找来了两把米，煮了一小缸稀饭送给周副主席。他没吃，却反问警卫员：‘这米是哪儿来的？现在部队吃什么？难道不知道吗？’

“看护员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缸稀饭都不应该吗？’

“周副主席当然理解看护员和警卫员们的心情，他亲切地说：‘小刘呀，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战士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绝对不能说离群众搞特殊。好坏大家都要一样。’

“其实，哪里‘一样’呢？”

“长征到达陕北，条件开始好转，战士们都穿上了新棉衣，周副主席却还穿着单薄的、破了袖口的旧棉衣。警卫员要去供给部为他领一件，他不肯，说：‘补一补，我还可以穿一个冬天。’

“进驻瓦窑堡后，战士们都吃上小米饭了，周副主席还在吃南瓜、锅巴。为了调养刚刚病愈的身体，有一次，炊事员炒了点好菜给周副主席送去，他立即叫刘江萍端回去。小刘忍不住，说：‘锅巴蛮硬，您吃了不好消化哩！’

“周副主席学着小刘的江西腔，亲切地说：‘可以哩！’接着又说：‘现在条件好了，我们更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不能特殊化。就是今后胜利了，我们也不能脱离群众，也要和群众过一样的生活！’

“……关于周副主席的故事多着哩，今晚我先讲到这里，我得进去看看他，劝他快点休息。”

邱南章说罢，走进了里间。不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陈亦南与马副官都关切地问：“怎么样？周副部长答应休息吗？”

邱南章摇摇头说：“没有，他还要工作一段时间，让我们早点睡觉，不要陪他。”

陈亦南感叹道：“多好的一位长官！”

马副官说：“可惜，我们国民党内这样的人太少了……”

3月20日，淳安县政府备了马和轿。因为路窄，高低不平，旁边有深坑不安全，他们请周恩来上轿。

周恩来看了一眼淳安轿夫，摇着头说：“不，我不坐轿，自己走。”

“周副部长，你别看这几个轿夫黑、瘦，身子骨可结实着哩！这条路，他们走了二十几年，闭着眼睛也能摸得到，安全绝对不成问题。”淳安县长解释道。

“县长，你想差了。”邱南章代替周恩来回答，“咱们的周副部长一向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只要大家在走路，他是不肯坐轿的。”

“周副部长不是中央大员吗？怎么还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县长想了一下，又自我解答道：“周副部长是老廿八 ，恐怕是这个原因吧？”

周恩来点了点头。

邱南章等人会意地笑了。

告别了淳安县长，他们踏上了坎坷的道路，周恩来问山问水，跟大家愉快地交谈着，显得十分轻松。

陈亦南说：“周副部长，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陈副官，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问吧，别客气！”周恩来一边回答，一边放慢了步子。

“大前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抗日，实行兵谏，扣押了蒋委员长，许多人都主张杀掉他，周副部长你为什么不同意？”

“哦，你说的是‘西安事变’？”周恩来在一棵直插云天的松树前站住，回答道：“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对此作过专门的分析，‘西安事变’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将使中国的前途变得糟糕起来。因此，我只同意前者而不同意后者。”

淳安负责送行的一位科长问：“我记得贵党一向是主张反蒋抗日的？为什么变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跟蒋打了十年仗，势不两立，为什么不趁机报仇，处置他？”周恩来回过头来，温和地问。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个问题，当年我去王曲军官学校时，也有人提起，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举了个例子，便解决了。”

“周副部长，你举了个什么例子？”马副官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说，我们红军中有位将军，叫徐海东。他全家36口人，被杀害了35人，只剩下他自己。这个仇够深的吧？可是，他也不同意杀蒋介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来讲，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马副官感叹道：“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啊！”

陈亦南称赞道：“一切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好！”

那位科长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走到周恩来面前，鞠了一躬，说：“周副部长，你们共产党不念旧仇，以国家民族为重，鄙人打心眼里佩服。”

周恩来亲切地说：“听你的口音是江苏人？咱们算是老乡了。”

“我是江苏南京人，是在南京沦陷后来到淳安的。”

“咱们更应该团结起来，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

“周副部长说得对！”

在路上，邱南章告诉陈亦南，周副主席为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大量工作，真是废寝忘食，绞尽脑汁。

事变发生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周恩来整整颠簸了三天两夜，从保安赶到了古城西安。他顾不得旅途的劳累，立即和张学良将军交谈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开了两个会，接着同杨虎城将军商量了一个下午，又挤时间拜访了杨的交际处长申伯纯。他尚未回到住地西京招待所，中共西北支部负责人徐彬如已在该处等候他了，因为晚上8时还要会见各界知名人士。如此紧张的日程，这样繁重的工作，使大病初愈的周副主席劳累万分，鼻血直流，豆大的汗珠一个劲儿地往下淌。徐彬如见状于心不忍，建议会见改日举行。周副主席坚决不同意。他说：“‘西安事变’能否实现毛主席和平解决的方针，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事。相比之下，我个人的休息和健康算得了什么？大家工作那么忙，好不容易集合在一起开个会，怎么能随便改期呢？”

周副主席问徐彬如：“从这里到会见的地方要多少时间？”

徐彬如答：“大约二十来分钟。”

“那么，还有一点时间，让我睡5分钟，好吗？5分钟后，请一定叫醒我。”说罢，周副主席头枕胳膊，闭上眼睛，很快便响起匀称的鼾声。

眨眼5分钟就到了，叫还是不叫？徐彬如犹豫不决，周副主席却已站立起来，问道：“没有超过时间吧？”

“没有。就是太少了！5分钟能顶个啥？周副主席，您再睡一会儿吧！”

“够了。各人有各人的睡觉习惯，有的人积在一起睡，我呢，分散睡，这里5分钟，那里5分钟，加起来也就差不多了。时间不早了，咱们快走吧！”说完，周副主席就精神抖擞地奔赴会见的地点去了。

这时，周恩来正在上坡。他不要刘九洲搀扶，也不要马副官帮忙，挺胸甩臂走在最前面。邱南章仰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深情地说：“周副部长真乃一代伟人，在他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险阻，没有过不去的高山！”

他们下午到达分水。

分水县长钟诗杰、教育科长林世选等人专程到分水东溪乡迎接。周恩来一行当晚便住在该乡陈家边的陈伯顺家。

陈家边与武盛镇之间，隔着一条天目溪，陈伯顺家是单门独户，左边三间楼房住人，右边三间楼房存放东西，墙外是一片开阔空地，有一傍溪小路，水路码头就在这里。为了接待周恩来，房子提前进行了粉刷布置，县政府专门派了林定隆与一个姓叶的龙潭人去做饭，晚上还安排了一个班的警卫。

陈伯顺是东溪乡的乡长，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第一次接待中央要员，显得有些惶恐，有些局促不安。周恩来一进门便跟他拉家常，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使陈伯顺很快就变得自然起来。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周恩来说，“这是我国的一句成语，拿来形

容当前的形势是再恰当不过的。陈乡长，你想想看，如果中国让日本人灭亡了，分水县与东溪乡还能幸免吗？”

“不能。”陈伯顺答道。

“所以，我们要团结各党派，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

“我能做些什么呢？”

“征粮，筹款，支援前线，……凡是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工作，都可以去做，多得很哩！”“周副部长，你能否把你刚才讲的意思，给我写一副对联？”

“可以，可以。”周恩来接过纸、笔，略加思索，便写了起来。

上联是：“同心协力伸正义”；

下联是：“精诚团结扫横蛮”。

陈伯顺望着那遒劲、潇洒的字体，高兴地说：“好，写得好，我马上贴到大门两边，好让全乡与过往行人都看得到……”

在陈家吃罢晚饭，周恩来问做饭的林定隆：“我们在这里吃一顿饭，还是两顿饭？”

林定隆说：“带明天早上一顿，一共是两顿。”周恩来对邱南章说：“邱副官，请付给这位老乡两顿饭钱。”

邱南章点了20元钱给林定隆。

林定隆连忙摇手，后退道：“这钱我不能接，县政府好报销的。”

马副官也说：“周副部长，你是中央大员，又是我们黄主席的客人，怎么好让你付饭费呢？”周恩来说：“眼下正处于战时，省与地方的财政都很紧张，由我付饭费是应该的。这钱，有规定是可以开支的。”

众人尚待分辩，邱南章已将钱塞到林定隆的衣兜之中。

夜月临窗，马副官激动难眠，悄悄坐起问邱南章：“周副部长，向来都这么廉洁么？”

“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禀性。”邱南章从床上坐起回答道，“我昨晚不是跟你们提到过一个叫刘江萍的小看护员吗？我还听他讲过这样二个小故事。”

“什么小故事？快说说，也让我听听。”陈亦南也从床上爬了起来。

“嘘，小声点，别惊醒了周副主席。”邱南章拉过被子披在身上叙述起来：

还是在长征路上，周副主席有一个铁饭盒，虽然很旧，但还能用，刘江萍便背在身上，好装点什么东西在路上吃。谁知一个不小心，把饭盒中间的一根铁条弄丢了，小刘便在房东家里拿了根筷子代替。这事被周副主席看见了，立即找他交换意见。

“小刘，我们是什么军队？”

“工农的子弟兵呗！”

“子弟兵如何对待群众的利益？”

“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刘江萍答到这里，明白了周副主席的意思：红军战士一定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忙把筷子放回了原处。

打这以后，小刘处处留心了。

红军进入甘肃，正值中秋季节，当地群众在收梨子。树上，果实累累；屋里，梨子成堆。经过长途行军到达驻地的红军，又累，又渴，又饿，看到金黄的大梨，真想吃它几个。可是，当大家看到周副主席坐在梨树下，一手

端水喝，一手拿铅笔，聚精会神地看地图时，马上从心里发出自责：周副主席有病，都不吃老百姓的一个梨子，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夜里，小刘睡在梨堆旁，连吃梨的想法都没有了。

第二天，有几个战士请求周副主席：“可不可以买点梨子？”

周副主席说：“可以，但要买卖公平。咱们住家的房东不在，不知道价钱，不能买。”

战士们便到外面去打听。由于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红军不了解，问了半天，也没人谈价钱，只是说：“吃吧，吃吧，你们吃吧！”结果，一个梨子也没买成。

就这样，在盛产梨子的地方，红军没吃上一个梨子就离开了。虽然如此，但当群众纷纷投来惊奇、敬佩的目光时，每个人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周副主席就是这样，为大家做出了表率。

故事讲完了，房子里静悄悄的，只听到屋外的山风声和远处的溪水声，间或传来了一二只夜鸟的“吱喳”声，马副官与陈亦南心潮翻滚，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3月21日，周恩来一行一早就启程了。分水县长钟诗杰派县自卫队队长李国明护送，并出动了一副轿子。天目溪西岸大路上，因为有撤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拥挤不堪，他们改走溪东小路。周恩来仍坚持步行，一会儿询问轿夫的生活，一会儿打听自卫队的状况，一点儿官架子也没有，给护送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横山桥，路面变宽，也好走了。将近麻车埠时，周恩来要李国明及其部属返回。

李国明留恋不舍地说：“周副部长，让我们再送一程吧！”

“不，你们也很忙，就送到这里为止。”周恩来说罢，扭过头叫道：“邱副官，请你把准备好的东西给李队长。”

“嗯哪，”邱南章答应道，立即掏出40元钱给李国明。

李国明一见是钱，立即推谢道：“护送周副部长，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这钱，我不能收。”

周恩来说：“昨夜你们分六班、设双岗，值勤到天亮，今天又陪我走了半天山路，太辛苦了，拿回去犒赏士兵吧！”

“我们不辛苦……”李国明还在犹豫，张副官上前说道：“别谦让了，周副部长还要赶路！”

陈亦南也劝道：“周副部长是老廿八，他们有纪律规定的。”

李国明只好接下钱，给周恩来鞠了一躬，说：“我代表弟兄们谢谢周副部长。”

他的部属都流露出感激与留恋的神情，依依惜别。

七 与黄绍竑会谈

李国明等人刚走，于潜县抗卫第一中队一分队的人便到了。他们告诉周恩来一行：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已经从天目山上下来，专门在于潜县城迎候。周恩来激动地说：“你们的黄主席不是在主持一个重要的会议吗？公务繁忙，何必为此分心呢？”“不，不，不，”于潜县抗卫第一中队一分队队长说，“黄主席向我县沈县长交待过，再重要的会议也没有迎接周副部长重要，公务再繁忙也要集中精力抽出时间搞好接待工作。”

“我在于潜恐怕只住一晚上吧？”

“正因为只住一晚，我们更要全力以赴。”在3月20日以前，关于周恩来赴天目山的消息一直严格保密，外界知之者甚少。3月20日下午，黄绍竑专电命于潜沈县长派人赴麻车埠迎接，并在县党部布置住宿后，始传于外。所以，当周恩来一行出现在于潜县城街头时，立即引起了老百姓们的注意。

“那走在中间的，就是周恩来吗？”

“真是气宇轩昂，一表人才！”

“听说西安事变，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哩！”

“他这次来浙西干什么？”

“还不是为了会见省政府黄主席，会商抗日救国的大计。”

“这一来，我们浙西有希望了！”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周恩来频频地向他们点头示意。

黄绍竑率领军政代表，从县党部迎出半里之遥，隔老远就招呼道：“恩来兄，真不敢当呀，本应该我到金华去会你的，却让你跋山涉水来到天目山……”

周恩来紧走了几步，握住黄绍竑伸过来的那双大手，说：“季宽先生，快别这样讲，我来浙江是为了抗日，你来天目山主持沦陷区政治工作队会议不也是为了抗日么？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不过，我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从金华到这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许多路段要弃车步行。听说你还不愿意坐轿……”

“季宽先生，请不必介意，我双脚板早就锻炼出来了，走个百里几百里不成问题。何况天目山号称‘浙江诸山之祖’，又有‘东南第一峰’的美誉，到这样的风景名胜来会老朋友，不是人生一大乐事吗？”

“恩来兄高见。”疑虑既除，黄绍竑顿时感到一阵轻松。

他向周恩来一一介绍了军政代表的姓名。有浙西行署主任秘书李楚狂、省政工队长姚旦、于潜县沈县长等。周恩来跟他们一一握手。

当握到最后一位时，周恩来从对方的眉毛认出了他的身份：“你不是省保安处的杜科长吗？何时赶到于潜的？”

对方正是宣铁吾的心腹吊梢眉，他受命要“全程陪同”周恩来，虽然被徐旨乾与严北溟回绝了，但仍跟踪赶到了于潜。

不待吊梢眉开口，黄绍竑大声说：“他正是省保安处的杜科长，比你们早到半小时。我真有些纳闷：有的人不肯直接出面，总是躲在幕后；有的人则像个跟屁虫，人家到哪跟到哪。”

吊梢眉听出黄绍竑的言下之意，十分尴尬地说：“我是来保卫周副部长的……”

“周副部长的安全由我负责，你难道还不放心么？”

“放……放心。”

“那就好。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应该心中有数。”

“是。”

黄绍竑本来就对宣铁吾有一肚子意见，借着这个机会稍稍发泄了一下，连忙转过身来对客人说：“恩来兄，请先行！”

周恩来谦虚地说：“还是季宽先生先行！”

黄绍竑将周恩来胳膊一挽，笑道：“那么，我俩并肩而行！”

周恩来也爽快地答道：“好，我俩并肩而行！”

邱南章、陈亦南、马副官、刘九洲及在场的人，看着他们两个这一京剧般的动作，都欣慰地笑了。只有吊梢眉因为这亲密的关系，而心中不悦，暗暗嫉恨。

从这里到县党部，要路过“金华旅店”。只见旅店门口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原来聚集在那里的几百名政工队员、义勇队员和学生、当地群众自动排成了两支队伍，夹道欢迎。一见他们过来，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黄绍竑兴奋地说：“恩来兄，浙西人民在欢迎你哪！”

周恩来边走边答道：“谢谢浙西人民！谢谢季宽先生！”

走到金华旅店门口，周恩来突然站住了，因为他发现有几个戏装青年正在向他挥手，便走了过去，黄绍竑等人也跟了过去。

省政工队长姚旦介绍道：“这是我们政工队宣传队的战士，为了欢迎周副部长，他们正在赶排一个节目。节目的名称是——”

周恩来右手一抬，阻止道：“姚队长，你先别讲，让我猜猜看。”

他打量了一下其中的一个“老汉”，自言自语道：“看样子像个五六十岁的卖艺汉，不过这脸上的粉扑得太多了，反而显得嫩相，与所扮角色的年龄不相称。”

那个“卖艺汉”咋舌道：“我扮演的确实是个卖艺汉，刚才只化妆了一半，听说周副部长已到于潜，匆匆忙忙赶出来的。”

周恩来指着另一个小姑娘打扮的女战士说：“那你一定是香姐。但你脸上的油彩上得太浓，不像十七八岁，倒像个大嫂子。”

“香姐”的扮演者惊讶道：“周副部长，你怎么猜得这样准？我今年二十三岁，扮演香姐是嫌年龄大了些。”

“既然你们二人的身份已经判明，你们排演的这个节目就再清楚不过了。它是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完全正确！”“卖艺汉”与“香姐”异口同声地叫道。

扮演“青工”、“小伙计”、观众甲乙与其他观众的战士都高兴得拍起了巴掌。

黄绍竑好奇地问道：“恩来兄，你对戏剧很熟悉吗？”

周恩来笑道：“岂止熟悉，当年在天津求学时，我还演过文明戏即现在称呼的话剧呢！”

“我猜想：你扮演的剧中人，不是公子哥，就是大将军。”

“恰恰相反，我在剧中扮演的都是女角。如在《傀儡家庭》中演娜拉，在《一元钱》、《一念差》和《新村正》中演本国的女性。”

“这是为什么？”

“因为那时‘五·四’运动还没有开始，封建礼教、封建习俗占上风，

妇女不能同男人同台演出。如同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一样，需要男孩子自愿演女角。”

“恩来兄的勇气可嘉呀，但不知演出的效果如何？”

“相当不错。当《一元钱》1915年从天津移到北京时，曾轰动一时。由于我扮演的女性角色，我甚至收到戏迷的来信。如果我的兴趣一直放在这方面，今天站在你面前的就不是什么副部长，而是一位电影明星。”

“完全可能。”

“真的吗？”周恩来望着黄绍竑，哈哈大笑。

“真的。”黄绍竑越想一本正经，越止不住自己的笑意。

“哈哈哈哈哈……”演员们与欢迎人群都笑起来。下午。在于潜县党部。周恩来与黄绍竑开始了会谈。

周恩来说：“季宽先生，你们这儿的抗日政治工作抓得不错嘛！”

“哪里，哪里，”黄绍竑答，“只是抓了些皮毛，徒具形式而已。说来惭愧，我二次主浙，接任不到十天就丢了杭州；今天是1939年3月21日，距杭州沦陷之忌已一年零八十七天了，但仍无丝毫迹象可以表明能够收复失地。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中国的‘天堂’成了他们日本人的屠场，你说我能不惭愧吗？”

“季宽先生的爱国心与责任感，我是了解的，可也别太负疚了。你现在抓战时政治工作队，编抗敌自卫团队，办兵工厂……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就是为了收复杭州、收复我中华的大好河山么？”

“恩来兄说得对，季宽不才，尚愿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抓战时政治工作队，是在去年1月召开‘全省士绅会议’之后。与会人员包括各县党部、商会会长与大士绅。我召开这个会议的本意，是想利用他们去发动民众，但没有什么效果，因此我就进行青年政治工作队的组织。那时由上海退下来的爱国青年组织，如杜国庠率领的宣传队都逗留在金华。我学他们的样子，亲自到各县去发动，把那些在校的或由上海、杭州各地退下来的青年都组织起来，后来还扩展到了沦陷区。那些青年真是可敬可爱，不但刻苦耐劳，而且英勇无畏，光是去年一年，牺牲的就有数十人。”

“我们抗战救国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些青年的身上。”

“是呀，”黄绍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接着说：“编抗敌自卫团队和办兵工厂，也是出于同一目的。我从山西过来，只带了一个警卫营，靠这点兵力与日本人周旋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我把从杭嘉湖撤退下来的军警，如省会公安局长赵龙文的武装警察、内河水上警察局长朱炳熙的水警队、翁光辉的诸新嵒游击总队、徐图远的松阳自卫队等，都改编成游击队伍，还收容了由前方失散下来的散兵游勇……但是，这批士兵都是军警中的‘老油条’，成分复杂，战斗力薄弱，不足以依靠。正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发动并加强民众自卫组织’的政令，我便依据有关条文，把原来的游击总部和游击队伍，编为抗敌自卫团队，吸收并发展了一批新生力量。有兵就得有枪，我们以内迁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地铁工厂的设备和人员为基础，在丽（水）浦（城）公路丽云（和）段的小顺、砬头、玉溪、大港头等地，办了四个兵工厂，生产步枪、轻机枪、手榴弹、炸药以及修造通用机械等。”

“季宽先生，抗敌自卫团队和兵工厂的经费，你是怎样解决的？”

“我总结第一次主浙失败的教训，主要是在人事上无所作为，当了傀儡。所以，我第二次主浙首先想到的是要在省政府人事上有所突破。以前，民政、

财政、教育各厅长和保安处长都是委员长指定的，省党部主任委员不必说了——那时各省的省党部主任委员都由省主席兼，唯独浙江例外——我就先从民政、财政着手，把民政厅换了以前内政部司长、后来在浙江当专员的王先强，又用了几个比较左倾的县长，这些县长又用了一些进步青年。财政厅换了以前内政部司长黄祖培，他秉承我的意旨，开辟了一些税目，增加了一些收入，为我编抗敌自卫团队、办兵工厂提供了经费。”

“季宽先生，你所做的这一切，对改变浙江政治力量的对比，对发展东南抗战的形势，都是有利的，应该坚持下去，以期取得更大的成效！”

周恩来的肯定与鼓励，使黄绍竑十分激动，他不由得启动情感的闸门，诉起苦来：“可有些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诬蔑战时政治工作队，‘是赤化青年的反动组织’，是我黄某人‘为扩充自己的实力而搞的招兵买马’；漫骂游击总部，是‘私生子’，‘应即予以裁撤’；还攻击我为安定人心，动员民众，贯彻中央抗敌自卫的国策而制定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是想把浙江搞成独立王国’……以至于委座也认为我这任政府，‘声名狼藉’，电令我‘须切实注意’。”

关于这些情况，周恩来早已了解，他安慰道：“季宽先生，在这个内外矛盾都很尖锐、复杂的时代，要做成一些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只要我们做得对，就不要怕别人非议。杭州西湖有一副楹联你记得吗？”

“西湖的楹联很多，不知恩来兄指的是哪一副？”

“上联是：‘史笔炳丹书，真耶伪耶，莫道那十二金牌，七百载志士仁人，更何等悲歌感泣’。”

不待周恩来再念。黄绍竑便接口道：“下联是：‘墓门凄碧草，是也非也，看跪此一双顽铁，千万世奸臣贼妇，受几多恶根阴诛’。”

“还有一副。上联是：‘天下太平，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

“下联是：‘乾坤正气，在下为河岳，在上为日星’。”

“前一副的作者？”

“彭玉麟。”

“后一副的作者？”

“王桢。”

周恩来见黄绍竑对答如流，不禁赞道：“季宽先生，博闻强记，智慧过人！”

黄绍竑谦让道：“我二次主浙，两度结庐杭州，岂有不考察了解西湖掌故岳庙楹联之理？倒是恩来兄见多识广，博学儒雅，非同凡响！”

“你也不要夸我，”周恩来笑道，“我祖籍绍兴，与浙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你是浙江的父母官，我是浙江的子民，这决定我们两个都关心杭州，关心西湖文化。”

周恩来提到的，正是西湖岳庙中的二副名联。岳庙是南宋抗金主要将领岳飞之庙。当时金兵大举南侵，南宋皇朝苟安临安（即今杭州）。以奸臣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在南宋皇帝赵构的怂恿指使下，进行了一系列卖国勾当，阴谋屈辱求和。岳飞与这些人针锋相对，坚决主战。他联合各地自发的抗金力量，组成了有名的“岳家军”，屡败金兵。特别是在朱仙镇一役之后，岳军直逼黄河渡口，指日即可收复宋朝原来的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直捣黄龙（今吉林农安）。但是，以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一日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逼迫退兵，以致岳飞“十年苦功，一朝尽废”。接着就

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及其义子岳云下狱，并于南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142年1月28日），在风波亭（今杭州小车桥一带）杀害。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风景秀丽的栖霞岭南麓，营建了岳飞的坟墓和祠庙，将秦桧、王氏、张俊、万俊高四贼的铁铸像长跪于墓前，千秋万代受人唾骂。周恩来引用这二副名联，自然是就近取材，希望黄绍竑以岳飞为榜样，不要怕诬蔑、诽谤，不要为舆论所左右，坚决反对投降派的阴谋，坚持团结抗日的正确方向，为民族大业、国家命运鞠躬尽瘁。

这是多么深切的理解，又是多么巨大的信任，还是多么殷切的希望。在杭州、吴兴等地连续失守的逆境中，在国民党C·C系和复兴社的反复夹击下，在远离重庆中央政府的天目山麓，黄绍竑一扫长期的困惑与疲乏，充满了信心与力量。

他一把抓住周恩来的手，诚挚地说：“谢谢你，恩来兄！季宽愿效前朝岳武穆，不计个人得失，不惜身家性命，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周恩来热情地鼓励道：“季宽先生的决心令人感动，你的所作所为，人民是有数的，历史也不会忘记……”

黄绍竑欣慰地放下了手，拎起水壶，给周恩来与自己的茶杯续上水，接着问：“不知恩来兄对这场战争有何看法？”

周恩来站起来，走到窗前，隔着玻璃对外望了一眼，回过头来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日本要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仅因为日本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而且因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不义的侵略战争，受到了全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所谓‘失道寡助’；中国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得到了全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支持，所谓‘得道多助’。然而，中国要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日本都大大地超过了中国，居于优先地位。力量的对比当然可以转换，但必须经过一个过程，要创造必备的条件。”

“请问这‘必备的条件’，主要是指什么？”

“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最主要的。”

“依你看，这场战争会延长多久呢？”

“那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也就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大有关系。美国的独立战争打了8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恐怕也要打这么长时间吧？”

“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中共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保留中国一寸土地。”

“为了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应该执行怎样的战略方针？”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漫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为辅，千方百计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除了调动训练有素的军队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众多的游击队，使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同时，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攻势，粉碎敌人妄图利用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赔偿他的损失的阴谋，

积极争取外国的援助，以便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最后将日寇赶出中国大陆……”

“恩来兄分析得太透彻了，使季宽大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之感。”

“这不是我分析得透彻，而是我党毛泽东主席的英明决策，他于去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就讲到了这些问题。”“毛泽东主席？毛润之先生？不愧为一代伟人呀！”黄绍竑心潮澎湃，眼睛闪闪发光，由衷地赞扬道，“贵党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季宽我佩服之至。”这时，门外传来了争吵声。黄绍竑离座，走近门口，大声问道：“陈副官，什么人在外面高声喧哗？”陈亦南隔着门应道：“是省保安处的杜科长。”“你没告诉他：我与周副部长有重要事商谈，闲人不得干扰吗？”

“告诉了，但他就是不走。”

紧接着响起了吊梢眉的声音：“报告黄主席，宣处长有电话找你。”

“你去告诉他，我现在没有空，请他晚上打来。”“我也是这样说的，可宣处长说情况很紧急，必须马上向黄主席请示，坚持要你亲自接电话。”

“你们的宣处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他从前有几件事情向我请示过？都不是自说自话自作主张了么？”黄绍竑正在兴头之上，被吊梢眉无缘无故地打断，心中老大的不高兴。

还是周恩来顾及各方的体面，委婉地奉劝道：“季宽先生，宣处长电话找你一定有重要公务，你还是去接一下吧，我们的会谈可以过一会儿或晚上继续进行。”

“既然恩来兄也这样说，那就把电话转到这边来吧！”

吊梢眉的声音：“黄主席，还是到机要室去接好——”

“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要是不转过来，我就不接了！”

“是，是，我马上叫总机将宣处长的电话转过来。”

在一阵脚步声之后，桌上的电话铃响了，黄绍竑拿起听筒，应道：“是恂我吗？你现在在金华？什么事情这样紧急？……是委座的电报？……要他马上动身？……嗯，我考虑一下……嗯，嗯……嗯……嗯……”

周恩来已回到自己的座位，平静地喝着茶。

这个电话打了八九分钟，大部分是“嗯，嗯”过去的，也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放下电话，黄绍竑的情绪也变了。

“恩来兄，关于具体问题的会谈，我们改个时间吧！今晚，我打算先开个有专署及县府科长，区、县国民抗卫总队上尉以上官佐参加的谈话会，请恩来兄发表演说。”

“好吧！”周恩来答应着，同时心中冒出了一个疑问号：宣铁吾究竟在电话中说了些什么？以致于影响了黄绍竑的情绪，临时改变了主意……

八 只当抗战派，莫当投降派

3月22日，周恩来与黄绍竑同赴天目山。

黄绍竑选定的路线是：先乘汽车到一都鲍家，再翻朱陀岭到禅源寺——省立浙西临时中学所在地，最后下榻潘庄。此行出动了六七辆汽车，黄绍竑与周恩来坐在第三辆小车上。

周恩来为了调节一下黄绍竑的情绪，有意主动问话：“季宽先生，你是旅游名家，又喜欢搜集地方掌故，能否给我介绍一下天目山的概况？”

“可以，可以。”一提到山水，黄绍竑就来了劲头，话匣子立即打开：“大目山发源于南岭山系，自西南向东北延伸，绵延五百余里，没入东海。其主体由东、西天目山构成。西天目山是中心，也是精华之所在，它高远深阔，有四潭、五洞、七洞、十池、十二岩、二十八石和二十八峰。像仙人锯板、轿子石、金鸡石、宝剑石、石古阵阵、千丈岩、倒挂莲花、望夫石、响板石、莲花石座、玉剑飞桥……等等，都巧夺造化，堪称天下奇观。”

“听说天目山原来不叫这个名字。”

“天目山古名‘浮玉’。先秦古籍《山海经》载：‘浮玉山，苕水出其阴。’相传八月中秋，皓月映入峰顶的天池，恰似在碧池中浮动着一块圆的宝玉，山因之而名。”

“为什么又改名为‘天目山’呢？”

“‘天目’之名，始于汉代。后汉《大藏洞渊集》云：第三十四洞天，曰天目山，名太微元盖洞天。据《云和郡县志》载：天目有二峰，峰顶各一池，左右相望，冬夏不涸，状似双目，故称‘天目’。”

“天目山上，历代题刻多么？”

“由于天目山处于东南沿海丘陵区的北缘，钟灵毓秀，风格高标，自古以来便赢得无数骚人墨客的热情咏赞。梁昭明太子修禅于此，登山赋诗，寄慨遥深：明徐渭状写‘大树华盖’的雄姿，伟岸挺拔，翠盖横空；罗万化高吟‘千尺飞泉破碧空，白云堆里驾长虹’；祁彪佳盛赞‘天目三千丈，东南第一峰’。著名诗人如庾信、白居易、苏轼、张羽、刘基、袁宏道等，也都留下了奇丽优美的诗篇。”

“这叫做：山水吸引文人，文人美化山水。天目山名播四海，声闻九州，跟这些文人的题咏，不是没有关系的。”“恩来兄说的是。”

“不知上述题刻，保存得怎么样？”

“有的完好无损，有的残缺不全，有的急待修缮，但战争……”

“是哇，战争能夺去人的生命，也能毁灭一个地域的文明。单单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要一致对外，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恩来兄真善于诱导，堪称一位教育家。”“哪里，哪里，季宽先生对天目胜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我看不逊于徐霞客。”

“哈哈……”

随着一阵笑声，黄绍竑因接宣铁吾的电话而引起的不快，烟消云散。

到朱陀岭，正值国民党浙西行署干训班举行结业典礼。看见他们来了，立即燃放鞭炮，拉开场子，一个卖艺汉拎着铜锣走到中间，一个敲鼓的小伙计、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跟着他，站在两边。卖艺汉说起了江湖白（每说一句，敲一记铜锣）：

小小刀儿转悠悠，
五湖四海皆朋友。
南边收了南边去，
北边收了北边游，
南北两边皆不收，
黄河两岸度春秋。
不是咱家夸海口，
赛过乡间两条牛。

接着说：“光说不练，”

小伙计应：“嘴把戏。”

“光练不说，”

“傻把戏。”

“说着练着，”

“真把戏。”

卖艺汉叫：“伙计打家伙！”

响起锣鼓声一片。

这时，省政工队长姚旦叫来几个搬长条凳与椅子的人，将凳椅放在周恩来、黄绍竑等人的面前，招呼道：“周副部长，黄主席，你们请坐！”周恩来一边就座，一边问：“姚队长，《放下你的鞭子》排演好了？”

姚旦在周恩来的右边坐下，答道：“排演好了，请周副部长与黄主席审看、指点！”

坐在周恩来左边的黄绍竑说：“要我审看可以，至于‘指点’，则力所不逮，非周副部长莫属。”周恩来谦虚道：“季宽先生，见笑了。”卖艺汉子的喊声压倒了他们的话声：“不算好，不算好，好的还在后面呐。我的姑娘聪明伶俐，自从带她到过上海以后，她马上把这些新派的小调什么‘毛毛雨’呀！‘妹妹我爱你’呀！都学得顶呱呱的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了，如今正是国难当头，还尽唱这些个怪肉麻的老调儿真有些不对劲儿。现在咱们大中华民国给东洋小子欺侮得可怜，老百姓又逼得连一句气话都不给讲，咱们虽然是走江湖的，可总也有一点儿爱国的心眼儿，除非他奶奶的小舅子昧了天良去当汉奸。所以，我就把亲眼看见的事情编支小调来唱，叫做九一八小调，听得懂，容易学。希望老爷先生小哥儿小娘儿们，把这些小调儿放在嘴边上，没事就拿出来唱唱，也算咱们把东洋鬼子欺侮我们的种种事记在心头上的。好了，闲话少说，唱起来吧！”

卖艺汉拿起二胡拉完过门，姑娘却没有唱，故作不理状。

“唱呀！怎么？忘了吗？好，从头来！从头来！”卖艺汉喊着，再拉完过门，姑娘仍不唱。

周恩来对姚旦说：“我听这卖艺汉的口音，像东北人。”

姚旦答：“他叫余大勇，正是从东北流亡过来的，据说老家就在辽宁沈阳。”

“像他这样的外省青年，政工队里多吗？”

“不老少，河北、山东、江苏、安徽、上海的都有。”

“称得上是‘五湖四海’，可得做好团结工作。”

“周副部长说得对，以前黄主席亦强调过，我们平时也比较注意，上下

左右的关系处理得还算好。”姑娘的声音响起来了：“瞎说，人断了气还能做玩意儿吗？提不起劲儿来呀！”

卖艺汉向观众叫道：“诸位听见么？我大姑娘说：‘提不起劲儿来呀！’”哈哈哈哈哈，这算什么话？怕老爷先生们不赏钱吗？唉，姑娘，咱们要吃饭，老爷先生们要看戏，做得不好，挣不到钱，来，现在也别唱啦，来几个鸭子翻身的把戏，向老爷先生们讨一个情。”

卖艺汉在一边打锣，香姐（即姑娘）勉强支起身体，一转身，倒在地上，卖艺汉暴躁，手持鞭子走向女，抽了一下。“来呀！”女无声，卖艺汉连续用鞭子抽打，观众忿忿不平：“他妈的，手段真辣！”“岂有此理！”

一青工模样的人，吼道：“鞭子放下来！”

卖艺汉怒道：“请你少管闲事！”

青工冲上去：“我偏要管！快放下！”

“是我的姑娘。用不着谁来管！”

“我们都是样穷苦的人，用不着谁来欺侮谁。”

“在这世界上，谁能养活她，谁就有权利使用她。朋友，你年纪轻轻，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哩！”

“这是你拿鞭子打人的道理吗？在这世界上不应该有这种人吃人的道理！”

“什么？‘不应该’，‘人吃人’？我可顾不到这许多。”卖艺汉又举起鞭子抽打。

突然，黄绍竑离座而起，高叫道：“放下你的鞭子！”向卖艺汉冲去。

“办不——”一个“到”字未出口，卖艺汉惊异地发现：来夺他手中鞭子的不是剧本规定的青工，却是省政府的黄主席。

“我偏要你办到！”黄绍竑一把夺下了对方的鞭子。

哑场。空白。

青工呆住了。

观众们也呆住了。

只有周恩来头脑清醒，他拍拍姚旦的肩膀，说：“姚队长，黄主席看剧太投入了，快上去提醒他一下！”

姚旦连忙跑入场中，对黄绍竑说：“黄主席，这是演剧，不是真的，钧座不必动怒。”

黄绍竑有些不相信地问道：“这确实是演剧吗？”“确实是演剧。”

黄扔下鞭子，对演员们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失手了，你们继续演吧！”

全场刹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对回到座位上的黄绍竑说：“季宽先生，深明大义，嫉恶如仇，使人钦佩！”

黄绍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这叫看书流泪，替古人担忧。”

“不，这不是古人，而是今人；这不仅是演剧，也是现实生活。自从东北三省失守以来，有多少人流离失所，有多少户家破人亡，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在发生啊！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才有生路。”

“恩来兄讲得对极了。”

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演出结束后，干训班长官请黄绍竑与周恩来为学员们颁发结业证书，学员有男，有女，大多数是二十岁左右的热血青年，

他们兴高采烈，给会场带来生气一片。

周恩来将金色的结业证书递给一个大眼睛姑娘，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县的？”姑娘回答：“我叫王阿菊，是绍兴的。”

“哎呀，我们可是同乡啰！”

“周副部长也是绍兴人吗？”

“祖籍绍兴，永昌坊百岁堂和大保佐桥周根记木作坊都有我的亲族与本家。”

“周副部长能去绍兴看看吗？”

“去的，从天目山下去就到绍兴。”

“哎呀，这可太好了！我在绍兴等你。”这回轮到王阿菊欢呼了。

黄绍竑将一本证书发给一位戴鸭舌帽的小伙子，关心地问他：“干训班结业后，你准备到哪里去呀？”“上前线，到敌人后方去！”小伙子回答得十分干脆。

“你怕不怕日本鬼子的碉堡、机关枪？”

“掉了头颅，也不过是碗大的疤，有什么好怕的？！”

“你对我们省政府和我个人有什么希望？”

“只当抗战派，莫当投降派！”

几句话说得黄绍竑热血沸腾，他一把握住小伙子的手，摇晃道：“谢谢你，谢谢你！”

在一片掌声过后，周恩来作了简短的讲话。

他说：“刚才余大勇等同志演出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相当成功，以致于你们的黄主席还当作是真事了。无论是余大勇，还是黄主席，都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这是十分可贵的。正如剧本中讲的，使我们挨冷受苦，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抵抗的卖国汉奸，只有打倒那些吃人的东西，才有我们的生路。尽管人家有的是飞机大炮，但只要大家齐心，团结起来，这力量比什么都大。这场战争是艰苦的，但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干训班结束后，同志们都将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去，希望把军事委员会与省政府的意图贯彻到行动中去，推动第二期抗战。最后，让我再一次引用剧本中的一句话，‘大家联合起来，一齐去打倒我们的仇人！’”

响应周恩来的，是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黄绍竑也在热烈的气氛中讲了话。

到禅源寺，黄绍竑领着周恩来参观了省立浙西临时中学和浙西行署。“在最前线的天目山竟能集中上千名青年受教育训练，不但东南各省少有，就是全国各省也是难能可贵的伟大奇迹！”周恩来大为振奋，当即向黄绍竑作了这样的估价。

他们到达潘庄，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落日含山，群鸦归巢，可爱的夕照把这所上海潘姓商人的别庄镀上了一层金子般的亮色，在林木葱茏、沟深岩黑的环境里，显得格格外明丽，格外夺目。

黄夫人蔡凤珍从高高的石阶上跑了下来，欢迎道：“周先生，我们终于把你盼来了！”

周恩来敬了个军礼，恭敬地说：“嫂夫人好！”

“快别这样，折煞了凤珍。”黄夫人笑脸如花地说。

“给我们准备了些什么菜呀？”黄绍竑拍着肚子向夫人“诉苦”道：“这一路，可把我和周副部长饿坏

“放心，饭菜早就准备好了，有油焖春笋、糟烩鞭笋、栗子炒冬菇、锅贴山鸡、五香狗肉、酱爆兔肉丁，还有佛手香羹……可惜——”蔡凤珍说着，说着，竟迟疑起来。

“可惜什么？”黄绍竑追问道。

“可惜没有周先生喜欢吃的武昌鱼。”

“嫂夫人不必自责，”周恩来说，“你所报的那些菜名，全是山珍野味，在平时都很难吃到。何况战时？恩来当之不起哟！”

黄绍竑说：“恩来兄不用客气，我们是在山吃山，在水吃水，就近取材，不费事的。”

“季宽先生说得虽有道理，但这笋，这香羹，恐怕在别的地方是吃不到的吧？总是嫂夫人的一腔盛情、一片心意，恩来在这里预先谢过。”

蔡凤珍听了周恩来的赞扬，十分高兴，她说：“天目山的笋，新、嫩、鲜、爽，确实远近闻名。而‘佛手香羹’则更是一绝，是用银杏结的果实（俗称白果）煮成莲子汤一样的甜羹，乃禅源寺招待各方香客和游人的名点。凤珍只学得个皮毛，惟恐烹制不好，贻笑大方，特请了前禅源寺大厨的掌勺精心加工……”

一行人刚刚在潘庄的会客室坐下，一个马弁就来找黄夫人报告：“有长途电话。”蔡凤珍去了不久，那个马弁又来把黄绍竑请出去了。周恩来正在纳闷，马弁第三次出现，说：“黄主席请周副部长到西厢房去一下。”西厢房是书房，一色的落地长窗，悬挂着质地考究的窗帘，陈设简朴、大方，想是事先焚过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檀香味。周恩来走进时，黄、蔡二人都站了起来。

“季宽先生，今天的电话是不是与昨天的电话有联系呀？”周恩来一见桌上搁着的电话筒，心中便猜到了几分。

“恩来兄，真有先见之明，但今天的电话不是宣铁吾打来的，而是严北溟打来的，两人讲的是同一件事：委座从重庆发来电报、要严北溟‘赴渝一谈’。”黄绍竑答道。

“严北溟是浙江省军官教导总队的政治指导室主任，是省主席的随员，按理委座的电报应该发给你，怎么反而发给保安处的宣处长呢？”

“我也有些纳闷，一时还想不出这是为什么。”

“我看十分简单，严北溟因为接待我，跟我谈了几次话，就带上了左倾的色彩，犯了通共的大忌，让宣处长打电话给你，明为请示汇报，实际是以倣效尤，叫你与我划清界限，不必商谈什么抗日大计。”

“可能……也许……不一定是这样吧？”

“季宽先生宅心仁厚，常为他人着想，他人可不为你考虑哟。我来天目山之前，就听说有人要千方百计，推迟或取消黄周会晤。”

“真有这样的事吗？”

黄绍竑还想掩饰，蔡凤珍可有意见了，她劝道：“季宽，别再打班语，你二次主浙，中了多少暗箭，受了多少闲气，干吗还要跟着别人跑呢？”

“恩来兄，季宽对不住你呀，本来慷慨激昂，义无反顾，让那姓杜的打着姓宣的旗号旁敲侧击，一下子又蔫巴了。今日可以撤换严北溟，明日难道不会撤换我黄绍竑么？上午参加干训班结业典礼时我问过一个青年：‘你对我们省政府和我个人有什么希望？’他只说了十个字：‘只当抗战派，莫当投降派！’这十个字对我的触动太大了，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达到它，决

不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黄绍竑终于消除了心中的疙瘩。

“季宽先生，真是心无纤尘，明如水镜，只要拿定主意，任何风浪都不在话下。”

“好了，你们两个也别再啰嗦了，人家还在金华等这边的回话哩！”蔡凤珍提醒道。

周恩来说：“季宽先生可以转告严北溟：‘赴渝一谈’就去谈吧，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抗日有理，爱国无罪，正义终归是要胜利的，关键时刻特别要保住自己的节操。至于具体问题，可以请他到重庆后找找中共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

“好，我就照你这个意思跟北溟说。”黄绍竑说罢，拿起了电话筒……

3月23日，周恩来与黄绍竑进行了第二次会谈。由于黄绍竑卸掉了包袱，不再存在什么障碍，会谈进行得很顺利。

牵涉到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双方同意捐弃前嫌，在浙江省范围内搞好国共两党的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二）黄绍竑要求周恩来指定一个代表，在抗战过程中遇有问题发生时，可以代表中共方面与黄直接商量解决。周恩来先是提了一个汪兆泰，但想了一想后，说：“还是吴毓吧！”因为吴毓是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此职务未公开，黄不知道），同黄一向接头，很熟悉。

（三）黄绍竑要求中共参加地方工作的人员，只能在工作岗位上努力，不能在政府机关内发展组织，周恩来同意了。但当黄绍竑要求将共产党员在浙江参加地方工作的名单开给他时，周恩来没有答应。

（四）黄绍竑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后方地区不能发展武装组织，周恩来表示同意。

（五）周恩来要求国民党方面不闹磨擦，不打内战，充分保障抗日言论自由，黄绍竑原则同意，力争做到。

周、黄二人在西厢房会谈，刘九洲与陈亦南在外面廊檐下警卫，陈亦南不时推门进去冲水倒茶，每次都为他们的专注与融洽而受到感染。

只有吊梢眉心急如焚，他与邱南章、马副官都被留在会客室里，无法靠近西厢房，根本听不到周、黄二人谈话的内容。邱、马对这种安排毫无怨言，似乎还承担着监视他的特殊任务，瞧那眼神，根本不在象棋棋盘上，而是在他的身上，使得他无所措手足。

吊梢眉又想起昨天傍晚的电话，不知道黄绍竑夫妇玩的是什么把戏？周恩来进去了半天才出来，他们究竟在西厢房谈了些什么？闹得黄绍竑见了自己就瞪眼，几乎厌恶到了极点，连前天宣处长在电话中施加的压力也不怕了。

一想到前天宣处长的电话，吊梢眉就兴奋起来。那是他的杰作，是他眼瞅黄周过于亲密而他又无法接近刺探情报时灵机一动，向宣处长电话请示，既可以为自已一所无获作辩解，也可以向上峰讨教解困厄。果然宣处长心有灵犀，立即以委座电令严北溟‘赴渝一谈’为由，让他叫黄绍竑听电话，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黄绍竑接了电话，马上蔫巴了。其实，严北溟的‘赴渝’，也是他吊梢眉‘奏本’的结果，凡是跟我杜某人作对的，绝没有好果子吃……

吊梢眉头脑蓦地发热：我何不再以“请示”为名，行刺探情报之实呢？不过，得稍有改变，不是向远在金华的宣铁吾请示，而是向近在西厢房的黄

绍竑请示，想到这里，乘马、邱二人不注意，吊梢眉突然起立，走出了会客室。

“喂，你到哪里去呀？”等马、邱二人发现，吊梢眉已到了天井。

这时，正值陈亦南进屋倒茶，西厢房的门敞开了一条缝，传出周恩来的声音：“钱塘江是天然的防御线，一定要筑好工事，加强防守，严防日寇的偷袭……”

刘九洲见到吊梢眉大吃一惊，高声叫道：“黄主席，杜科长到西厢房来了！”

黄绍竑闻讯，从房内出来，严厉地问道：“你想干什么？”

吊梢眉立正报告道：“黄主席，明日周副部长去禅源寺参加浙西临时中学的开学典礼，保卫工作十分重要，我特来请示有关细节。”

“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保卫工作我已委托马副官了，你就省下这份心吧！”黄绍竑没好气地说。

“不，”周恩来出现在门口，对黄绍竑说：“既然杜科长这么热心，大会的保卫工作就交给他与马副官共同落实吧！”“好，就按周副部长的意见办。具体细节，你去与马副官商讨！”

吊梢眉只得悻悻而退。

九 浙西中学的精彩演讲

3月24日，省立浙西临时中学在禅源寺的百子厅补行开学典礼，参加的有浙西行署全体职员与该校全体师生员工，共计不下一千五百余人。上午8时，当周恩来在黄绍竑、李楚狂等的陪同下，含着微笑，穿过夹道排列的人群，步入会场时，会场内外立即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东边的高年级唱起了《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

西边的低年级唱起了《救国军歌》：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民族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

东边座位上有一人站起来，大声问高年级同学：“低年级同学，唱得好不好？”

大家回答道：“好！”

“唱得妙不妙？”

“妙！”

“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

“欢迎！欢迎！”

东边的掌声海潮般拍向西边。

西边座位上立即站起一人，他俯下身子，与前排几个同学嘀咕了几句，便指挥低年级同学唱起了《救亡进行曲》：

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
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

歌声刚停，指挥者便问低年级同学：“我们学校哪个会唱歌？”

低年级应道：“高年级的大姐与大哥。”“我们唱完怎么办？”

“欢迎他们来一个！”

“呱，呱，呱……”

“快！快！快……”西边的掌声林涛般扑向东边。东边曾经站起过的那个人，又应战似地站起，指挥高年级同学唱起了《开路先锋》（影片《大路》插曲）：轰！轰！轰！哈哈哈哈哈！轰！

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轰！轰！轰！哈哈哈哈哈！轰！

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不怕你关山千万重，

几千年的化石，

积成了地面的山峰！

.....

毕竟是高年级生，训练有素，唱得整齐，唱得响亮，赢得了全场又一阵掌声。

就在这热烈的气氛中，浙西临时中学的方秉性校长宣布：“浙西临时中学开学典礼正式开始！”他逐一地介绍了与会的长官与来宾，便请黄绍竑训话。

黄绍竑整了整军风纪，大声说：“全校师生员工们，同志们，浙西临时中学是我们浙江省的一所重点中学。它于今年2月1日成立，3月6日开学。截至今天为止，到校学生——据方校长会前向我汇报的数字——已近900余人，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俗话说得好，‘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浙江省抗日救国的精英，乃至我们中华民族未来建国的骨干，都将出自于在座之中。”

黄绍竑喝了一口水，继续说：“目前的局势是这样的——尽管广州失守，武汉沦陷，但日寇也已精疲力竭，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要灭亡中国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日本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日本侵华，失道寡助，中国抗日，得道多助，全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只要我们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积极开展政治进攻，使用我们的主力在漫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为辅，千方百计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凶恶的日寇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哗哗哗哗……”回应他的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黄绍竑话锋一转，接着说道：“其实，我的这些看法得之于一位朋友，这就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先生。他今天能来参加我们这个开学典礼，是我们浙西临时中学的光荣，也是我们浙江省政府与浙西行署的光荣。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副部长演讲！”

“哗哗哗哗……”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周恩来走到讲台前，向全场敬了个军礼，朗声说：“黄主席，方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能参加这前线的浙西中学开学典礼，觉得非常快乐，非常荣幸。这个开学典礼和平常举行的不同，因为这里是最前线，这

里的学生都是从沦陷区出来的青年，所以充满着战斗的意义，是一个战斗的开学典礼，也是我们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的誓师典礼。”

会场里站满了人，连大厅两旁的楼梯、楼道上也是人，大家都在静听他的演讲。

“浙江地处东南前哨，在抗战 20 个月当中，已表现了许多英勇的事迹，无论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要说在前线取得了领导地位，就是在后方各省来说，也应该把浙江当做模范。”

周恩来举了许多事例——大多是他回浙江一周时间调查的结果——来说明浙江的进步，并分析了进步的原因：

“其一，是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对浙江省的指导所造成。

“其二，是民族意识发展的结果。浙江人民英勇为国的史迹实在不少，民族英雄代有其人。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生聚教训；明末戚继光将军，抗击侵略，驱除倭寇……我们浙江这种传统的民族思想，使我们浙人在这次抗战中表现得特别英勇，使得日寇对浙江不能继续进攻了。

“其三，是浙江在地理上的特点。浙江多山，使敌人的飞机、大炮、军舰、战车等重兵器受到限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却便于我们出击，开展游击战。

“其四，是浙江在经济上的优势。浙江是东南富庶之区，生产方面多数能自给自足，使敌人的经济封锁归于无用。加之教育文化发达，人民的知识水准较高，给我们的动员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其五，也是最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浙江在黄主席领导之下，党政军各方面精诚团结，力量集中。兄弟是浙江人，看到这种进步，自然觉得光荣。可是我会到在浙工作的许多人，他们认为这种进步还不够，还需要更大的进步。我们知道，不满才会有进步，浙江今后是会有更大的进步的。”

听到这里，全场活跃起来，有人在交头接耳，有人在“啧啧”赞叹，坐在主席台上的黄绍竑、李楚狂、方校长等人的脸上绽开了欣慰的笑容。

“目前的形势是：第一期抗战已告结束，第二期抗战正在开始。敌人本来打算在半年中解决中日战争，灭亡中国，没料到遇到中国军民的强大抵抗，死伤差不多 50 万人左右，加上病的、调回去的已达到 70 万，时间延长了一年半，才到达武汉、广州，可谓损失惨重，算盘落空。我们虽然丢了武汉、广州，但我们的主力并没有被消灭；我们持久战消耗敌人的策略，可以说得到了初步的成功。我们的抗战意识反而因之加强，民众对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也愈益坚定，抗战到底的国策更加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因此动员民众也愈益顺利，抗战力量也愈益雄厚了。于是，我们的抗战转入了新阶段。”

大门口，有一批人涌了进来。全是干训班的新学员，他们一直站在门外。为了听得真切，全都涌到会场的走廊、过道上。

“敌人眼看着第一期抗战他们是失败了，便提出了所谓的‘新认识’、‘新策略’。这就是把军事的重心放在‘扫荡’游击队和巩固占领区的原则上，同时配合以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攻。大家知道日本这次侵华战争，从他本国出兵 150 万，超过全国壮丁的半数，已是不能再出兵了；他本国的财力极为有限，要单独解决这场战争的费用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一方面以大部的武力进行‘扫荡’，幻想‘消灭’我游击区的游击队来‘安定’游击区的‘秩序’，‘稳定’敌伪的政权；另一方面妄图利用占领区的财力来弥补他的不足，以支持长期的侵略。他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北五省，就已经占

去我们全国 50% 的煤矿铁、40% 的盐和棉花。在华中和东南各省，他又占去了我们一些工厂。他正想把杭州和无锡的丝厂发展起来，统制我们的蚕丝；他收买我们的米粮和茶叶，供给他们军需，夺取我们的外汇，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侵略。据统计，近一年中，日本在我们沦陷区就夺取了一亿二千万的财富。在政治上，他不仅利用汉奸傀儡政权来扰乱我们，甚至利用汪精卫、吴佩孚来挑拨我们，分化我们，拆散我们的团结。他更幻想捏造事实，使我们党派之间发生磨擦。有时用飞机散发传单，蒙蔽我们的老百姓。他还玩弄一些外交上的把戏，如密切联络德、意，与他们订立防共协议，占据海南岛，进攻华南，威胁英、法；买好美国，和缓苏联等，无非是想孤立我们。然而，事与愿违。从国内说，敌人愈挑拨分化，我们愈加团结；从国际说，敌人愈孤立我们，国际愈加同情我们，援助我们。敌人占据海南岛，结果是引起了英、法的严重抗议；敌人提出日苏渔业协定，也遭受到苏联的无情拒绝……此外，敌人还从文化上向我们进攻。在北方有所谓‘新民会’，在北方有所谓‘工民会’，都是搞文化侵略的。最近更荒谬绝伦，修改三民主义，拿三民主义来蒙混老百姓。他还说他们也是黄帝子孙，他们这次侵略中国是‘打回老家来’，真是岂有此理！

“总之，敌人是从各方面向我们加紧了进攻。这种‘新认识’，就是敌人侵略我们的新阴谋。浙江尤其是杭嘉湖，人口稠密，土地富庶，正是敌人‘新认识’中的绝好的侵略目标，所以浙江的抗战工作今后尤其要加倍努力。在第一期抗战中，浙江扶助了国军抗战的任务，今后转入了第二期抗战，是要和敌人进行极残酷的斗争。我们应针对敌人的进攻，发动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体性斗争。这种斗争就是黄主席所倡导之政治进攻，也就是我们的领袖在南岳会议所决定的政治重于军事的抗战的新原则，到敌人占领区去进行斗争的新指标。这次浙西行政会议的决议案里对于浙省今后抗战工作计划已经非常丰富，我再来贡献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不少高年级同学拿出了笔记本，教师们则一直在低头作记录。

周恩来讲了五点意见：

“第一，军事方面，应该在杭嘉湖发动并坚持广大的游击战争。游击队员不仅是一个战斗员，而且是一个政治进攻的工作者；不但要遵守消极的亲民纪律，而且要积极地帮助政府和老百姓工作；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游击队，在敌占区生根。

“第二，经济方面，我们须按黄主席所说的来一个总动员，扩大抵制仇货，积极生产并提倡国货的运动。同时进一步破坏敌伪的生产机构和财产，坚决制裁买卖仇货的人，这样才能做到经济的进攻。

“第三，政治方面，我们要想方设法动摇汉奸的政权，缩小汉奸的政权，以至于消灭汉奸的政权。我们要打入汉奸的组织里去，打入被敌人利用的税警队、会党里去，说服他们反正，使敌人无汉兵可用，把留在沦陷区人民的心维系在我们这一边。

“第四，文化方面，仅仅在敌人后方设立学校是不够的，因为沦陷区还有许多老百姓得不到祖国的消息，受不到祖国的教育，却只看到敌人和汉奸们荒谬的文字，只听到敌人广播的反动宣传，这种情形长久下去是很危险的。我们要赶快想法子补救，尽可能的用文化进攻的方法把这些民众的头脑抢救过来，肃清和纠正他们所受敌伪的反动宣传。

“第五，克服惰性，绝不松懈。惰性与松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缺点，特

别是在最近几个月敌人军事进攻缓和了一点，更要注意。为此，我们要不断地把新青年的血液掺进去，使广大人民共同向政治进攻的前途迈进，共同负起政治进攻的责任。收复我们的杭嘉湖，保卫我们的大浙江，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完成历史的伟业！”

黄绍竑第一个离座起立，热烈鼓掌。紧接着是李楚狂、方校长……全场掌声雷动，长达三四分钟。

周恩来也很激动，对着台下喊道：“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支歌吧！唱《大刀进行曲》怎么样？”

全场一千五百多个喉咙齐声回答道：“好！”恰似爆响了一个炸雷，震得梁上灰尘直掉。

“那么，我来指挥。”全场又是一片欢腾无比的掌声。“大刀向——”周恩来起了个音，高举的右手使劲地往下一挥，大家便放声高唱起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所有的嗓子都打开了，所有的心房都敞露了，唱得排山倒海，唱得热血沸腾。特别是那两声呼喊，“冲啊！”“杀！”，仿佛喊出了平时的积怨，似乎倾尽了长久的仇恨，就在这一刻会场变成了战场，眼前燃起了硝烟，耳边响起了炮声，大家同仇敌忾，一齐向敌人挥刀砍去……

钱塘江开锅了！

天目山愤怒了！

百子厅内外热浪高涨到百度、千度！

典礼结束后，学生们纷纷向主席台拥去，争着、抢着与周恩来握手。

这场面把担任保卫工作的吊梢眉吓坏了。尽管他对周恩来的政治观点与政治态度有不同看法，也反对各界人士特别是国民党人与周恩来接近，但他接受到的任务除了“严密监视”，还要“保障安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可不好交代。于是，他粗暴地吼道：“你们瞎挤什么？这里是会场，不是市场！谁要再往前挤，我就把谁抓起来！”

恰似公路上的一只螳螂，过往车辆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学生们将他推倒，并踏着他的胳膊继续向前挤去。数不清的手，大手，小手，男人的手，女人的手，都伸向周恩来，周恩来逐一地握着，忙得不可开交。

这场面也使马副官紧张起来。他连忙对方校长说：“周副部长中午还有

政务，在此不能多耽搁了！”

方秉性校长心领神会，忙招呼来教导主任与体育老师，一边劝说一边用力将学生隔开，“保护”着周恩来、黄绍竑、李楚狂等人走出百子厅。

学生们都伫立在大门外，一直目送到周、黄在前方拐弯处消失，还在热烈地议论：

“讲得真好啊，记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汪老师记得最全，待会儿我们去抄他的吧！”

“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演讲，真是三生有幸！”

“哎呀，你的嗓子都哑了，是不是刚才唱歌太用力气的缘故？”

“可不是咋的？从前只能唱‘我们战斗在天目山上’，不能唱‘我们战斗在太行山上’，政治空气过于沉闷。今天，由于周副部长带头，气氛为之一变，怎能不放开歌喉，唱哑嗓子呢？”

“我们都来自沦陷区，对于日寇的侵略行径切齿痛恨，发誓不共戴天。但是，到底怎样抗战？战争的前途如何？心中是无数的。周副部长的讲话，犹如长夜中的一支火炬，燃起了大家的希望，照亮了争取胜利的前程。”

事后，有一个姓梅的女学生，受到周恩来讲话的影响，写了一篇大义灭亲的《打倒汉奸爸爸》的公开信，发表在11月份的一份《民族日报》上，与她当汉奸的爸爸公开决裂，一时传为美谈。

下午2时，周恩来与黄绍竑去爬山。当邱南章、陈亦南、马副官、刘九洲及禅源寺的了空和尚簇拥着周、黄二人出门时，手缠绷带的吊梢眉也跟了上来。

黄绍竑冷淡地问他：“杜科长，你已经受伤了，还跟我们去干什么？”

吊梢眉谦卑地答道：“杜某受伤事小，钧座安全事大，我得继续做好保护工作。”

“保护？真是笑话！西天目山高路陡，你这副样子能否走到山腰也值得怀疑。干脆，说穿了吧，你是不是想以‘保护’为名，行‘监视’之实呀？”

“黄主席说哪里话？我一个小小的科长，怎么敢监视你老大人呢！”

“既然没有监视之意，那就留在屋里养伤吧！天目山你又不是没来过。”

“这个……”

周恩来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既为黄绍竑的爱憎分明、戒备森严高兴，又不想让双方过于僵持，没有回旋余地；再说已经进行过二次会谈，需要讨论的问题都已经讨论过了，没有必要回避，便打圆场道：“季宽先生，难得杜科长有如此游兴，你何必泼他的冷水呢？”

“好，我听恩来兄的。”经过了昨天的曲折，周恩来在黄绍竑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几乎言听计从。

“不过，杜科长也要跟你打个招呼，”周恩来再转向吊梢眉说，“待会儿爬山是很累的，随从人员要照顾的是黄主席，可顾不上你哪。这只胳膊……也只有量力而行，走到哪算到哪。”

吊梢眉心头一热，感动地说：“好，我听周副部长的。”

天目山果然不愧“植物王国”的称号，禅源寺以上，满山遍野，到处可见两人或三人合抱的大树，枝叶茂密，横空交错，日光不入，人行其下，“雨天五里不打伞”是完全可能的。

了空和尚是一个近四十岁的中年人，从小生活在天目，对山上的情况熟悉得很。他一边走，一边介绍，哪儿是柳杉，哪儿是金钱松，哪儿是银杏，

并统称这三种树为天目山原始森林的“三绝”。

他说：“柳杉以大为奇，银杏以古见长，而金钱松呢？金钱松则以高而令人刮目相看。杭州人把瘦瘦长长的高个人叫做‘条儿’。以人喻树，金钱松称得上天目山这个‘森林世界’里的‘条儿’。”

周恩来很感兴趣地问：“了空师傅，天目山上的金钱松平均有多高？你们做过统计吗？”

“没有统计过，大约摸，毛估估，平均高度总在40米左右。”

“这棵树算高吧？”周恩来指着路旁的一棵高入云霄的长杆说，“我估摸着，它少说也有45米。”

“不，比它高的还有哩！”了空答道，“座落在老殿前方的一棵金钱松，据于潜县去秋实测，树高达到55米。”

“55米？相当于20层楼那么高，这可能是天目山第一‘条儿’吧？”

黄绍竑接口道：“岂止是天目山第一‘条儿’，也是全国第一‘条儿’！我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像这样高的树还是头一次见到。”

“一棵高树拔地而起，凛凛然直冲蓝天，其景像之壮观、气势之慑人，都是绝无仅有的。与其叫它‘金钱松’，还不如叫它‘冲天树’好。”

“恩来兄这个名字取得妙，今后大家都叫它‘冲天树’吧！”

了空和尚应道：“二位施主说得对。”

他们边说边往上走。跑在最前面的刘九洲突然停步回头问道：“了空师傅，为啥这五棵‘冲天树’，没有达到你说的平均高度呢？”

众人朝着他指点的方向看去，只见五棵扭筋拐角的树并排立在山崖下，每棵树都不过十七八米高，1—2抱粗，在西天目众多的古树名门中，并不见得特别地招人显眼。

“那不是金钱松，而是铁木。”了空走到刘九洲面前，解释道：“你不要以为它不招人显眼，它确实与众不同，自有其特别高贵之处。这五棵树，当地老百姓都叫‘扭筋树’，因为它扭筋拐角，不如杉树松木来得直，木质却特别坚硬，特别有韧劲。”

众人都走了过去，一边端详那五棵树，一边听了空的讲解。

“前年春天，上海有个大学教授带了几个学生到天目山考察，说这种树属于桦木科铁木属。铁木名堂很多，全世界有7种，中国4种。西天目的铁木同其他的铁木都不相同，是另一种铁木种，他称之为‘天目铁木’，准备写入他的一本植物志中。”

“这么说来，它是地球的独生子了！这可要加意保护啊！”周恩来感叹道。

“恩来兄说的是。”黄绍竑说，“可惜现在是战争时期，老百姓又缺乏科学知识，不知道这树种的珍稀，逐年砍伐，使‘天目铁木’数量大大减少……”“看来，只有取得抗战的胜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才能谈得上提高国民水平，保护珍稀树种，保护自然环境。”

“就是这个道理。”

了空则双掌合十，频念：“善哉，善哉……”快到老殿时，他们看到一棵柳杉，既高且大，胸围超过了所有的树。周恩来的眼睛顿时一亮，高兴地说道：“这棵树，就是远近闻名的‘大树王’吧？”“正是它。”了空答道。

“树高？”

“40多米。”

“胸围？”

“五至六人合抱。”

周恩来不觉兴致大增，叫道：“九洲，南章，陈副官、马副官，你们几个都过来，手牵手量量看！”刘九洲等人部跑了过来，围着大树拉起了手。然而，四人不够长，周恩来上去还差一截，直到吊梢眉上前伸出一只胳膊，才合抱住。

“哎呀，五个半人！”大家都惊讶得叫起来。“恩来兄，知道它为啥叫‘大树王’吗？”黄绍竑面带笑容地问。

“不知道，愿闻其详。”周恩来掸掸衣服答道。“它是乾隆皇帝封的。相传乾隆三下江南，游遍名山大川，也到过天目山。一见此树，便惊叹不已。他叫几个随从人员去抱，却抱不过，便解下玉带，方才围上一圈。乾隆大笑道：‘好哇！这大树系上朕的玉带，它真的成王了！’从此，这棵柳杉就被称为‘大树王’。”

了空在旁补充道：“当乾隆皇帝围抱‘大树王’时，‘大树王’很高兴，一个劲儿地摇起来，连树顶都摇断了。”

“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周恩来一叠声说，“我们在树前照张相吧，大家都来，拍个合影。”

随着照相机快门的一响，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留了下来。

从老殿到仙人顶尚有八九百米，道路也狭窄、崎岖多了。由于周恩来坚持不坐轿，黄绍竑也不坐轿。周恩来建议请受伤的杜科长坐轿，吊梢眉眼看二位长官都兴致勃勃地步行，他怎么好意思坐轿呢？于是，继续跟着大伙儿攀登。然而，那只受伤的胳膊偏不争气，不是挂着了路旁的荆棘岩上的树枝，便是发沉发痛阻碍前行。他渐渐地落在了后面……

又是刘九洲发问：“刚才树木还是很多的，怎么越走越稀，越长越矮了呢？”

了空回答：“这是因为山高风大，雪大，太阳光强烈的缘故。待会儿到了极顶，连树木都不大有，只剩山崖怪石了。”

果如了空之言，当他们登上仙人顶后，只有几丛稀疏的灌木，绝少密枝高杆，万峰皆伏脚下，四望均无屏障，能见度好极了。

“你们快来看呀，这根石柱上刻着‘可观’二字哩！”连一向老成的邱南章，也突发童心，欢呼雀跃起来。

大家都朝他拥去，但见一块二丈多高、五尺见方的石柱，巍然直立着，柱上刻着“可观”二字。刘九洲奇怪地说：“怎么只有两个字？而且位置似乎也没放好，太偏了！”

了空诠释道：“这就是著名的天柱峰，原刻‘天下奇观’四个字，后遭雷击，只残留‘可观’二字。”“我还以为只有这处风景可观，别处风景都不可观哪！”

了空随口吟道：

龙飞凤舞最灵钟，
燕母东来第一峰。
东望诸昆皆拱极，
西迎远岫尽朝宗。
屏围三峡岩犹耸，

环带双溪水自凉。
忽听钟声杯外度，
禅源古寺白云封。

“这是了空师傅的佳作么？”“不，是清朝附贡、于潜人徐周昌的名诗，题目就叫《天下奇观》。”

“东望诸山皆拱极，西迎远岫尽朝宗。”周恩来吟哦着，沉思道：“西天目号称‘浙西诸山之祖’，故用一个‘宗’字。东望诸山，诸山皆匍匐致礼，拱手于下；西迎远山，远山皆朝见长者，罗拜于前。写得传神，写得好！”

“恩来兄，”黄绍竑亲切地叫道，“你往那边看看，那边依稀可辨处就是杭州。”

“哦，杭州？这里看得见吗？”当数点青烟浮现于眼前时，周恩来也激动起来。

“唉，杭州沦陷至今已一年零九十天了。何日才能驱逐鞑虏，收复失地呢？”

“季宽先生不必感伤，这一天不久便会到来的。无限风光在险峰，为不辜负这大好风景，你何不作诗一首？”

黄绍竑由于会谈顺利，情绪激动，昨晚便填了一首词，今日正好拿出来征求意见：“既然如此，那我就献丑了。”说罢，便吟诵起来：

《满江红》

天目重登，东望尽，之江逶迤，依稀是，六桥疏柳，微池西子，寂寞三潭深夜月，岳坟遥下精忠泪。忖来年守土负寸心，生犹死。

收失地，从兹始，越勾践，应师事，愿勿忘训聚，胆薪滋味。逸豫有伤家国运，辛劳勤把我行治。枕长戈，午夜警鸡鸣，扶桑梓。

语调铿锵，山鸣谷应。

周恩来由衷地赞美道：“写得好！写得好！”

十 从天目山到绍兴

3月25日，周恩来及随从邱南章、卫士刘九洲等离开天目山，去绍兴。当晚，宿分水。

3月26日上午，周恩来到了桐庐。在桐庐县政府大礼堂，他向各机关团体包括县政工队员、妇女工作队员及其他人员共200多人作国内外形势报告，历时约两个钟头。报告会由政工指导室主任刘民召集。下午，在桐庐县民政科长叶善葆的陪同下，到窄溪，会见窄溪区署全体人员并讲话。太阳偏西时分，乘窄溪区区长闻骏材雇来的一艘中号船只，去中埠，再走陆路去富阳。

3月27日上午9时左右，到富阳县大源。驻防在大源、灵桥，里山、渔山一线的部队是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赵龙文任支队司令。周恩来原计划没有大源这一站，是赵龙文闻讯主动派主任政治指导员张齐赶到中埠迎接来的。张于黎明前到达中埠，调动了二副轿子，由于周恩来坚持要步行，轿夫只好抬着空轿跟在后面走。第一支队司令部设在大源镇塔堰头。为了避免富阳鹤山日本占领军的炮击，赵龙文在塔堰头山脚下造了三间茅屋，中间一间作会客室，赵龙文住在右室，左室是秘书室。周恩来到达后，先在会客室与几个政工人员谈话，其中有张齐，政治指导员蔡继贤、周开福，政工队长姚启洪。此后，周到赵龙文的房间里与赵单独交谈，并与赵一起共进午餐。午餐后，周恩来一行登上一艘小民船，去萧山县临浦，当晚在临浦改乘汽轮，去绍兴。

马达轰轰地响着。

江水哗哗地流着。

周恩来躺在卧舱里，怎么也合不上眼睛。

他多次说过，他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绍兴，一个是淮安。

1914年，在《射阳忆旧》一文中，他这样写道：“余本浙人，自先大父为宦吴省，遂徙家而居焉。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

1917年，周恩来南开中学毕业，毕业文凭上注明：“中学部学生周恩来，年19岁，浙江绍（兴）县人。”

可见绍兴与他有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周恩来的祖父叫周殿魁，又名周云门，字攀龙，出生于绍兴掇木桥“百岁堂”，当过绍兴师爷，在衙门里管理文案，后来任过江苏省山阳县（1914年改为淮安县）知事。周恩来的外祖父叫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当过江苏省清河县（1913年改名淮阴县）知事。也许是类似的经历及相同的爱好，使二人结成了姻亲。

周恩来于1898年3月5日（农历二月十三日），诞生于江苏淮安府淮安县城内的驸马巷。第二天，外祖父万青选病故；不久，祖父周殿魁也病故，家境逐渐破落。

周恩来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生下来才4个月就过继给叔父周贻淦，不到1岁叔父病死，6岁时随生母迁居淮阴，9岁时生母万冬儿病逝，第二年——1908年7月，嗣母陈氏又病逝。这一连串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家中料理完几次丧事后，已是债台高筑，靠典当、借债度日。这年秋冬之交，父亲周贻能（懋臣）因经济困窘，离家去湖北做事；在淮阴的外祖父家已没有人了。周恩来便带着两个弟弟，迁回淮安居住。

随着家境的没落，周恩来从一个破产的世家子弟坠入穷孩子的行列，看到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也尝够了寄人篱下的滋味。这使他从小就显露出一种反对封建的“叛逆”性格。

……

马达轰轰地响着。

江水哗哗地流着。

周恩来心潮起伏，难已成眠，干脆穿上衣服，走出了船舱，来到甲板上。

此刻，汽轮正在钱塘江的支流上行驰着。比起钱塘江正流，这儿的河道狭窄多了，水面也失去了原有的浩荡与壮观。两岸树木扶疏，原野空旷，不时有些草舍掠过眼帘，但灯火全无，黑影幢幢，偶尔飘起几声狗吠，更显出郊野的冷寂与凄清。“志在四方，愿相会中华腾飞世界时。”1913年他15岁时与沈阳模范学校一位同班同学的临别赠言，蓦地响在耳边，不由得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唉——说这话已经26年了，至今尚无实现的痕迹，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一阵西北风吹来，周恩来禁不住打了一个哆嗦。突然，背上一热，一件大衣披在了身上，接着响起了警卫员刘九洲的声音：“周副主席，夜寒风凉，当心感冒，还是回到舱里去吧！”

“不要紧，”周恩来回过身来拍了拍刘九洲的肩膀，亲切地说：“这两天数你最辛苦，你再去睡一会儿好了。待会儿到了绍兴，可捞不着休息了。”

“不，你不睡，我也不睡。”刘九洲向前一步，与周恩来并肩凭栏而立。

“小刘，你今年十几了？”

“拍满17，吃18的饭。”

“你想知道我17岁时的情况吗？”

“想。”

“我17岁那年，也就是1915年，袁世凯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什么叫《二十一条》？”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秘密条约。主要内容有：（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2）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的特权；（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5）中国政府须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有修筑铁路权，在福建有投资筑路和开矿的优先权。”

“哎呀，这哪里是什么秘密条约，而是赤裸裸的侵略呀！”

“正是这样。目的就是要独占中国。”

“这样的条约，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

“可是，袁世凯阴谋称帝，亟想取得日本侵略者的支持，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和日本代表秘密谈判。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世凯除对第5条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5月25日，陆徵祥与日置益在北京签订《关于南满州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

“袁世凯太坏了！”

“因此，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我当时在天津南开学堂读书，也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反袁的运动。曾经在公园里向无数游客发表过一次演说，对中国的民族屈辱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第二年袁世凯称帝时，我又做过一次愤怒的声讨。为了提高演讲的水平，增强战斗力，我们还组织了辩论队，我就当过南开辩论队的队长，同其他学校进行过比赛……袁世凯成为众矢之的，不多久便一命呜呼了。”

“周副主席，我真羡慕你。我要是早生二十几年就好啦。”

“小刘，你不必感叹生不逢时。那时候，日本想独占中国；现在，日本侵略中国，我们的任务都是一样的。只有驱逐列强，赶走日寇，中国才能繁荣富强，中国人民才会有好日子。”

“同时，还要特别警惕投降派，彻底粉碎他们投降、卖国的阴谋。”

“说得对，小刘，你最近进步很大嘛！”“多谢周副主席夸奖。”

“哈哈……”二人同时笑起来。

夜色在笑声中剥落，如鱼之鳞片。

曙色在笑声中熏微，如鸟之显影。

风声更急，船行更快。

马达嘭嘭地响着。

江水哗哗地流着。

十一 倡导“绍兴精神”

3月28日，凌晨三时半，周恩来乘坐的汽轮抵达绍兴。

快要靠岸时，他们远远看见码头上一群军服革履、长袍马褂的人等在那里，约二三十个，黑压压地站了一片。原来，周恩来还未在临浦上船，绍兴三区国民党专员贺扬灵便接到了“热忱欢迎”、“严密监视”的密令。

问时到码头迎候的，还有绍兴三区政工指导室主任兼《战旗》杂志社社长曹天风，国民党省党部调查统计室派驻绍兴的调查员、公开身份为专员公署秘书袁特丹，三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徐志余，绍兴县县长沈涛，省党部委员兼绍兴第三办事处主任顾佑民等。

船一靠码头，贺扬灵便摇晃着瘦长的身子，笑容满面地迎上前来，说：“周副部长不避战火，亲临前沿，幸甚！幸甚！”

曹天风第二个上前，热诚地说：“你在百忙之中驾临故乡扫墓，难得！难得！”

其余人都跟上来，争相致词：“欢迎周副部长荣归故里！”

“周副部长世居本县，实乃本县之光荣。”

“相信周副部长的到来，必然促进本县之建设。”

在一片欢迎声中，周恩来分别与来人握手、致意。副官邱南章、警卫员刘九洲紧随其后。

尽管气氛还算热烈，贺扬灵仍看出周恩来有些倦意，便对他组织来的这帮人挥手道：“周副部长旅途劳累，我们还是先送他到下榻处休息吧！”

下榻处在小校场县商会中厅楼。一路上碰到的都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或拖儿带女沿街行乞，或三五成群露宿街头，由于天色尚早，大部分店铺还未开门，只有一些卖烧饼、油条、豆浆的小贩在活动，菜帮、纸屑、果皮扔得到处都是，街面很不干净。贺扬灵把周恩来等送到商会中厅楼便走了。他们刚走进房内，一阵风将窗户吹开。邱南章准备去关窗，周恩来摆了摆手，走到窗前。

窗外，晨风吹打着沿街店铺的字号，伙计们正在下板子，开排门，一辆征集军粮的牛车从街心穿过，铁轱辘压在青石板上，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突然，从街角蹿过来一个蓬头垢面的孩子，不知用什么利器在牛车的米袋上划了一下，雪白的大米“哗哗”地流了出来，蹲在柜台下的一帮难民立即冲过来，用脸盆、磁碗、竹篮接着，急得跟车的士兵大叫：“你们想干什么？这是军粮！抢劫军粮可是要犯法的哟！”然而，饿坏了的人们根本不听那一套，有的干脆用手抓米向嘴中塞去。赶车的士兵骂道：“我叫你们目无王法！我叫你们白日行抢！”边骂边挥动鞭子，“刷刷刷”地向难民抽去，直抽得皮破肉绽，直抽得叫爹喊娘。一队巡街哨兵过来，才将这群饥民赶走……

周恩来难受得转过了身子，抱着两臂在房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邱南章、刘九洲二人说：“这就是我的故乡吗？多好的一座古城啊，竟被糟蹋成这个样子！”

早餐后，周恩来与曹天风在会客室里进行了交谈。

曹天风说：“周副部长，你自五四运动起，就是一位启蒙导师，今天我是以后进的身份来向你致敬的！”

周恩来谦逊地答道：“不敢当，不敢当！启蒙导师能有几个？！能做个

战士就满不错了。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实际上，孔家店不打不公道，对孔子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公道的。对过去作全部肯定不对，对过去作全部否定也是错误的。专门以今律古，同专门以古律今一样，都不符合唯物辩证法。”

“周副部长所见极是，天风听了获益匪浅。”

接着，周恩来向他打听有关绍兴的情况，曹天风一一作了回答。曹天风希望周恩来在绍期间，就抗日形势，两党能否长期合作，统一战线如何建立等问题多作开导和指点，周恩来点头答应了。

上午9时20分，贺扬灵来商会中厅楼，向周恩来汇报钱江南岸敌军最新动态，以及三区政工队活动情况等。

半小时后，绍兴第三办事处主任顾佑民持名片来访。不久，绍兴县县长沈涛、三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徐志余相继来访。

11时左右，周恩来应贺扬灵、沈涛等人之请，至县商会门首的花台前合影。然后，一起上龙山游览。

龙山，就是周恩来幼时与堂弟周尚麟常去的府山，又叫卧龙山。它位于绍兴城西北，与绍兴城内的另外二座名山——塔山、戴山鼎足而立。山上古迹甚多，有越王台、越王殿、望海亭、文种墓、唐宋摩崖石刻等，还有吴越王钱镠时所建的蓬莱阁、北宋范仲淹所筑的清白堂、南宋绍兴知府汪纲所立的秋风亭以及元代的龙山诗巢等遗址。

天气晴朗，风光秀丽，一行人都很兴奋。

周恩来问陪游者：“你们知道‘望海亭八景’么？”

陪游者竟多数答不上来。

沈涛不好意思地说：“大概有云门一望、镜湖千顷吧？其余六景记不起来了。”

“沈县长这二景说得对。‘望海亭八景’原出于《越望亭题八景》，乃明代绍兴知府萧良干所作，又称‘龙山八景’。”周恩来滔滔不绝地说：“除了云门一望、镜湖千顷以外，还有珠山烟火、唇口楼台、种墓遗址、岳碑遗石、古井清流、孤亭新构。”

“对咯，对咯，周副部长真不愧为家乡人，比我们这些‘老绍兴’还要熟悉。”沈涛由衷地称赞道。

“这八景有仰眺，有俯瞰；有山光，有水色；有城郭烟火，有名胜古迹；有自然景物，有人工构筑。龙山景物中之洋洋大观者，均被概括无遗了。”周恩来继续说。

“分析得好，概括得妙！”贺扬灵也来凑趣。

说话间，他们来到了望海亭。这是个石柱古亭，造型朴拙，飞檐翘然。不待周恩来发问，沈涛就主动介绍道：“这里原是越国大夫范蠡因军事上的需要，建过飞翼楼的地方。据说当时楼高有十五丈，又叫鼓吹楼、镇海楼、越王亭。唐时建望海亭，诗人元微之、李绅都曾登楼赋诗。明嘉靖十五年，绍兴知府汤绍恩重建，后毁，今又修复。望海亭后，有唐贞元己巳等摩崖石刻。山西北麓有‘菊花泉’，水味清冽甜美……”

沈涛长篇大论，有意“将功补过”，以挽回适才“望海亭八景”未说全之憾，周恩来怎会听不出来？尽管如此，他仍然问道：“这‘望海亭’的‘海’字，该作何解释呢？”

贺扬灵觉得这是个显示才能的机会，便抢着回答：“这有两种说法。一

种说法是，古时这里离海不远，站在亭中可以远眺海面；另一种说法是，在此可以俯瞰城内的北海。”

“其实，大海是看不到的。与其说在这里眺望大海，不如说这是一个饱览锦绣古城的好所在。”

“周副部长高见。”贺扬灵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点儿不高兴。

周恩来并未注意贺扬灵的微妙变化，他登上望海亭，鸟瞰绍兴的稽山镜水，禁不住兴奋地说：“绍兴真是个好地方！水乡港河交叉，湖泊纵横，资源丰富，是有利抗战的给养和活动的地方；山乡山脉连绵，峰峦起伏，地势重要，可以成为抗日根据地。长期抗战要依靠绍兴，富国强兵也要依靠绍兴啊！”

“周副部长的话，使我茅塞顿开。”

“周副部长热爱家乡之情，真使人感动。”

其他陪游者纷纷感叹道。

归途中，路经龙山风雨亭。周恩来说：“我第二次回绍兴的时候，这儿还是一片平地，哪一年盖起这座亭子的？”

沈涛问：“周副部长，你第二次回绍兴的时间是——”

“民国十三年。”

“这座亭子是你走后5年，即民国十八年建的，亭名取秋瑾烈士就义前，在刑庭手书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之义。亭柱上这幅挽联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撰。”

周恩来走上前，抬头念道：“‘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好，写得太好了！”

沈涛指着山下说：“周副部长，那就是当年拘押过秋瑾的清政府典史署。”

“再过去，就是烈士就义的十字街头——轩亭口吧？”

“是的。”

望见轩亭口，我们就可以想见秋瑾那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英雄形象。”

“触景生情，心同此理，谁说不是？”沈涛又发开了议论：“传说当年光复军安庆起义失败，叛徒告密，供出绍兴大通学堂是光复会在浙江的据点，秋瑾是浙江会党的首领之一，这可把绍兴知府贵福吓坏了。因为秋瑾从日本留学回来，主持大通学堂，曾得到过他的支持：不仅参加开学典礼，致词祝贺，支援了不少枪枝弹药，还将秋瑾的别名竞雄二字拆开，写了‘竞争世界，雄冠全球’的对联送给秋瑾。一旦追查出来，岂不要受到连累？为了摆脱与自己的关系，贵福从杭州连夜赶回绍兴，调集人马，将大通学堂团团围住……”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还提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做啥？”贺扬灵对沈涛突发的激情十分反感，粗暴地打断道。

周恩来禁不住一激灵，眼前蓦地浮现出八一公公的形象，这贺扬灵反对谈秋瑾跟当年八一公公骂秋瑾如出一辙，何其相似呀！

沈涛还沉陷在对历史的缅怀中，并未听出他的顶头上司话里的不满，继续说：“当时秋瑾已转移到西郭门外，突然想起有一本光复军的名册还放在大通学堂没有销毁，便不顾个人的安危，急急返回大通学堂，不幸落入清兵的包围，虽然烧毁了名册，也击毙了不少清兵，终因寡不敌众，被贵福抓住了……”

贺扬灵忍不住叫道：“沈县长，不要再讲了，这些事情周副部长都知道。”

周恩来也忍不住了，就像当年驳斥八一公公，声明道：“这个传说我没有听过，沈县长，请你继续讲下去。”

沈涛仍未觉察面前二人的分歧，接着说：“贵福抓到秋瑾后，连夜升堂，进行严刑逼供，要秋瑾供出革命党的名单。秋瑾临危不惧，至死不屈，大义凛然地说：‘要杀就杀，不必多问。’贵福见秋瑾不肯交出名单，就逼秋瑾讲出后台，‘只要供出后台，本府就可以放你’秋瑾听了一声冷笑，‘后台？后台倒是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你贵福。到大通学堂祝辞的是不是你？赠我‘竞争世界，雄冠全球’的是不是你？人证物证俱在，还有你与大通学堂革命师生一起合影为证哩！”秋瑾像连珠炮一样的反问，把贵福问得瞠目结舌，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宣布退堂。贵福怕审下去，审到自己头上，就与府台刑名师爷章介眉密谋，在公文上批了个‘斩立决！’为了防止革命党劫法场，五更天便将秋瑾押至轩亭口，偷偷地杀害了。”

沈涛说完，讨好地向贺扬灵望去，贺扬灵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沈涛这才回过神来，后悔不迭。

周恩来对沈涛的这一段叙述，则十分赞赏：“沈县长讲得真精彩！秋瑾是我国清末著名的女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什么是绍兴精神？这恐怕就是绍兴精神。在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今天，我们大家都要向她的学习！”

除了贺扬灵，其余的人都说：“是这么个理。”

沈涛又看了贺扬灵一眼，没敢吱声，只是点了点头。

中午，三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徐志余设宴，为周恩来接风。

下午1时，在贺扬灵、曹天风、乐培文等人的陪同下，周恩来视察了绍兴三区政工指导室和《战旗》杂志社。

乐培文是一个进步青年，担任三区政工指导室副干事长，他向周恩来介绍了专区及所属各县政工队的活动情况，并提到三区政工队的青年营、妇女营和少年营。

“三区还有妇女营吗？”周恩来很感兴趣地问。

“有，而且颇具规模，颇有影响哩！”作为三区政工指导室主任的曹天风说，“培文，你向周副部长汇报一下吧！”

“好的。”一提到妇女营，乐培文的话就多了：“三区妇女营是去年5月8日创建的。队员45人，根据工作需要，按照各人的志愿和具体条件，分为三个队：一为救护队，由20余人组成；一为宣传队，虽然只有4人，但每人都有一技之长，或漫画，或音乐，或写作，担负着整个营的宣传任务；一为战斗队，后改称模范队，17人，她们积极学习军事，随时准备上阵杀敌。”

“妇女营是怎样训练的？”周恩来问。

“妇女营借稽山中学一部分校舍为营房，于5月8日开始训练。内容分军训和政训两部分，以军训为主，由绍兴地方部队派来的军官担任军训教官。无论是宣传队、救护队，还是模范队，一律都得参加军训。除此而外，宣传队和救护队分别加授抗日宣传和战时救护常识等课，由战旗剧团和县卫生院分工负责指导。”乐培文继续汇报。

“上政训课吗？”

“上的。担任政训课的教师丁箴孙，就是从你们陕北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回来的。通过政训课，向妇女营战士宣传抗日的道理，讲过平型关大捷，也讲过抗日英雄事迹。我们还开设了一门‘论战时青年自我教育’的新课，并引导女兵们阅读抗日书刊——”

“乐副干事长，”贺扬灵打断乐培文的话，说：“政训课没啥花头，还是讲讲练兵好！”对于政训课，特别是有关中共抗日的事迹，他表现了明显的反感。

“练兵最初是在绍兴，后来移到平水。因为青年营改为青年模范队，要开到平水山区去进行游击战的准备训练，妇女营的同志们也要求去，于是妇女战斗队改名为妇女模范队，跟青年模范队一起开往平水，借用一座古庙作营房。平水是个半山区，有丘陵也有河浜，是个练习游击战的好场所。那里的训练比操场上的训练又进了一步，每天都要爬山，还要挖工事，练习侦察本领，搞军事演习，有时还进行夜间训练，黑暗中快步疾走，迅速地出现在某个山头。与此同时，在城内的救护队、宣传队也紧张地投入训练和实习，救护队在医院实习战地救护操作技术，宣传队除上街宣传外，还帮助接送了二第三批难童。一个月以后，三个队在城里重新会合，多数战士几乎变了一个人，精神头可好啦！”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安排一二次实战了。”周恩来的情绪明显地受到了感染。

“周副部长说得对，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大家都要求上战场。为了锻炼意志，以达到实战的要求，我们安排了一次水上行军。两个星期后，大家坐船归来，从报纸上看到我军第二次克复海盐的消息，都高兴地大叫：‘我们的老大哥胜利了！’引得同船旅客都惊奇地望着这批女兵。为了早日冲过钱塘江去，她们白天擦枪上操，晚上站岗放哨，并增加了实弹射击的次数。宣传队上街写标语，化装演戏；救护队加紧实习战地救护技术……整个节奏都加快了。”

“出征的命令是什么时候下达的？”

“11月中旬。一个初冬的晚上，模范队接到命令开赴海宁硖石。她们全副武装，每人带50发子弹，从绍兴出发，途经萧山，在江边乘上木船，连夜偷渡。那一夜，钱塘江的潮水很大，队员们在船上站立不稳，个个东倒西歪，人人头晕呕吐，然而听不到一声叫苦。两小时后，她们到达钱塘江北岸海宁县境，先期到达的代理营长王竹安、浙江抗日自卫队第五支队司令郑器光、政训室主任胡云翼等都已在那里等候。他们把进袭王店的任务交给了妇女营和青年营第一队，并另派一个中队的兵力作后援，负责掩护妇女营完成任务后安全撤退。”

“王店？是硖石到嘉兴之间的小站吧？”

“是的。日军在那里筑有碉堡和瞭望哨，驻扎了一个小分队。11月22日，妇女营全体队员与其他参战部队从硖石出发，沿途写标语、贴漫画、教小朋友唱抗日歌曲、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太阳偏西时到达沈荡，当晚借宿在老百姓的家里。第二天，青年营一中队的部分队员前去王店周围侦察地形，妇女营就地休息。到天黑时，才向王店进发。由于这晚没有月亮，有的队员滑倒在小沟里，跌倒在泥坑中，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队员们参战的热情，爬起来继续前进，直到离敌人只两华里的沈家桥停了下来。妇女营分两路越过铁路，包围车站的日军小分队。战斗打响后，青年营一队的战士先向碉堡投掷手榴弹，随着爆炸之声，火光腾空而起；妇女营的队员们隐蔽在小高地后面，拉成了一条二十来米长的战线，用驳壳枪、步枪对敌小分队射击。碉堡内的敌人与车站敌小分队失去了联系，顿时成了缩头乌龟，只用机枪盲目地向外扫射，却不敢出来；车站敌小分队从睡梦中惊醒，闹不清外

面有多少人马，连衣服裤子也没有穿齐全，更不敢去增援碉堡内的敌人，由于惊慌失措，损失颇为惨重。战斗持续了几十分钟，目的已经达到，妇女营奉命撤回路东。第三天凌晨，等嘉兴方面的敌人大部队赶到时，妇女营早已安全返回驻地了。”

“这次夜袭王店，妇女营有伤亡吗？”

“没有，一个也没有。几天后，妇女营渡江南返，回到绍兴，绍兴全城人夹道欢迎她们凯旋。《战旗》杂志第41期发表了《妇女营夜袭王店》等三篇报道，详细介绍了她们的英雄事迹。美国新闻记者也采访了妇女营，并拍了照……”

周恩来十分激动地说：“女子能荷枪赴前线杀敌，实在难得！成队地深入敌后作战，绍兴妇女营更属创举！”

乐培文也很激动：“我代表妇女营，谢谢周副部长的鼓励！”

周恩来对曹天风、贺扬灵说：“这些女子，都是杭嘉湖地区素称文弱的江南人。她们都能够深入敌后打仗，可见不论什么地方，不论什么人，没有不能作战的。”曹天风说：“确实如此。”

贺扬灵说：“周副部长高见。”

从政工指导室出来，他们去五云门视察专区政工队队部。

政工队及青年营、妇女营、少年营队员五百余人在公路两旁列队欢迎。一见到他们，便响起热烈的掌声。

当周恩来与贺、曹、乐三人走近时，政工队队长一声高叫：“立正！”掌声顿息，但见政工队战士双脚一并，挺胸收腹，向周恩来等行注目礼。

政工队队长跑步到周恩来面前，举起右手敬了个

军礼，以宏亮的嗓音报告道：“三区政工队列队完毕，请周副部长检阅！”

周恩来手碰帽沿，还了个军礼，在贺扬灵等的陪同下，向前走去，政工队队长紧随其后，直到队列完毕。

“同志们好！”周恩来看到队员们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十分高兴，禁不住大声问候。

“周副部长好！”政卫队队员们答道，声音响亮而整齐。

接下去，依次是青年营、妇女营与少年营。妇、少两营模范队同青年营一样，部是飒爽英姿，全副武装。当妇女营副营长——一个大眼睛姑娘列队完毕，跑步上前报告时，周恩来立即认出她就是六天前在天目山朱陀岭浙西行署干训班结业典礼上的那个学员，高兴地叫道：“你是王阿菊，你的干训班结业证书，还是我颁发的哩！”

来人正是王阿菊，她也高兴地叫道：“周副部长，我就是阿菊，自打那天你告诉我要回绍兴看看后，我和战友们天天都在盼望着啦！”

“言必信，行必果，我这不是来了吗？”王阿菊高兴得竟喊起口号来：“欢迎周副部长回乡探亲！”

立正列队的女兵们立即回应道：“欢迎周副部长回乡探亲！”

“祝周副部长身体健康！”

“祝周副部长身体健康！”

周恩来也热情地喊道：“祝同志们身体健康！”一时此呼彼应，气氛十分热烈。

当少年营营长吴德贞向周恩来敬礼、报告时，周恩来问：“少年营的战士都有多大？”

吴德贞答：“大的17岁，小的11岁。”

“你们都会使用武器吗？”

“会。”吴德贞立即指挥模范队当场作了操练。“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抗战胜利有希望哇！”周恩来满意地笑了。

检阅完毕，贺扬灵叫队伍集中到培训班大礼堂，请周恩来讲。周恩来分析了抗战形势，阐述了今后的任务，接着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全民动员，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绍兴政工队组建青年营、妇女营与少年营，正是这一行动的具体体现。你们从沦陷区敌人的铁蹄下挣脱出来的爱国精神，是十分可嘉的。刚才我看了你们的队列和部分操练，发现你们训练有素，心中十分满意。来五云门以前，我还听了乐副干事长关于妇女营的情况介绍，特别是听了夜袭王店的英勇事迹，对你们的工作更充满了信心。一两个或三五个妇女杀敌的故事，在八路军和新四军里是有过的。学生军上战地服务，在八路军也有过一大批。但是成队地深入敌后作战，妇女营要算创举了！这是你们的骄傲，也是绍兴的骄傲！”

说到这里，周恩来指着大礼堂的横幅标语“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提高嗓门说：“这个口号提得好，表现了越王勾践、鉴湖女侠的斗争精神，也是真正的绍兴精神，我们一定要发扬这个精神，光大这个精神！”

讲话结束，全体队员热烈鼓掌，有许多女兵与小兵的巴掌都拍红了，拍痛了，还一个劲儿地拍下去。

王阿菊更激动，在她的带领下，大礼堂里响起了连续的口号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

真是一浪高过一浪，一声响过一声。

散会后，周恩来立即被妇女营的队员们包围起来。周恩来笑着问：“你们就是夜袭王店的女战士吗？”

队员们答：“是的。”“那么，就请你们谈谈夜袭王店的战斗经过吧！”王阿菊刚要汇报，就被别的队员抢先了。“我来汇报。”

“我来讲。”

周恩来笑道：“你们大家一起开口，好比机关枪，我一句也听不清楚，还是一个一个地讲吧！”经过商量，由王阿菊主讲，大家插话，把那段难忘的战斗重新叙述了一遍。

周恩来问：“你们从来没有打过仗，乍一走上战场，怕不怕？”

一个17岁的女学生说：“开头有些怕，后来就不怕了。”

一个20多岁的大嫂子说：“我家7口人，6口人死在日本鬼子的炸弹下，我与鬼子有不共戴天的仇，一见到鬼子就红眼了，有什么好怕的？！”王阿菊说：“大多数姐妹都有一个过程，从怕到不怕，谁也不是天生的。”

“阿菊说得对，”周恩来赞扬道，“你们不但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中国的志气，还在实践中锻炼了自己，从战争学会了战争。全国的妇女都像你们就好了。”

队员们听了，都心花怒放。

十二 拜望姑父王子余

下午3时半，一架印有红膏药标记的日机出现在绍兴上空。它是怎么来的？执行的是什么任务？是否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蒞绍有关？谁也不知道。

“呜——”警报声紧跟着响起。恰似一把刀子，裁开了绍兴古城的平静；又像一股旋风，把十几万颗心刮到了空中。

周恩来刚刚返回县商会。听到警报，立即令邱南章、刘九洲带上皮包、皮箱避入屋后防空室，而他自己却留在房内，沉着地翻阅文件，思考问题。

警报解除后，周恩来派邱南章外出寻访姑父王子余，并查找周家“百岁堂”。

5时许，贺扬灵到县商会邀请周恩来晚上去龙山越王殿参加座谈会，周恩来欣然应允。

5时半，周恩来偕同邱南章、刘九洲步行去火珠巷板桥3号，拜望姑父王子余。

王子余系秀才出身，在辛亥革命前，由蔡元培介绍加入过同盟会和光复会。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就在绍兴创办了第一张铅印的《绍兴白话报》，以后又与刘大白等创办了《绍兴公报》。他与徐锡麟、秋瑾是莫逆之交，一起参加过浙皖联合武装起义。绍兴城内轩亭口的秋瑾纪念碑，就是王子余倡导督造的。王子余在中国银行工作多年，当过行长。退休后，又挑起《绍兴县志》主编的重负。他为人正直，是非分明，敢于主持正义，在绍兴声望颇高。加之喜好藏书，搜集文献。

王子余敞开大门迎接周恩来。他有14年没见到这位侄子了，但见恩来穿草黄色军装，背三角皮带，一脸英气，心中十分高兴。

周恩来见到这位可尊敬的长辈，也很激动，鞠了一躬，叫了一声：“姑父。”

“姑父我已经老了！”王子余摸了摸斑白的鬓发说，“长江后浪赶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恩来呀，现在可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天下。”

“听说姑父在主编《绍兴县志》，那可是利乡、利民、功德无量的一件大事呀！”

“蜀中无大将，廖化打先锋。滥竽充数，聊为补白而已。”

“姑父过谦了。”

“哈哈哈哈哈……”

进入厅堂，周恩来向相继前来会面的亲友一一问好。然后，跟着王子余到起坐间瞻仰姑母周桂珍的遗像。

周桂珍由父亲周殿魁作主，许嫁给他的同事、淮安（山阳县）钱粮幕府王庸吾的次子王子余。1894年在淮安完婚，婚后即随王子余回原籍绍兴。她虽说是大家闺秀，但顾大局，识大体，从不阻挠王子余的进步活动。辛亥革命后，王子余出任第一任嵊县知事，因经费无着，周桂珍曾将自己的嫁奁首饰让王子余变卖，抵充公用。周桂珍生有二女四子，于1912年生第五个儿子时得产褥病去世。

周恩来望着姑母的遗像。

他点上“大金铤”，插在姑母遗像前的香案上，轻轻念道：“祝姑母在天之灵安息……”接着，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王子余及其子女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都深为他居高位而犹重亲情的精神所感动。

当晚，王子余设便宴款待周恩来。应邀作陪的有地方著名人士张天汉、沈复生、王铎中和《绍兴民国日报》记者宋山，还有王子余的长子王贻甫。

王子余说：“前几天就听说你要回绍兴探亲、扫墓，我还不怎么相信。前线吃紧，国事日多，公务繁忙，你哪有空闲回来呀！今天下午邱副官找到我家，又找到‘百岁堂’，才知道你真的回来了，亲友们都非常高兴。”

周恩来问：“姑父，‘百岁堂’的长辈们都好吗？”“好，都好。现在住在那里的，有你的族曾祖周希农、周文炳，族叔周云峰、周金麟等，他们的身体都还不错。他们都想来看看你哩！”

“不敢当，哪有大看小之理？还是明天我去看看他们这些长辈吧！”

沈复生是同盟会会员，他离座举杯，对周恩来说：“周副部长，你身居高位而不忘亲友故旧，日理万机而拨冗返乡扫墓，其志可嘉，其情感人，请让我借花献佛，以这杯水酒表示我的敬意。”

“哎呀，沈老，快请坐下，你是我的前辈，应该由我向你敬酒才对。”周恩来连忙站起，慌不迭地辞谢道。

“马齿徒长，能者为师，我看还是不拘形式，干了这杯吧！”

“既然如此，恩来就僭越了。”周恩来说罢，举杯一饮而尽，轻轻叫道：“干！”

沈复生一仰脖，空了酒杯，响亮地说：“干！”“好哇！”席上众人都鼓起掌来。

王子余问内侄：“恩来，你觉得这酒怎么样？”周恩来拿过酒瓶一看，惊讶道：“哦，花雕？我有不少年没有喝过了。”

“你知道花雕酒的来历吗？”

“知道一点，不详细。姑父，你给讲讲吧！”

“花雕酒是绍兴老酒中的一种，从古代‘女儿酒’演变而来。《投荒杂录》中有一段关于女儿酒的记载：‘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候女将嫁，取供贺客，谓之女酒。’《浪迹续谈》中则记有：最佳者名女儿酒。相传富家养女，初弥月，即开酿数坛，直至此女出门，即以此酒陪嫁。其坛常以彩绘，故名‘花雕’。现在，花雕是一种别具一格的装璜，坛壁画有五彩缤纷的山水，栩栩如生的人物、花鸟或民间神话故事，如八仙过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嫦娥奔月、貂蝉拜月、昭君出塞、西施浣纱等。也有用石膏塑成而加彩色的，图案富丽堂皇，灿烂夺目，惹人喜爱。古时花雕多装大坛，有50公斤和25公斤等，现因战乱，规格不统一，产量也少，但作为上等礼品、喜庆宴会的传统还没有变。”

“姑父，你讲得太精彩了！看来，这花雕酒是绍兴的特色酒，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应该大批酿造，供应全国以至于全世界。”

“既然如此，那就多干几杯如何？”王贻甫提议道。

“不行，不行，晚上7时，我还要去龙山越王台参加三区贺专员召开的座谈会哩！”周恩来摆了摆手。王子余说：“贻甫，你不要劝恩来了。那贺扬灵不是易处之辈，善用心机，好使权术，恩来真得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以便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提到贺扬灵，大家的话就多了。

沈复生说：“贺扬灵字培心，江西吉安人。祖与父都是前清秀才，拥有

大量田产。由于武断乡曲，为恶一方，在十年内战时期，他父兄都被当地农民群众以恶霸地主罪名镇压。贺扬灵对贵党颇有怨言。”

王铎中说：“贺扬灵于民国十四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中国文学系，曾留学日本一年。回国后，在某大学充当讲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投靠陈果夫，获得了江西省党部委员的头衔。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把他调赴安徽省任党务整理委员一年。此公善于钻营，又认识了陈铭枢等。由于他的一套奉迎手腕，赢得了陈铭枢的赏识，迁交通部充主任秘书。黄绍竑调掌内政部，贺又投在黄的门下，一度充当随员同往内蒙古考察行政。日夕相处，又博得黄绍竑的器重。抗战军兴，黄绍竑二次主浙，任省政府主席，贺扬灵也由绍兴区专员兼县长，晋升为省府委员。后又向黄绍竑建议，浙西“地处前线，宜统一事权”，自告奋勇，争取做浙西行署主任，黄绍竑再度满足了他的要求。”

宋山说：“贺扬灵出任浙西行署主任不久，就提出了‘敬老尊贤，抢救青年’的口号。据说，第一点是对付汉奸的，防止汉奸利用一般老年人；第二点是针对贵党的，他说：‘青年人害思想病，不归杨，则归墨，如不抢救过来，会被共产党抢去的。’他还对青年说：‘你们既不要吃敌伪的假药，沦为日本的奴隶；更不要吃共产党的毒药，沦为苏联的奴隶。’只有他的药才是‘良药’，可以‘保证中国复兴’，和‘青年们心身健康’。他还对青年们发誓：“此心天地，此身党国，此志孔孟，此行禹墨。”并把这四句话刊登在《民族日报》的报头上。”

张天汉说：“贺扬灵的书法不错，惯用偏锋，自诩有‘横扫千军’之力。也能画墨梅和蟹。平时喜阅古典文学，唐诗宋词元曲都能讲上几句。吟咏专写古风，用仄韵，印有《劈天集》一本，用以结交文人名士，相与唱和……”

宋山不同意张天汉的看法，认为，“舞文弄墨，乃是贺扬灵的处世伎俩；结交文人名士，是装璜门面，收买人心！”

张天汉说：“贺扬灵这个人毛病是有一些，但古文修养、书画功底，在绍兴还是数得着的。”

“我看他赶不上曹天风……”

王子余怕争论引起不和，连忙转开话题：“恩来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又在国民政府供职，我们还是请他讲讲当前的时局吧！”

沈复生说：“好，正合我意。”

王铎中与王侃甫也说：“我们也想听听对目前形势的分析。”

周恩来吃了一口菜，简述道：“日本侵略者想侵吞全中国，他们是做了长期准备的，在一段时间里，会夺去我们的一些地方。但是，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反对，使他们不得安宁，现在是敌强我弱，我们要做好长期抗战的打算，用游击战的办法拖垮敌人，等全面反攻的时机一到，就把日本侵略者统统赶出去，连东北三省也要收回来。”

宋山问：“你们八路军所在地区的情况怎么样？”

周恩来说：“我们那儿还可以。不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只要不是当汉奸的，都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从各个方面支援抗日战争，人民对抗战怀着必胜的信心。绍兴地临前线，条件比北方好得多，可惜没有认真向这方面去做。我相信以后你们这里的民众也会起来，走上全民抗战道路的。”

大家都说：“有道理。”

这时，王子余之孙王戌跑进来对他爹王贻甫说：“阿爹，门外有两个戴呢帽、穿短衫的人，站着不走，鬼鬼祟祟的，看样子很不地道。”

“会不会是贺扬灵派来盯梢的？”一朵乌云飞上王贻甫的脸，他不由得担心起来。

王铎中说：“很有可能。贺扬灵当党务委员那年，就采用过这个办法，整掉了许多有识之士、有用之才。”

宋山补充道：“改编‘长超部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队李队长是吴兴人，湖州师范毕业，原在太湖边上，集合长超一带的农民百余人进行游击，人称‘长超部队’。因受敌围攻，移驻孝丰，等待机会，重返太湖。贺扬灵派人盯梢、侦察，获悉李某思想进步，富有革命精神及其出身情况，深恐发生意外，便借用调山检阅之名，将其改编为行署特务营‘吴兴队’，另派官佐带领。李见人枪俱失，空有两手，只好下山他往，另图发展去了。”

“真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张天汉也着急起来。

沈复生激于一腔义愤，慨然道：“干脆，我出去，把这二人撵走算了！”

“使不得，那会引蛇出洞，引火烧身的！”张天汉胆小，反对剧烈的行动。

“难道就任其胡为？罢了不成？须知这被盯梢的不是一介布衣，而是中央政府堂堂的部长呀！”沈复生刚烈，火气溢于言表。

周恩来坦然地说：“不要紧的，他们有他们的事，我们说我们的话。”

王子余对这位内侄的从容、镇定与成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说：“恩来说得对，谅那些宵小也不敢把我们怎么的，还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吧！”

大家都说：“好。”

王子余举起筷子，敲敲碗边，说：“哎呀，光顾了说话，菜都没有动，难道各位回家还要再吃一顿吗？”

大家都笑着，举起了筷子。

“周副部长，”沈复生问：“老朽想提一个问题：这一桌菜中，你最喜欢吃的是哪几样？”

“绍兴霉干菜，”周恩来说，“其实这种叫法名实不符。因为无论制作过程和成品都无‘霉’的特点，也不像绍兴腐乳有个发酵过程，所以称‘霉豆腐’，名实相符。大概因为绍兴人喜欢吃霉过的食品，如霉面筋、霉毛豆、霉苋菜梗、霉菜头等，干菜并不霉，却以讹传讹，冠以‘霉干菜’了。”

“说得对。”

“听说鲁迅先生喜欢用‘笋煮干菜’做汤，我则喜欢吃‘干菜炖猪肉’，但是只会吃，不会做，沈老可否见教？”

“干菜即菜干，用油菜制成的叫‘油菜干’，用芥菜制成的叫‘芥菜干’，用白菜制成的叫‘白菜干’。‘干菜炖猪肉’应选用上等鲜美的芥菜干，切成寸条状，将肉洗净，切块，最好选用带皮五花肉，拌以母子酱油与其他调味品。等肉吸收酱油后，一层肉一层干菜铺好，放在蒸笼里蒸一小时左右，肉已酥软，带有干菜清香，吃起来酥而不腻，鲜而不咸，菜干油润鲜嫩，确系‘过饭’的佳肴。而干菜切碎拌以笋干，煮成笋煮干菜，是上等汤料，盛夏季节，尤为佳品。”

“听君一席言，胜读烹饪书呀！”

“周副部长过誉了。”

“恩来，你还喜欢吃什么菜？”连王子余也兴致勃勃地发问。

“霉干张。”周恩来挟了一筷，吃了一口，赞扬道：“闻闻臭，放到嘴里倒很香咯！”

“哈哈哈哈哈……”大家又欢畅地笑起来。便宴后，周恩来与亲友们商量次日扫墓一事，决定上午先到“百岁堂”看望长辈与亲友，然后偕同部分亲友，一起乘船去涂山鸭嘴桥、石旗唐家岙、外王狮子山祭奠祖茔。至于船只，由王贻甫找绍兴县县府事务主任郑冠堂准备。

王子余说：“你们周氏家谱在‘百岁堂’，由你的族曾祖周希农保管。前两天他翻阅了一下，上面只有你父亲周懋臣公的记载，没有你周恩来的名字。”周恩来说：“那是因为我出生于淮安，青年时期便外出参加革命，社会几经变乱，因此名字尚未入谱。”“这次回来，你准备入谱吗？”

“准备入谱。”

“那就好。”

周恩来还打听了绍兴名胜古迹大禹陵的情况。王贻甫告诉他：“刚刚修整过。明日扫墓完毕，可以乘船去瞻仰一番。”

周恩来高兴地说：“大禹是中华民族的代表，大禹陵与禹王庙是名闻中外的古迹，明日能去那里瞻仰一下，便不虚此行了。”

日程与细节商量完毕后，周恩来给族曾祖周希农写了一封信，请他代办明晨的祭席与午餐。其文如下：希农太公公赐鉴：

兹派人呈上国币百元，请代办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间代请宝[保]佑桥本家各长幼午餐，烦渎之请，容明晨面谢。专稟，敬请晚安

曾侄孙周恩来叩即晚这封信，当晚就送到了“百岁堂”。

十三 越王殿舌战群小

绍兴，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处浙江杭州湾钱塘江的南岸，宁（波）绍（兴）平原的西部，为美丽富饶的浙北平原的一部分。

在远古，绍兴被称为“古荒服之国”。到了夏朝，大禹治平了水土，才划在“扬州之域”，并改称绍兴的苗山为“会稽山”，地名称“会稽”。春秋战国时，绍兴是越王勾践的国都所在地。汉代，置会稽郡。隋朝，废除郡邑制，改称“吴州”。到了唐代，又改称“越州”。

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宋高宗赵构改越州为绍兴府，取意“绍（承继）祚（皇位）中兴”。赵构在绍兴做了一年八个月皇帝，次年迁回杭州。元代，绍兴府改称为绍兴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又称绍兴府，统属山阴、会稽、余姚、上虞、嵊县、新昌、诸暨、萧山8个县。清代，仍沿用绍兴府的名称。1912年，山阴、会稽两县合并为绍兴县。

这样一个山川秀丽、人文荟萃、历史悠久的古城，在1939年3月28日夜，却一片黑暗。原来地方当局借口防空，实行了灯火管制，只有坐落在龙山山麓的越王殿灯火通明。绍兴专员公署在这里举办大型座谈会，欢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参加会议者均是事前研究布置的，有各界代表50余人，县政工队队员10余人，三区直属青年营、妇女营各30人，总计150余人。会场戒备森严，所有与会人员都凭“特别出入证”进出。

7时许，周恩来随带副官邱南章、警卫员刘九洲，由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贺扬灵陪同进入会场。全体起立鼓掌欢迎。周恩来举手答谢。贺扬灵请周恩来在会议桌上首落座，自己坐在他的旁边，接着指定张处德、王传本二人做记录。

果然不出王子余等人之所料，贺扬灵对这次座谈会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在战乱时期，贺扬灵能够上下沟通，内外融洽，一帆风顺，不仅坐稳了三区（绍兴）专员公署专员这把交椅，而且谋到了浙西行署主任这个肥缺，跟他的政治野心和政客手腕有着相当大的因果关系。别看他处处地方抱牢黄绍竑的粗腿，口口声声“服从黄主席，唯黄主席意志是听”，实际上他走的是C·C的脚步，暗地里又服从省保安处处长、省保安副司令宣铁吾。当黄绍竑的电话与宣铁吾的密令同时到达绍兴，在“欢迎周恩来”的同样措词下，他已分辨出双方截然不同的含义。他当即作出决定：执行宣铁吾的密令为实，落实黄绍竑的电话为虚；“热忱欢迎”为次，“严密监视”为主……须知，宣铁吾的背后是老头子，委座；所谓“密令”，也就是最高的指令啊！

正因为如此，贺扬灵以“安全”为名，请周恩来下榻在小校场绍兴县商会内。那里高墙深院，交通出入易于控制，四周派上岗哨，禁止行人通过，商会内所有的勤杂人员，都换成贺的亲信，连办理茶水伙食供应的侍役，也均由绍兴县政府特务队长亲自值班指挥。接待组的人员由中统绍兴常驻调查员、公开身份是专署秘书的袁特丹、专署特务秘书杨钜松、绍兴县政工队长刘广惠组成，当然也象征性地放了一个《战旗》杂志社主编曹天风。

贺扬灵对于周恩来外出会客等一些活动，都派人盯梢，名为“保护”，实则监视。对于他认为可疑的人，则限制参加有关的活动，限制新闻工作者采访。为了在今晚的欢迎会上给周恩来一个“下马威”，下午贺扬灵曾秘密召集杨钜松、许焘、刘广惠等人，面授机宜，布置发言，要大家做好提问及刁难的准备。

会议开始，贺扬灵致欢迎词。

他说：“今晚我们在这里举办一个大型座谈会，主要是为了欢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先生。国家需要统一，统一才有力量，周副部长是为统一而奋斗的。周副部长来东战场巡视的今天，正是东战场战鼓最紧急的时候，所以意义特别深重。”

他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接着说：“在一年多抗战中，我们三区的团结服从精神表现得非常彻底，真正做到了：此心天地，此身党国，此志孔孟，此行禹墨。”

贺扬灵对这个“四此主义”十分自赏，一直诤为战时的“天目精神”，不仅叫手下人制成巨大木牌四块，竖立在操场上，连刊在《民族日报》的报端，还逢会必讲，反复宣传，就连今天这样的会议也不放过。

贺扬灵得意地望了一下观众，认为气氛已经形成，时机完全成熟，便按照事先拟定的部署，诱发道：“周副部长是从抗战的大本营派来东南战线指导抗战工作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请周副部长作指示。”

第一个起立的，是专署政工指导室方元民。

他说：“自抗战开始，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日军长驱直入，国军屡战屡败，杭、嘉、湖早已沦陷，武汉、广州也相继失守。看来，风雨飘摇，社稷难保。请问周副部长，今日奢谈抗战，究竟有何意义？”

坐在方不远处的曹天风吃了一惊，作为政工指导室主任，他对这个经常散布失败主义情绪的下属颇为不满，但没料到他会在今天晚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由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周恩来已从做记录的张处德那里打听到发言者的姓名，答道：“方先生说‘国军屡战屡败’，恐怕与事实不符。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奏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想必方先生也一定知道。敌人原来打算用半年时间解决中日战争，实际却延长到一年半，才到达武汉、广州。虽然占了我们的一些城市，却消耗了相当大的兵力。最保守的估计，敌人的死伤也有50万人左右，加上生病的、调回日本去的，总计不下70万人。我们虽然丢了一些地方，但主力并未受到损伤，信心反而大大增强，士气越来越旺盛。这都是我们坚持持久战的结果，是我们发动全面抗战所取得的胜利。方先生，你能说抗战是奢谈，抗战没有意义吗？”

方元民颓然坐下。

曹天风轻轻地叫了一声：“好！”

第二个发问的，是绍兴三区保安副司令徐志余。

他说：“我是个军人，不讲究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讲究态势与力量的对比。尽管日寇气势汹汹，可对我们中国也是鞭长莫及。特别是我们浙江多山，他的飞机、大炮、军舰、战车都起不了作用，最近几个月已退而采取防守的策略。我要请教周副部长，为什么我们不出击、反攻，一举打败日寇，迅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坐在徐志余旁边的几个军官纷纷附议，认为徐副司令这个问题提得及时，代表了他们的心愿，他们都是“速胜论”的鼓吹者。

周恩来与徐志余已有过多次接触，并不陌生，他答道：“徐副司令说：‘不讲究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讲究态势与力量的对比。’这是对的。现在的态势与力量的对比如何呢？尽管敌人用半年时间解决中日战争的企图落了空，但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对比上，仍然是敌强我弱。虽然近几

个月敌人守多攻少，战事比较沉寂，但是，我们绝不能麻痹松懈。要知道这沉寂是暴风雨快要到来的象征，敌人正在准备更毒辣的计划，打算依靠政治的力量，配合军事的行动，来统治占领区域的中国，侵略没有被他占领的中国，达到吞并全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

徐志余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点头，通过几次接触，他对周恩来已肃然起敬。

周恩来继续说：“我们何尝不希望在一个早上就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呢？但是，速胜要有条件，没有条件的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而已。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须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不实际的速胜论。”

另外几个军官也点头道：“有道理！”

绍兴县县长沈涛发言。他由于近午时陪周恩来游龙山没有看贺扬灵的眼色行事，过多地介绍了秋瑾的革命事迹，而受到贺的责备，今夜发言有意为贺专员歌功颂德，以便挽回不良影响。

沈涛说：“周副部长，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只想向你汇报一下绍兴在贺专员领导下所取得的政绩。下面，我就分政治、经济、文化、百姓生活等几个方面，开始汇报。”

沈涛说得唾沫飞溅，大家听得枯燥无味，有的竟打起瞌睡来，只有贺扬灵听得浑身舒泰，得意洋洋，不时用眼瞟瞟周恩来，那潜台词十分明显——怎么样？我贺扬灵非同寻常，“治国”有方吧？

“真是王婆婆的裹脚，又臭又长！”地方著名人士张天汉嘀咕道。

“文过饰非，用心何在？”周恩来的姑父王子余也产生了疑问。

周恩来耐心地听着，偶尔还在笔记本上记下几个字。待沈涛汇报完毕，周恩来说：“在敌人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方式猛烈进攻的今日，我们应当加倍的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向敌人反攻。不过，沈县长，你不问我，我倒有一事问你。”

沈涛说：“什么事？周副部长，请讲！”

“这次来绍兴，我看见许多军人运米，据了解纯属走私，军商勾结，垄断米价，这是社会一大患，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这事，贵县是如何处理的？”

“有这样的事吗？”沈涛张口结舌，大出所料。

王子余仗义执言：“沈县长，确有此事！这些人尽是无耻之徒。人能知耻，庶可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硬汉子。”

“有这样的事吗？”沈涛头脑如浆，转而问他刚刚歌颂的贺扬灵。

“我怎么知道！”贺扬灵“见死不救”，反而把“皮球”又踢回给沈涛，“你去查一查吧！”

“是应该严肃查处。”周恩来接着说，“要不然，百姓的生活如处水火，专署与县的‘政绩’如何体现？！”

沈涛狼狈万状。

贺扬灵气得说不出话。半晌，才举起右掌，决心抛出“杀手锏”。

看到这事先约定好的暗号，绍兴县商会会长冯虚舟起立发难：“谈到政绩，兄弟倒要向周副部长请教，你们共产党、八路军那儿的情况又怎样？还

不是军事失利，经济困难，社会动乱吗？”

周恩来对这种无中生有造谣污蔑十分气愤，但他的自我控制能力极强，反感、愤怒不形于颜色，只是冷静地反问：“冯先生，你去过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地区吗？”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那儿‘军事失利，经济困难，社会动乱’呢？”

“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

“是谁办的报纸？”

“这个——”

“所以，我党毛泽东同志一向主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周恩来见冯虚舟悻悻坐下，便调转目光向着大众，语调铿锵地说：“事实正好与冯先生说的相反，在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地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上下平等，团结一心，大家都为抗日战争做贡献。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一点，但精神生活十分充实。”

由于实行了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在经济上遇到的困难已经或正在得到克服，社会相当稳定。至于我们的八路军，还有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只要不戴

有色眼镜和政治偏见的人都会承认，是他们牵制了敌人的大部分力量，并无数次地重创敌人……”

一个尖细的嗓子不客气地打断了周恩来的叙述：“中国需要统一，你们的边区政府应该取消！”

周恩来循声望去，是专署特务秘书杨钜松。

周恩来驳道，“这种论调，我已经听得多了。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是民主政治，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取消的理由安在？何况边区是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前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向相反的

方面统一，中国就会灭亡。”

杨钜松顿时语塞。

“我们只能搞军政、训政，不能搞民主政治！”有一个戴呢帽的人嚷道。

周恩来视之，是绍兴县政工队长刘广惠。

周恩来正言：“刘先生恐怕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照孙先生的意思，军政、训政都是过渡到宪政、实行民主的一种手段。只强调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就犯了手段目的化的错误。现在不能再把人民看作刘阿斗了，应该给人民以民主。”

刘广惠一下子“卡壳”。

“你们闹磨擦，使亲者痛仇者快！”发言者只露了一下头，便坐下，使人不知谁何。

周恩来斥道：“闹磨擦者有之。然而，不是我党而是贵党。如：华北的张荫梧、秦启荣就是两位磨擦专家。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简直与汉奸没有多少区别。果真是使亲者痛仇者快！有许多铁的证据，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

发言者如缩头乌龟，再也不敢伸头。

周恩来进一步阐发道：“我可以率直地告诉刚才发言的这位先生，我们

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我们是绝不害怕的。我们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贺扬灵听了，不禁失色。

“你们抓权，作为异党，应该受到限制！”叫嚣者是绍兴县党部书记王以刚。

周恩来从容地答道：“我们是重视权力的。”

举座不觉哗然。

曹天风、王子余、张天汉等迷惑不解。

贺扬灵精神大振，趾高气扬，以为得计。

周恩来环顾四座，语气一转：“我们重视权力，是为了更有效地抗日，更好地改善人民大众的政治地位与生活条件。我们为被压迫阶级争权决不让步；但个人不要权，不争权，更不会向某些党部、政府官员那样以权谋私！”

王以刚向有贪赃枉法之隙，仿佛一个偷儿行窃被当场抓住，纵使淘尽钱江水，难洗今日满面羞。

曹天风、王子余、张天汉等松了一口气：原来是欲擒故纵！

周恩来继续说：“至于异党需要限制，在贵党不成其问题，贵党中央不是秘密颁布了一个《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吗？我党对此是有看法的，我将在不久写信给蒋委员长，提出抗议。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大家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友军，不叫‘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尽管各派的人数有多少，力量有大小，但是同为一个目标，同在抗日，完全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而不应该互相排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才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通之处，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通之处的，这就是抗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如何集中力量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力量反共防共的问题。口号只能这样提，也必须这样提。”

贺扬灵全身一哆嗦，好像中了一闷棍，他的喽罗们也垂头丧气。

许焘强打精神，自报家门：“兄弟姓许名焘，现任《绍兴民国日报》社社长。我想请问周副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会不会同国民党再打内战？”

周恩来说：“十年内战招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深受荼毒，人民吃够了战争的苦头，人民是不要内战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无论哪一个党，如果再要发动内战的话，它必然为全国人民所唾弃！”

周恩来话音一落，四座动容，连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的说：“周副部长的辩才真好！”

有的说：“不是辩才好，而是掌握着真理，真理是不可战胜的！”

曹天风的担心、忧虑一扫而光，代之而来的是敬仰与昂扬。他激动地说：“我代表文化界，也来讲几句。地球向东转，世界向左倾，是两股不可抗拒的伟力。我们只能顺应，而不能抗拒，抗拒是没有好下场的。在当前，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窃以为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参加抗战就是投降派，我们要警惕反革命，警惕投降派！不知周副部长以为然否？”

曹天风的话，使在座的国民党官员及攀附他们的文人目瞪口呆。

贺扬灵咕哝道：“这不是宣传赤化吗？”

周恩来说：“曹先生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顺历史潮流而动’，都是这个意思。但我同时还要指出，真心抗战就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一定要努力把抗战的阵营扩至‘大无外’，把反对抗战的敌人阵营缩至‘小无内’。为此，我们就不能滥用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不能说不

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参加抗战就是投降派。要十分用心地做中间派的工作，团结他们参加抗战。”

曹天风感动地说：“周副部长所言极是，天风当恪守无误。”

会场上的人也在议论：“人家的心胸就是宽广，难怪有那么多人拥护……”

贺扬灵眼看自己的阴谋要落空，忙向身后的马弁递了个眼色，马弁会意退出了会场。

“自由”发言终于结束了，周恩来站起身来，会场的气氛立即改变。议论的，停止了说话；外出的，拥进了会场；坐在后面的一些人，还把凳子往前挪了挪。

周恩来微笑着向四周看了一眼，开始讲话。他说：“十分感谢诸位精心安排的这次欢迎会，使我对这儿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诸位的面貌也有了一定

的熟悉。”这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说得那些“提问”、“汇报”的人都低下了头。

接下去，周恩来的话锋一转：“刚才诸位的发言，共同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这是很不应该的……”

突然，龙山上的防空警报器叫起来，尖利惊恐的声音打破了古城夜的寂静，引起了越王殿里的骚动。

贺扬灵“霍”地起立，问仓皇入室的马弁：“怎么回事？有什么情况？”

马弁气急败坏地说：“报告贺专员，敌机前来轰炸！”

贺扬灵转头向周恩来：“周副部长，为了你的安全，是否暂避一时？”

周恩来连身子都没有动，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听到警报声似的，继续讲着：“如果国民党能够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全民抗战，那么，不论当前存在着的困难和以后更加大的困难，都是能够解决的。”

周恩来不走，大家也不走，贺扬灵只好向马弁挥挥手，马弁再次走出门去。周的副官邱南章也走出门去。

“我们面前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是汉奸卖国贼。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也要打倒汉奸卖国贼，只有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战，才能达到目的。”紧接着，周恩来分析了国际形势，通报了敌人现阶段对中国的政略与战略。

警报声再度响起，贺扬灵的马弁又走了进来，报告“敌机再次来袭”，周恩来仍照讲不误。

邱南章出现在门口，带来了一张纸条，周恩来打开一看，原来是值班警卫、妇女营副营长王阿菊写的七个字：

无敌机夜袭

阿菊

真相顿时大白：是贺扬灵企图用假警报打断他的讲话。周恩来一气之下，不

禁提高了嗓门：

“诸位知道今晚做会场的越王殿的历史吗？它在历史上屡毁屡建，越建越雄伟、辉煌，它还害怕什么兵燹、空袭甚至谎言、假情报吗？”

曹天风会意，插话道：“周副部长说得对，越王殿最近的一次重修，就是在去年完成的。重修的用意，就在于表达绍兴人民抗日杀敌的决心。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周恩来继续说：“越王殿是纪念越王勾践的。提到勾践，自然就会联想到他‘卧薪尝胆，洗雪国耻’的那段史话。公元前494年，吴国攻越，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山，最后被迫求降。勾践夫妇到吴国作人质3年，受尽凌辱和折磨，后来贿通了吴王的宠臣太宰嚭，才获释返回越国。勾践回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劳身苦心，夜以继日。困倦时，用辣蓼草来刺激眼睛；脚冻麻木了，索性伸进冷水中，‘冬常抱冰，夏还握火’。他在迎恩门（就是现在的西郭门）外，面向吴国，建起一简陋的‘箭楼’，自己住在那里，吃粗食，穿布衣，睡在柴薪上；又‘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以经常提醒自己，勿忘国耻。正因为如此，加上正确的政策，有效的措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逐渐强盛起来，终于在公元前473年，出兵打败了吴国。”

整个越王殿静悄悄的，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尽管这段史话多数人都很熟悉，但今夜听来倍感亲切，倍觉动人。连贺扬灵也被带进了那遥远的意境、深重的国耻之中，暂时忘记了因阴谋落空而造成的懊恼、因黔驴技穷而引起的羞愤。

周恩来说：“忆古为了鉴今。我之所以重提这段史话，就是为了激励在座诸位的民族气节，发扬民族意识和战斗精神，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振兴祖国在世界之东！”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空袭警报第三次响起，这次人们谁也不去理它，反把疑惑、厌恶的眼光投向贺扬灵，望得贺扬灵一脸苍白，一身冷汗，好不尴尬。他连忙向做记录的王传本小声交代了几句，王传本合上记录本，站起身来，走出了越王殿。此后，警报器就再也不响了。

周恩来详细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对这场战争的立场与态度，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引起了150余位听众的极大兴趣。

周恩来最后指出：“浙东局势不可能长期平静，我们要克服未来的困难，必须切实做到：民众重于士兵，后方重于前方，政治重于军事，精神重于物质，部队重于机关，敌人后方重于安全后方。只要我们路线对头，政策正确，措施得力，我们就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杭嘉湖，收复武汉、广州，收复一切失去的土地！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听众们报之以长时间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周恩来的讲话长达四小时，散会时已是午夜2点半钟，周恩来与邱南章、刘九洲回到县商会就寝，已经3点钟了。

十四 祭祖茔，谒禹陵，续家谱

3月29日晨6时许，姑父王子余来访，周恩来恭迎入内。接着，门房来报：有个自称“周希农”的人要见周副部长。

“周希农？这不是族曾祖吗？”周恩来急忙出门相迎。但见一个老人正在与袁特丹讲话：“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我已经活了将近六十个春秋，还骗你这年轻人做啥？！”

周恩来认出那老人就是族曾祖，走上前去，叫了一声：“太公！”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躬。

“怎么样？我没有撒谎吧？”周希农对着袁特丹抗议道，“你们这班人眼乌珠都有毛病，只认得铜钲银子，不认得爷娘老子！”

袁特丹连连赔礼道：“对不起，老人家！对不起，周副部长！”

原来袁特丹和他的手下人，错把周希农看成了卖菜的老农。

周恩来扶周希农入室，请他上坐，又要鞠躬，让周希农一把抓住了胳膊：“刚才已行过礼了，现在还鞠躬做啥？”

周恩来说：“刚才是见面礼，现在应行大礼，礼多人不怪嘛！”

“我们是近亲，不讲这一套。我看你这样子就跟大门口那班人不一样，当官不像官，准是个好清官。”

“太公，我昨晚不是捎信给你老人家，今天一早就去‘百岁堂’看望诸位长辈，你怎么亲自来了？”

“我是个‘泡煞鬼’，急性子，从接到你那封信开始，便盘算着采购什么，准备什么，一个晚上没睡好觉。今早特来看看你，顺便问问祭席与午餐的标准。”

“此事拜托太公主持，一切均由太公定夺，费用如果不够，再由恩来补足。”

“这是我们周姓整个家族的事，怎好叫你一人开支？”

“恩来自幼外出，殊少回乡，对家族无甚照顾，这次祭祖费用，理应由我承担。”

“难怪那么多人赞扬你，连最有学问的曹天风曹先生也说你礼贤下士，智慧胆略过人，是民族的脊梁。”

“太公休夸，恩来受之有愧。”周恩来谦逊地说，转而问道：“‘百岁堂’的亲戚们都好吗？”“好咯！好咯！”周希农答道：“现在住在那里的，还有你的族曾祖周文炳，族叔周云峰、周金麟，与你同辈的兄弟六七人，大家都好咯！”

“待会儿我就去看看他们。”

周恩来送走周希农，便向邱南章交待下乡扫墓之事。

8时许，县府事务主任郑冠堂和表弟王贻甫来县商会告知：“下乡扫墓的船只已备好。”

周恩来问王贻甫：“姑父知道吧？”

王贻甫答：“知道。他由于年高不良于行，特命我代为作陪，并委托宋山先生当向导，是我们后生一代中的‘半个绍兴通’。”

这时，宋山等六七个人走了进来。

周恩来起立，迎着宋山说：“欢迎绍兴通！”并跟宋亲切握手。

宋山激动地说：“在周副部长面前，我可不敢妄自尊大，只是当当向导，

称不得‘绍兴通’的。”“宋先生过谦了。”

“还有我哩！”王贻甫之子王戍挤上前说：“表伯，我也跟你去！”

周恩来问：“你不是要上课吗？”

“我已经向老师请过假了！”

“那好，就一起去吧！”

袁特丹走过来说：“周副部长，贺专员关心你的安全，放心不下，特派我带4个兄弟做你的随从。”

王贻甫感到十分意外：“这是我们周家祭祖扫墓，外人去干什么？”

袁特丹正要解释，周恩来已先行表态：“去就去吧，人多势众，热闹一点也好。”

8时半，周恩来出县商会到“百岁堂”看望长辈与亲友。

“百岁堂”坐落于保佑桥西首河沿永昌坊。这是一座灰墙黑漆竹编台门，台门左右竖立着旗杆石四块，建筑坐北朝南，共分三进。第一进门斗，第二进大厅，均具明清风格，第三进是二层楼屋。

听说周恩来已进大门，周氏家族的人都欢天喜地地聚到了大厅。周希农笑模悠悠地给周恩来介绍。先是长辈，后是同辈，先是男亲，后是女眷。对长辈，周恩来一律行三鞠躬礼；对同辈，则一一握手问好。周恩来对于“百岁堂”的历史不甚清楚，当他坐下来后，便向长辈们提出了疑问。

周文炳捧出《周氏渊源考》，念道，“世祖宋朝周敦颐（莲溪公），先徙扬州，再徙浙江山阴柯亭之阳，居地曰螺蛳湖，士人建周惠王庙，奉为香火院。高祖元朝名茂，字元泊，进士，官至左丞相，进金紫光禄大夫，封沂国公，赠太师。其四世讳庆，避兵入城，居会稽镜水里，至洪武辛酉，从居于永昌坊。”接着说：“所以，第一进门斗有隐门一扇，上悬板对一副：‘莲溪绵世泽，沂国振家声。’说的就是我们周氏的渊源，出过两个有名的上辈，即莲溪公周敦颐和沂国公周茂。”

周云峰说：“‘百岁堂’原来叫‘锡养堂’，是明朝洪武年间周家四世定居于永昌坊时题名的，堂匾就悬挂在这间大厅的上方。到康熙三十七年，十世祖周懋章寿91岁，妻王氏寿百岁，清巡抚授给‘百岁寿母之门’匾额，悬挂在门斗的二门上方，从此，改称‘百岁堂’，一直沿用至今。”

周恩来点头道：“原来如此。”

周文炳说：“我们周氏历代都有人宦游于外，以幕府为生，但未离开过‘百岁堂’。你的祖父，就是第十八世的周殿魁；你的祖母，是绍兴皋埠西鲁鲁登四的长女。你的父亲与叔伯们都生长于‘百岁堂’。后周殿魁外出谋生，举家迁往淮安。”

周恩来问：“太公这一支系的情况如何？”

周希农答：“我们这一支系一直没离开过绍兴，也没离开过‘百岁堂’。我的父亲，就是第十六世的周翰青，原是馆师，后自学做过中医。我与文炳是第十七世，云峰、金麟是第十九世，与你父亲同辈。”

“那么，恩来应该算是第二十世了？”

“对咯，对咯。”周希农正要下去，一阵突来的“哗哗”声将他的话打断，屋瓦不住作响，檐头水柱长流，天公不作美，竟下起大雨来。

周恩来急得站起来，走到屋檐下，望了望湿漉漉、灰蒙蒙的天，说：“下这么大的雨，今天怎么去扫墓呀？”周希农说：“春天的雨下不长，等一会儿，天会晴的。”

周恩来回到座位上，继续问：“太公，听我姑父说：你保存着一本周氏家谱？”

周希农打开香案下的抽屉，拿出一本线装的手写本，递给周恩来：“喏，就是这一本。”周恩来细细地翻阅着，从世祖周敦颐（莲溪公·宋朝）、高祖周茂（沂国公·元朝），到一世、二世、三世的万字辈、寿字辈、庆字辈，再到四世、五世、六世，一直看到十九世，果然如昨夜姑父王子余所云，只有他父亲周懋臣（贻能）的名字，接下去的二十世零零星星，极不完整，没有他周恩来的名字。“怎么样，找到你父亲的名字了吗？”周希农关切地问道。

“找到了，跟云峰叔、金麟叔同列在第十九世。”周恩来答道。

“再下去的名字就不多了。由于战乱，也由于居住分散，不少年轻的子、孙辈还来不及续谱哩！”“恩来这次回绍兴，就有续谱的打算。”“真的吗？”

“真的。”

“那太好了。”

所有的亲友都喜形于色。那突来的雨又突然地停了下来。

“天晴了，我看大家还是先陪恩来去扫墓，回来再到‘百岁堂’续谱。”周希农愉快地提议道。

“好咯！”周文炳、周云峰、周金麟等一声回答，便拥着周恩来去保佑桥河埠。

9时开船，周恩来等一行20余人。分乘3只乌篷船。周恩来及其随员邱南章、刘九洲，王贻甫及其子王戌，周希农、宋山、袁特丹及其一个特工坐在大乌篷船上，周姓本家族人与另三个特工坐另一只船，第三只船是伙食船！船只出五云门，在不宽的河道中缓缓地行进。

周恩来站在船头，眺望两岸。远处村庄隐现在蒙蒙的云雾中，看不到炊烟，也看不到人影，虽然是春天，景色却像秋天一样的萧瑟与冷清。近处田野里，稀疏的春苗抽的穗子又瘪又小，油菜的叶子显得枯黄、单薄，田间路旁的坟茔多得不计其数，荆棘、蒿草到处都是，船只过处，惊起无数乌鸦，叫声十分难听。

周恩来对身旁的宋山、王贻甫说：“看来，乡亲们生活很苦啊！”

宋山说：“这几年日寇侵犯，战火越烧越近，难民越来越多。政府拉伕要粮，奸商投机倒把，弄得老百姓实在难以度日。”

王贻甫说：“正所谓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是啊！不赶走日寇，国无宁日，家无宁日，老百姓就别想过好日子！”周恩来感叹道。

这时，袁特丹和另外一个特工人员从船舱中探出头来，朝他们张望。

“恩来哥！”王贻甫向他使了个眼色，又做了个手势。意思是：有人监视，应换一个不带政治性的话题。周恩来回头看了一眼船舱，那两颗探出的头立即缩了回去。但等周恩来移开视线，“缩头乌龟”又伸出头来。

周恩来笑笑，根本没当一回事，继续说：“绍兴水乡河港交错，湖泊接连，资源丰富，应该提供更多的抗日给养；山区峰峦起伏，层次深广，林木繁多，可以作为抗日根据地，对于长期抗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周恩来的从容镇静也感染了王贻甫与宋山二人。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绍兴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农民对抗战前途的看法，王、宋二人均一一作了回答。

说话之间，到了第1处墓地，周恩来登岸祭扫，众亲友紧随其后。接着，去第2处墓地、第3处墓地……总共去了5处：

1. 涂山鸭嘴桥周氏十四世祖孟班公之墓地；
2. 涂山鸭嘴桥周氏十五世祖孔锡公之墓地；
3. 石旗唐家岙周氏十六世祖景商公之墓地；
4. 外王狮子山周氏十七世祖笑岩公之墓地；
5. 外王狮子山周氏十八世祖樵水公之墓地。

扫墓时，周恩来还访问了几户农家，并酬谢了坟亲。先后向鸭嘴桥、狮子山两处坟亲各送现金20元。向唐家岙坟亲送现金10元，以暂解断炊之苦。中午，周恩来一行在施家庄孝子祠堂用餐。饭后，便乘原船去游览禹陵。

听说去禹陵，王戎高兴得跳起来。

“怎么，你没去过禹陵？”周恩来问这位表侄。“学校去年组织远足，去过一次。”王戎问道。“你觉得大禹这个人怎么样？”

“我们老师说：大禹是个有德之君，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个好皇帝之一。”

“你们老师给你们讲过大禹的故事吗？”“讲过，是上历史课时讲的。说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对，这才是最主要的。”周恩来微笑着说，“大禹姓姒，是鲧的儿子。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之命治理洪水。他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在治水13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后以治水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传说他曾制造九鼎。他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也就是夏代。”

“什么叫九鼎？”

“‘鼎’是古代烹煮用的器物，一般是三足两耳。‘九鼎’是九个鼎，象征九州，泛指全中国。”“表伯，你知道的事情怎么比我们的老师还要多？”

王贻甫说：“傻孩子，你表伯是留过洋的大学生，又是国民政府的部长，当然要比你们的老师知道的多得多。”

“贻甫，你说得不对。”周恩来纠正道：“无论是留洋的大学生，还是政府的副部长，小时候都是老师教出来的。”

“那为什么你的老师比我的老师高明呢？”王戎扑闪着一双大眼睛，疑惑地问。

“因为教我的老师岁数大，是你们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哈哈……”周恩来的话，引起了一片欢乐的笑声。

船傍禹陵，周恩来指着苍翠、秀丽的后山，问宋山：“这就是会稽山吧？”宋山答：“是的。”

“‘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

“周副部长念的是《史记·夏本纪赞》？”“不错。太史公司马迁的调查研究作风，是值得今人学习的。要不是他专程到这儿来作了一番考察，恐怕也不会将大禹东巡葬身之地定在这里。”“周副部长说得对。”

他们沿着甬道，来到墓址。但见一块石碑，上题“大禹陵”三字，每字一米见方，上面覆盖着一个精巧的亭子，十分古朴庄严。

宋山介绍道：“这便是大禹陵碑亭。亭两侧有咸若亭和禹穴辩碑亭，后者对禹穴的历史沿革有详细的考证。”

“‘大禹陵’三个字是谁写的？字字遒劲有力，个个稳如泰山。”

“是明代书法家南大吉的手笔。”

“难怪非同凡响。”周恩来回头向亲友们招呼道：“来，来，来，我们大家在这块碑前照张相吧！”合影之后，周恩来又单独在碑前留影，记下了这个难忘的历史瞬间。

望见禹王庙，周恩来的兴致更浓。禹王庙共三进：午门、祭厅、正殿，依山势逐渐升高。正殿前石阶整齐，周围青石栏杆，气势相当雄伟。周恩来又与全体亲友，在这里合影。

禹王庙殿宇高甍飞檐，画栋朱梁。正中立着大禹塑像，高约6米，袞袍冕旒，执圭而立，神态端庄大方，令人肃然起敬。

周恩来问：“这座塑像，是原样修的，还是重新塑造的？”

宋山答：“是重新塑造的。”

“是谁定的稿？”

“是请章太炎先生审定的。”

周恩来又仔细打量了一番，点头称赞道：“塑得好，塑得好！”

他又指着塑像供壁上的油彩画九把斧头，问：“这是什么意思？”宋山摇摇头说：“不清楚。”

“祝甫，你看呢？”

王祝甫也摇摇头说：“不知道。”

王戌说：“表伯，刚才你在船上不是讲过大禹制造九鼎吗？这九把斧头，是不是跟九鼎有关系？”周恩来笑道：“还是王戌聪明，九斧与九鼎一样，象征大禹疏凿九州的丰功伟绩。你们看这副楹联：‘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就是歌颂大禹为解万民于倒悬之苦，立志根治水患的伟大精神的。”在大殿的后墙上，刻着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地平天成”。周恩来也很感兴趣。

宋山主动告诉他：“这是绍兴著名书法家李生翁先生的手迹。”

“李先生为人如何？”

“生翁先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书法上造诣极高，但平时从不自矜自夸，对社会公益之事还特别热心，因此口碑甚佳。”

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他转过身子对邱南章说：“邱副官，你记着点，待会儿回到城里，你拿我的名片去探望李生翁先生，代表我表示一下对乡贤的仰慕之情。”

邱南章应道：“好。”

“至于生翁先生的寓所，”宋山激动地说，“邱副官，我现在就抄给你。”

“谢谢！”周恩来还游了禹王庙东边的“窆石亭”。宋山指着亭中直立着的一块高约2米的石头，介绍道：“这就是窆石，相传是大禹下葬时引棺槨入穴所用的工具。正是在这块窆石下面，埋葬着治水英雄大禹。”

周恩来趋近端详：“这窆石上有很多刻字呢！”“周副部长不妨辨认一下。”

“‘四年王石’这几个字清楚，另外的字不十分清楚。”

“认得对，据金石家鉴定，这几个字为汉刻。鲁迅先生对窆石亦曾作过考证，并录有龙朝夫瞻仰禹陵诗一首。”宋山说着说着，便朗诵起来：

沐雨栉风无暇日，
胼胝还见圣功劳。

古柏参天表元气，
梅梁赴海作状涛。
至今遗迹衣冠在，
长使空山魑魅号。
欲觅冢陵寻窆石，
山僧为我剪蓬蒿。

“诗写得好，你朗诵得也好。”周恩来夸奖道，又问：“这窆石的顶端怎么有一个碗大的洞？”宋山说：“那是垒石起坟留下的。按照大禹陵的习俗，凡来瞻仰的人都要朝小洞里丢几块小石头。”

“好吧，我也来丢几颗石子。”

下船回城时，周恩来又站在乌篷船上，照了一张相。

在返城途中，周恩来对宋山说：“大禹陵与禹王庙，是绍兴最负盛名的古迹，千百年来，许多文人学士如李白、元稹、陆游、徐渭等，都曾经攀登过会稽山，探临过禹穴，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可要注意保护啊！”

宋山说：“周副部长说得对，鲁迅先生在绍兴执教时，多次率学生来此游览并拓碑，后来又以大禹治水为题材，写了历史小说《理水》，以颂禹之功德。……大禹陵与禹王庙不仅属于绍兴，也属于中国！”

“正因为如此，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应拨专款，对大禹陵与禹王庙加以维修。改变目前过于局促紧迫的布局，增加几个景点，新辟几片草地，多植一些盘槐、翠柏。后面围墙也可以向外伸出三四十米，使主要建筑物的气势更加雄伟……”

随着周恩来的叙述，宋山、王贻甫等都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展望之中。

在归途，周恩来还详细地询问了宋山的工作和读书的情况，宋山据实作了回答。

周恩来说：“我看过你在《绍兴民国日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写得很有激情，如果再加强一下思想性就更好了。青年人要学习和发扬‘五四’革命精神，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大熔炉里去，自觉地锻炼自己，努力战胜艰难险阻，为祖国、为民族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宋山听了，感动地说：“作为赵王的子孙，是会经得起战火的考验的！”

周恩来听了宋山的回答，宽慰地笑了。

回到绍兴城里，周恩来在“百岁堂”稍事休息，便开始续谱。他翻开由族曾祖周希农保存的那本《周氏宗谱》，在他父亲周懋臣（贻能）的下面，用毛笔作了如下补充：

恩焕 五十房樵水公曾孙，捷三公孙，静之公长子。生于光绪二十年。

恩来 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公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

恩溥 字溥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孙，懋臣[公]次子。生于光绪己亥年。

恩宏 字 ，五十房樵水公曾孙，捷三公孙，静之公次子。生于光绪壬寅年。

恩寿 字同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孙，懋臣[公]三子，出继曼青公为子。生于光绪甲辰年二月二十三日。

恩勤 字 ，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孙，焕臣公子。生于光绪壬

寅年。

恩彦 字蔚人，五十房樵水公曾孙，孜甫公孙，劫之公子。生于光绪乙巳年。妻葛少文。

恩霆 字润民，五十房樵水公曾孙，逸帆公孙，调子公子。

.....

晚餐，由表弟王贻甫招待。共餐者有姑父王子余、表妹王逸鸥、王去病等，全是一家人。

大家围着大圆桌敬酒，畅谈。当周恩来向王贻甫回敬时，贻甫歉意地说：“我刚生过一场病，不能多喝酒，请恩来哥代为多喝几杯，抗战胜利后，我一定痛痛快快喝它三大杯。”

周恩来大声说：“好，好！”

谈到社会上一些人的“恐日病”，周恩来指着衣架上自己穿的那件大衣说：“日本侵略者有什么可怕？！我穿的这件大衣，就是从他们那里缴来的战利品。在这方面，我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习。按照我党毛泽东主席的说法，鲁迅先生‘他在黑暗和暴力的进袭下，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和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鲁迅精神正是我们要发扬的民族精神！”

王子余赞赏道：“恩来说得对！”

“姑父，我们周家跟鲁迅是否同族？”周恩来问。

“同姓不同族。鲁迅是鲁圩周，你是后马周。”王子余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刚才提到的毛泽东主席，就是毛润之先生吧？”“就是他，我们中共中央主席。”

“真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他对鲁迅的分析太深刻了！”

“姑父，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个大政治家，还是个大诗人哩！他的《沁园春雪》，你读过吗？”“不曾读过，愿闻其详。”

周恩来问表弟、表妹：“你们也想听听吗？”表姐妹们众口一词地说：“愿意听。”

“好，那我就背诵一下吧！”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空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王子余击节道：“好词，好词！恢宏博大，气象万千，真是绝妙好词笺！”

王去病说：“表哥，我也感受到这首词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过，我的古文基础不如阿爹，不像他老人家理解得那么快，还是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王逸鸥说：“我也有这个要求。”

周恩来答道：“好。”便逐字逐句地讲解给表姐妹们听，并将最后一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念了两遍，解释道：“真正称得上英雄人物的，不是古代的帝王将相，而是今天的人民大众。青年人应该勇敢地投身到

抗日斗争的洪流中去，将抗战进行到底，当时代的英雄！”

二位表妹一连声道：“写得太好了，解释得也太好了！”

饭后，周恩来应亲友的要求，在王贻甫书房内题词 13 幅，分别赠送，留作纪念。

出于对姑父王子余的敬重，佩服他的耿直与正气，周恩来给王子余书写了岳飞的《满江红》。

给姻叔王缙尘的题词是：“生骤教训廿年，犹未为晚，愿吾叔老当益壮！”

鉴于表弟王贻甫家里人口多，经济压力大，周恩来特为他题写：“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

周恩来听说表弟王同甫原在嘉兴银行当职员，嘉兴沦陷后，随银行暂避上海外国人租界，如在“孤岛”生活一般，心情十分苦闷，便给他书写了“从孤岛生涯中认识故国才是真认识！”交族人转给王同甫。

给另一个表弟王云甫写的是：“人人尽力，人人享受，人人快乐，这是大同世界。”

表妹王逸鸥是中学国文教员，周恩来赠给她的题词是：“精研中国文学，发扬民族意识，创造出中国民族的新文学！”

表妹王去病是绍兴中学学生，周恩来先用毛笔给她写了一张：“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并在末尾署上“去病表妹”。王去病还不满足，又取出一本缎面纪念册来，翻到其中第一页，要表哥再给她写一张。

周恩来说：“这头一页，我不能写，应该留给姑父他老人家给你题词，我只能在第二页上给你写。”说罢，翻过一页，用钢笔横写：“青年是学习时代，从课堂中学习，从服务中学习，从师友中学习，要认识学无止境。”然后问她：“你三姐字逸鸥，你有没有字呀？”

王去病答：“有呀！我父亲教我们姐妹，在成年之后，该自己取字，我学名叫去病，字逸莺，是黄莺的莺。我想请你给我题一张‘逸莺’的！”

于是，周恩来在这张钢笔题词中写了“逸莺表妹”，并在署名“周恩来”之后，写上了题词日期：“廿八、三、廿九”。

给三个表侄，周恩来也分别题了词。

给王戍（慕向）的题词是：“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

给王德怀的题词是：“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给王京的题词是：“努力学习，精益求精！”

题词、交谈一直到 2 时半，待王贻甫陪送周恩来到下榻处休息时，又正好是 3 点钟。

十五 “中华终竟属炎黄”

3月30日，清晨。周恩来为了修改昨晚给姑父王子余题写的《满江红》词中的一个错字，特地由县商会来到王家，并应亲友们要求，在王家的槐荫堂前与他们合影留念。参加合影的亲属有：王远甫、章文渠、王戎、王贻甫、陈建珍、王逸鸥。

8时，在县政府郑冠堂、陈以炎等人的陪同下，周恩来前往“百岁堂”周宅用餐。周希农、周文炳、周金麟等族人，原想请他上绍兴著名的“知味馆”，但周恩来不同意，说那里人多、嘈杂，讲话不方便，不如在自家屋里好。虽然用餐地点改在“百岁堂”，但点心、饭菜仍是向“知味馆”包的。

席间，有人谈到藩祖公之三子延祐早逝，身后无子，遗孀赵氏孤苦伶仃。早年间，延祐长兄延春遵照母训，将庶出之子嘉璋过继赵氏为子，立有《合同继书》。按照旧俗，只要族中有身份的各房长老在继书上签字作证，就具有社会约束力。由于周恩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故大家提议，要他在继书上列名签字作证。周恩来听了情况介绍，欣然答应，即席在继书上签上“族周恩来”四个字。

饭后，周恩来主动提议，与长辈、亲友在“百岁堂”大厅前拍了几张照片。

这时，贺扬灵来到“百岁堂”，与周恩来交谈近一小时。接着，周恩来应长辈亲友之求，为希农太公等人题了词。

9时许，周恩来在贺扬灵、曹天风、乐培文、李生翁等人的陪同下，乘县政府专备的小汽轮去离城9公里的皋埠西鲁访亲办事。西鲁是周恩来祖母的娘家，有一表伯叫鲁觉侯，在浙江粮食委员会工作。周恩来见绍兴粮荒严重。特往访表伯商讨办粮之计。但因鲁去了金华，未遇。

从西鲁回城途中，周恩来等在东湖作了短暂停留。

周恩来对曹天风说：“关于东湖的渊源，曹先生可否介绍一下？”

“可以，可以。”曹天风答道：“东湖在绍兴城东七里，与杭州西湖、嘉兴南湖合称为浙江三大名湖。它原是一座青石山，据《旧经》记载，秦始皇东巡时曾在这里停车喂马，休息过，因此古称箬簑山。从汉代起，这里成了石料场。至隋朝，杨素为了扩建绍兴城，调集民工进行大规模的开采，经过近千年数十代石工们的努力，终于把这座山开凿成千奇百怪的峭壁和深邃莫名的水塘，构成了今日东湖的雏形。到了清代，人们在这里筑堤数百丈为界，堤外为河，堤内为湖，因为位置在城东，才取名为东湖。”

“听说孙中山先生和陶成章先生曾到过东湖？”

“是的。还有徐锡麟、秋瑾等志士仁人，他们都到过东湖。或游览，或商议革命大计。陶成章遇难后，绍兴父老特在东湖建立陶社，以资纪念。民国五年8月，孙中山先生曾莅临陶社致祭，并摄影留念。”

“周副部长，我们快走吧！”贺扬灵催促道，并率先向前走去，听语气就知道他对陶成章不感兴趣。

“这个方向是通往陶社的吗？”周恩来怀疑地问。

“不，陶社在东湖的西首，我们应该往这边走。”曹天风答，同时迈出步子领路。

“到东湖不瞻仰陶社不行，而且必须首先瞻仰陶社，再欣赏山水。”周恩来边走边说，“因为陶成章是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国民主革命时

期杰出的活动家之一，他始终不渝地进行反清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在上海被反动派杀害了，但他的精神至今还在鼓励我们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两天交道打下来，贺扬灵对周恩来的革命性与坚定性已有所了解，只好不再坚持，悄悄地跟在大家后面。

瞻仰过陶社，周恩来等泛舟东湖，果然感到此湖水深岩奇，湖洞相连，风光如画。湖头有两座精致的石桥——秦桥和霞川桥，把平静的湖面分成三部分。椭圆的绕门山，怀抱一湾春水，山光与水色融合，峭壁与绿潭映衬，堪称鬼斧神工，巧夺天工。

他们还看了仙桃洞与陶公洞，正准备拾级登上绕门山时，碰到了几个樵夫、渔夫与挑担者，周恩来立即停下来，向他们亲切问话，从柴米油盐，一直谈到对抗战的态度。

周恩来兴奋地对曹天风、贺扬灵说：“我们的前方有英勇抗战的战士，后方有这样勤劳、质朴、憎恨敌人的人民，我们又有广大的国土，足以发动人民，建立全面抗战的统一战线，抗日的胜券必操我手。我们不仅可以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而且最终一定能够彻底打垮侵略者，光复全中国！”

曹天风与乐培文说：“周副部长所言极是。”

贺扬灵皮笑肉不笑地说：“周副部长讲得有道理！”

中午，他们在城内小云楼寺就餐。随即又乘小汽艇去快阁游览。

周恩来对李生翁说：“快阁与书法有关，关于快阁的情况，就得请你这位著名书法家介绍了。”

“在周副部长面前，老朽焉敢忘自称大？！”李生翁谦虚道，他是周恩来专门点名请来的，通过半日的接触，已深深为周的平易近人、敏锐睿智所感动。

“生翁兄不必过谦，周副部长请你介绍，你就介绍吧！”曹天风与李生翁交往甚密，从旁插话。“好，我就介绍一下，不足部分请天风兄与贺专员补充。”李生翁说：“关于快阁有两种说法：一说建于清朝，快阁的主人、书法家姚振宗为了假借放翁史迹，以隆其声价，在这里立碑刻字；另一说快阁在宋朝就有了，陆游常到此饮酒赋诗。”

“李先生，你以为哪种说法正确呢？”周恩来恭谨地问。

“两种说法——我以为——都有道理。”李生翁继续介绍道：“快阁占地面积不大，但山、水、亭、楼一应俱全。它坐北朝南，面山临水，回廊曲折，玲珑幽雅。阁后有小庭园，前叠假山，后设小他，池上筑有‘春花秋月楼’。清代吴寿昌曾有诗赞之曰：‘座间风月好，道上面图如。’民国二十一年柳亚子先生偕徐蔚南等到此游览，也写过一首诗。”

“愿闻其详。”

李生翁抑扬顿挫地吟诵道：

快阁登临兴未穷，
森严门禁幸能通。
不嫌冒雨淋漓苦，
为访诗人陆放翁。
放翁一去已千载，
老屋还留香火缘。

小隐鉴湖原不恶，
那堪挥泪望中原。

周恩来赞扬道：“柳安如先生是近代我国一大诗家，诗如其人，颇有风骨。这首诗也不例外，具备他一贯的风格，潇洒俊逸，浑厚有力，李先生的吟诵，十分生动地表达了这首诗的特点。”

“周副部长分析得完全正确。”

他们边走边谈，从快阁的主人姚振宗，谈到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唐代著名诗人和书法家贺知章，明代杰出的书画家、诗人徐文长，明末清初的画家陈洪绶，清朝有成就的书画篆刻家赵之谦等，除王羲之外，都是绍兴人。

他们的情绪感染了贺扬灵，他也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议论。贺扬灵说：“书圣王羲之虽然出生在山东琅琊，但在会稽、山阴为官多年，实际上也可以算作绍兴人。他的书法有‘天马行空，游行自在’，‘龙飞凤舞，铁划银钩’之称，一千六百余年至今，尚无出其右者。”

周恩来说：“贺专员高见，本人亦有同感。王羲之应该算大半个绍兴人，他的传世之作《兰亭集序》就是在绍兴写的。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书法艺术上的价值更大，史称‘天下第一行书’。不知贺专员有没有见到过《兰亭集序》的真迹？”

“据传《兰亭集序》的真迹，随唐太宗一起殉葬了。我开始还有些不相信，在任期间曾多方寻索，找到的都是摹写本。”

“除了《兰亭集序》，王羲之还有哪些存世的墨迹？”

“有‘绅龙半印本’等，还有石刻三四百种。”

“这都是无价之宝，可不能散失、损坏啊！”

“谁说不是！”

游完快阁，在回城途中，周恩来对曹天风等人说：“出生不是绍兴，但与绍兴有密切关系的历史名人还有一个。”

大家问：“谁？”

“大禹。他虽然出生不在绍兴，但葬在绍兴，永远跟绍兴人民在一起。”周恩来眼光闪亮地说：“大禹在人类向自然作斗争中打响了第一炮。在科学萌芽的时代，能同自然作战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没有学好大禹治水这一课，只晓得遏制，不晓得疏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受到人民的反对，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

曹天风望了贺扬灵一眼，说：“这个历史的教训，在当前更应该认真汲取。”

贺扬灵没有吱声。

“绍兴不仅仅出书法家、画家，还出诗人、文学家、革命家。”周恩来话题一转，接着说下去：“宋诗中陆游第一，不是苏东坡第一。陆游一生中写了许多诗，贯串始终的特色，是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他中年入蜀以后，更加明显。陆游在诗中所表现的那种时时刻刻对祖国的热爱和忧虑，那种为多灾多难的祖国而歌唱而呼喊的一贯到底的精神，不仅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即使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见的。”

曹天风说：“周副部长的分析深中肯綮。正如清赵翼所言，由于陆游写的诗‘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因此受到投降派的厌恶和打击。当时的著名学者朱熹曾经对此表示愤慨：‘恐不合作此好诗，罚令不得作好官也。’”

“但是，陆游不管受到多少打击，他那‘恢复神州’的爱国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早年的诗这样写着：‘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拿’；中年的诗仍是这样写着：‘报国计安出？灭胡心未休’、‘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到了82岁的老年，他在诗中还发出这样愤激的声音：‘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正是这种永不衰竭的爱国热情，使陆游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是哇，在今天重读陆游诗更觉必要。”曹天风想不到面前的这位副部长对中国古典文学如此熟悉，止不住感情激荡起来：“我喜欢他的《金错刀行》。‘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感情激昂，气概宏肆，像黄钟大吕，震撼人心！特别是最后两句：‘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仿佛写的就是抗日战争，写的就是我们这些后代。”

周恩来转面问李生翁：“李先生，你看呢？”

李生翁也很激动，他感到周恩来不仅有雄心大志，而且有文才武略。他答道：“我喜欢陆游的《书愤》，在激昂的声调中鸣响着悲枪的音弦。还有《夜泊水村》，充分体现他所特有的悲中见壮、雄而能浑的抒情风格。”

“那是因为诗人的一片丹心始终得不到报国的机会，所以他不能不常常感到压抑，感到愤慨。尤其是当他的爱国热情愈是向上升腾的时候，这种愤慨也愈是变得激扬飞越。这，也正是陆游诗歌所独具的个性特色。”周恩来说到这里，转向贺扬灵：“不知贺专员以为然否？”

贺扬灵最怕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可还得维持面子上的应对，只是含糊地答道：“周副部长知识渊博，见解独到，贺某佩服之至。”

周恩来一眼就看出了贺扬灵的心思，只是笑了笑，并不介意，转过身子，继续对曹、李二人说：“绍兴近代出的文学家，恐怕影响最大的就是鲁迅了。”

曹、李二人一齐应道：“是的！”

“鲁迅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很强的。他21岁时作的《自题小像》一诗，提出‘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他要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誓言。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他的晚年，日本反动报纸造谣说鲁迅要离开中国，不写文章，专搞翻译弄稿费了；国内的《社会新闻》等报刊也跟着瞎说，‘鲁迅已逃往日本’，‘转向’叛变了。鲁迅愤慨地说：‘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老归大泽苑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鲁迅先生尽管身染重病，仍坚守在文禁如网、特务横行、暗杀成风的上海滩，誓与敌人血战到底，‘试验一下，到底看谁要灭亡’。”

曹天风说：“鲁迅先生确实是我们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

“正是如此，鲁迅用他的笔，横扫了多少辫子军、辫子党人、反动派与反动文人、御用文人，可以说是所向披靡，海内无故。鲁迅的文格与他的人格是一致的，很幽默，也很直爽，我们要继承他的文风。”

曹、李二人应道：“嗯。”

周恩来问一直沉默无言的贺扬灵：“贺专员，你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吗？”

“浏览过，据说是根据绍兴一个名叫谢阿桂的闲人的事迹写成的，泼皮，无赖，插科，打诨，仅此而已。”贺扬灵答道。

“不，阿Q不是一个人的写真，而是‘杂取种种’中国人的精神特质而创造出来的。鲁迅自己就肯定地说过，他之所以创造出这一个阿Q形象，是

要写出‘我们国人的灵魂’。也就是‘国民性’的一面——民族劣根性。如：高攀世系而偏偏无以自活；挨人痛打而偏偏善于自慰；深信世俗之见，必是真理：女人总要偷汉子，尼姑一定姘和尚；欺软怕硬，妄自尊大……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归之于精神胜利法。”

周恩来的精辟见解，引起了贺扬灵的注意，也引起了曹天风等人的兴趣。

“其实，这种精神胜利法几乎是近代历史与现代生活中习见的。”周恩来话锋一转，继续说下去：“自从鸦止战争以来，我们这个天朝大国一直挨打受气。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割地赔款如潮泛滥，‘抵挡’这个狂潮的唯一办法，就是李鸿章的磕头外交，投降主义。即使谅山一役，中国打败了法国，李鸿章仍然在天津向法国官员磕头求饶，签订下卖国条约。这难道不是自轻自贱？一方面，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另一方面，只要外国使节进见皇帝，则必争‘称臣下跪’之礼，这岂非跟阿Q挨了别人的打，还自以为儿子打老子一样吗？到了人民大众忍无可忍起而反抗之时，却又主张‘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不正是欺软怕硬、怯强凌弱的本质的大暴露么？至于鲁迅在《论睁开了眼》一文中指出的‘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堕落后，但又日见其光荣’，在现今的社会不是很容易找到实例吗？”

贺扬灵感到脸上发烧，好像周恩来说的每一句话，针对的都是他贺某人。

曹天风等却欢呼道：“周副部长，你讲得太好了！”

“所以，我们要揭露民族的劣根性，还要挖掉这些劣根性。”周恩来对自己的议论，作了总结。

贺扬灵却极不平静，思索着如何“反击”，想了半天，才开口问道：“周副部长，听说你已加入了国民党，不知有无其事？”

周恩来明确地回答：“不，没有这回事！我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任职的。我的信心，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信心；我的力量，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如果脱离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加入国民党，有什么帮助呢？”

贺扬灵瞠目结舌，接下去的一连串反问均“胎死腹中”。

下午2时半，周恩来一行于偏门上岸，坐车至县商会。不久，电报局送来二份电报：一为重庆来电，嘱速归；一为项英来电，请速往。

4时左右，周恩来和邱南章、郑冠堂一起到战旗书店买书，并详细询问了书店的营业情况。当他看到这家书店有广大救亡青年所喜读的《青年自学丛书》，还有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和其他进步文艺书籍，他愉快地笑了。

5时，周恩来返回县商会，处理了一些文件资料。

晚7时，省党部委员顾佑民为周恩来设宴，共餐者有贺扬灵、沈涛、王以刚、许焘、朱秉钧、刘广惠、沈金相、王子余、许敏中等，至8时半散席。

散席后，周恩来同警卫员刘九洲一起，匆匆赶到姑父王子余家，与事先约好的几个青年工人见面。王子余之子、周恩来的表弟王贻甫在电灯公司当总务主

任，这几个青年工人都是周恩来托贻甫约来的，他们是大明电气公司职工顾康年、陆与可、史美钰、蒋桐生、周文元等。

周恩来一走进书房，大家便站立起来。

周恩来歉意地说：“这顿晚宴耽误了一些时间，害你们久等了。”

陆与可说：“没有关系，我们也才到不大一会儿。”实际上，他们在王

家书房中已等了一个钟头。

王贻甫给每个人作了介绍，周恩来一边说“欢迎”，一边逐个地、紧紧地和他们握手。这些公司的抄表、校表、收费、抄写等职员，平时常看老板的冷面孔，今天得到周恩来这样热情的接待，霎时暖流涌遍全身，他们都沉浸在无比的激动之中。

“坐下，请大家快坐下！”周恩来招呼着，便开始了促膝谈心。

他亲切而详尽地询问了各人担任的职务、生产情况、家庭成员及生活状况，接着对抗日救国的形势作了分析。

周恩来说：“日本军国主义代表大资产阶级，穷兵黩武，扩充军备，对外侵略，赋税日重，表面看来强大，实际内部空虚。他的侵略战线越长，军队的给养越大，日本人民的负担越重。日本人民普遍厌恶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已失去民心。恰恰相反，我们是保卫祖国，救亡图存，抵抗侵略的正义战争，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世界民主势力特别是苏联的支持。只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由于周恩来的谦和与热忱，距离消失了，拘谨感没有了，青年工人们争着向他提问。

顾康年问，“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自称非常镇定，究竟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笑着答：“事变之前，蒋介石视察东北军在西安的总部，要求东北军在转而面向日本的进攻之前摧毁共产党。他吓唬少帅张学良，如果东北军不消灭延安的红色根据地，他将命令张南下福建省，而由他本人同全国各地效忠的部队一起来完成这一任务。可是，一个晚上就发生了变化，张学良与杨虎城二位将军在12月12日拂晓举行了兵谏，官兵们包围了委员长下榻的华清池，蒋的卫士被解除武装，蒋介石从行军床上跳起……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保持镇定吗？你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史美钰问：“共产党为什么反对杀掉蒋介石？”

周恩来答：“当时，全国人民对蒋介石恨之入骨，听到抓住了蒋介石，真是大快人心，大都主张把蒋介石杀掉。国民党的亲日派想积极挑动内战，达到他们全面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他们借口讨伐张、杨，指挥两路大军逼迫西安。在这个时刻，如果杀掉蒋介石，只会让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内亲日派高兴，势必要扩大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以可乘之机……所以，我们共产党反对杀掉蒋介石，而提出了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

蒋桐生说：“但是，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却把张学良将军扣押了起来……”

周恩来说：“张将军要送蒋介石夫妇回南京，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事出猝然，已无法阻止，不无遗憾。但从总的来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周文元问：“难道你们就不怕蒋介石出尔反尔吗？”

周恩来答：“不怕。事实上，蒋介石已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也才有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号，也才有我这一次的东南之行。关于这一点，我党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而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周副部长，你讲得太深刻、太透彻了！”几个青年工人同声说。

“你们关心西安事变是对的，今后更要关心国事，勿生事，勿怕事，思

想上要有四万万同胞，切实做好本职工作，支持抗日战争。”

“是的。”

座谈结束，青年工人们希望周恩来为他们题词，周欣然允诺。

他给陆与可的题词是：“前途光明”。给周文元的题词是：“光明灿烂”。给另外数人题了“为光明而奋斗”，“光明在前”等。

由于王宅前门有特务监视，周恩来从后门送别了这几位工人。

回到屋里，王贻甫提到儿子多，决定把长子王戍（慕向）送给周恩来当义子。周恩来表示同意，并嘱咐王戍说：“你要多学些社会科学。”还给他10元钱买书。

王戍非常高兴，对警卫员刘九洲说：“周表伯收我为义子了！”

刘九洲笑着说：“你周表伯的义子可多着哩！”深夜，周恩来又握笔为曹天风、乐培文、绍兴妇女协会会长任芝英等人题词多幅。

给任芝英的题词是：“妇女解放须从民族解放中得来！”

给曹天风的题词是：

山中岁月纪春王，
颁诏何须辨鲁唐。
此日甲兵栖越纽，
相期铙吹渡钱塘。
檄传英霍军威远，
势压杭嘉士气扬。
成败区区君莫问，
中华终竟属炎黄。

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承曹先生远迎，复得聆说论，极感奋，爰录吾绍沈复生先生近作

应天风先生雅属呈留纪念

周恩来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日于绍兴城

沈复生的近作，是前天在王宅家宴时送给周恩来的，周恩来对这首诗中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民族自豪感十分赞赏，尤其是“中华终竟属炎黄”一句，更是爱不释手，特抄赠曹天风以共勉。

深夜3时，周恩来才事毕就寝。

十六 从群众大会到狭路相逢

3月31日，晨8时，周恩来起床整理行装，并分发工役及县政府特务队奖金40余元。县政府备专轮送行。

8时半，贺扬灵、顾佑民、沈涛、王以刚、曹天风等先后来送行，经王子余家至偏门下船。临别，王子余送给周恩来照片一张，是王一家1938年4月8日摄的“全家福”。到偏门码头送行的人更多，周恩来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对10多个穿着学生装的年轻政工队员亲切地嘱咐：“再见了，祝你们工作顺利！”

妇女营副营长王阿菊恋恋不舍地说：“周副部长，今日分别，不知何日再得相见？”

周恩来微笑道：“在打败日本鬼子，举国欢庆的时候。”

曹天风很有感情地说：“周副部长你虽然离开了绍兴，但你那为民族生存，为抗战胜利而日夜奔波的伟大精神；不畏征途艰险，深入敌后、前线的大无畏气概，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周恩来说：“曹先生，过奖了。望你保持高风亮节，越是困难越要珍重！”

船只启动，周恩来及其随从邱南章、刘九洲向岸上人群频频挥手……

沈县长、王书记二人，护送至诸绍接壤处谢家桥。其间，到娄宫，弃船上岸；路过兰亭，作了短暂停留。上午10时左右，与一早赶到谢家桥迎候的诸暨县枫桥区区长祝更生会合。

祝更生向周恩来鞠躬致敬，并自我介绍道：“周副部长，我是诸暨县枫桥区区长祝更生，奉诸暨县县长夏高阳派遣，专程来迎接你的。”

周恩来面带笑容，和祝更生握手，亲切地说：“辛苦你了！”

祝更生要把周恩来肩上挂的图囊拿过去背，周恩来摆手说：“不用，不用，你跑路很吃力嘛！”

枫桥区署专门为周恩来准备了一辆黄包车，祝更生请他乘坐，也被周恩来谢绝。

祝更生说：“从此地到枫桥，还有廿五里路哩！”

周恩来说：“我们坐在车上，叫别人拉着，不大好吧？我看，还是以步代车好！”说罢，便健步而行。

祝更生等人也只好跟着步行。

在路上，周恩来问祝更生：“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河南人？”

祝更生答：“我正是河南卢氏县人。”

“鲁迅文集里有篇文章，题目我记不清了，内容写的是卢氏一位教育家曹老先生，你知道吗？”

“鲁迅文章里写的曹老先生，叫曹培元，是曹靖华的父亲，我的外祖父！”

“你原来和曹靖华是亲戚？！”周恩来有点喜出望外，“曹靖华我是晓得的，是个学者，也是个翻译家，鲁迅先生十分赏识他，曹靖华译的《铁流》，是鲁迅先生写的序言。《铁流》，是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奇的一部长篇小说，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一支红军队伍的英勇斗争。那艰苦奋斗的事迹，那积极向上的基调，那理想主义的色彩，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看了这本书，也很受教育。”

祝更生听了，十分高兴。他说：“周副部长，我也是在读了这本书后，对抗日战争才有信心的。”

“抗战以来，你们诸暨地方上的情况如何？”

“诸暨的抗日进步力量比较强。去年秋天，省政府黄绍竑主席到诸暨进行农民抗日自卫武装的大检阅，于一夜之间集中了近三万人的土枪队，声势浩大，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检阅台，使盘踞在杭嘉湖地区的日寇极为震惊。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日本人怕诸暨老百姓’。”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用极为坚定的语调说：“民众发动起来了，战胜敌人就有了可靠的保证。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在人民一边。”

“周副部长说得完全对。”祝更生觉得周恩来的话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对自己大有帮助。

关于周恩来要路过枫桥去诸暨的消息，中共地下党组织前一天就知道了。宁绍特委组织部部长王志强向枫桥区地下党的区委书记周迪道布置了两项任务：一是暗中保护；二是发动群众欢迎。为此，周迪道派出了地下党员何银乔、周培贤、周奎明、周中炎、周汉夫、周浩夫、周金文、王长灿、骆维南、周锡茶、周启棠、陈剑虹等人，暗藏双响土造短枪，从绍兴——枫桥——诸暨一路上暗中监视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同时，发动枫桥地区的广大群众，聚集到三里店附近及紫阳宫到枫桥镇道路两旁欢迎。这天出动的群众组织，有文化救亡协会、农民救亡协会、店职员救亡协会、儿童团、土枪队等，人数多达二千人。人人手持红绿小旗，个个兴高采烈，情绪饱满，即使过午也没有一人离开队伍。

当周恩来等人出现在三里店，欢迎群众立即振臂高呼：

“欢迎周副部长亲临前线指导抗日工作！”

“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

“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其景热烈壮观，其声震天动地，其情感人肺腑！

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从人群中走出。祝更生上前牵着他的手，对周恩来介绍道：“周副部长，这是何燮侯何老先生，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是著名的矿冶学专家。”

“何老先生，你好！”周恩来立正，行了个鞠躬礼。“周副部长好！”何燮侯一弯腰，也回了个礼。“何老先生不住在枫桥，他今天一早跑了十多里路，专程赶来迎接周副部长的。”祝更生补充道。“那我更应该表示感谢！”周恩来说罢，又鞠一躬。

“不敢当，不敢当！”何燮侯推辞道，“周副部长，可别再折煞老朽了。”

“你是老前辈，该当的。”

“看到你，我就像看到你的祖父周殿魁云门公。”“何老先生见过我的祖父？”

“岂止见过，而且相当熟悉哩！后来他迁往淮安，我则留学日本，关于你们家和你的情况渐渐地就不清楚了。”

“我的祖籍是绍兴，在江苏淮安出生，青年时代在北方求学，主要在天津度过。”

“天津？我也呆过，你们南开中学与南开大学的校长，我都认识……”

二人侃侃而谈，真有些“他乡遇故知”的味道。紧接着，各单位和各学校的负责人也走出了人群，向周恩来致以问候，祝更生对他们逐一作了介绍。周恩来说：“我这次到绍兴等地来，主要是看看东战场抗日沿线阵地的情况，

顺便探望一下故乡亲友。我是2月16日由重庆出发的，至今快一个半月，途程已久，明日就要赶到金华转道返渝了。”

周恩来跟欢迎的代表一一握手，当他见到枫桥区地下党的区委书记周迪道与另一位负责人何志相时，更加高兴。因为他在绍兴期间，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尚未与绍兴的地下党取得联系；也从侧面了解到，绍兴党组织基础差，成效甚少。

周迪道还是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心情十分激动。他说：“报告周副主席，枫桥群众准备开大会欢迎你！”

周恩来问：“你们大概集合了多少人？”

“少说也有二三千人。”

“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嘛！”在周恩来这次东南之行的印象中，群众公然举行欢迎大会的，唯有枫桥这一次。

祝更生建议：“周副部长，是否先用过餐后，再开大会？”

“群众几千人，怎么好等一个人？我们这就直接上枫桥，直接到会场去！”说罢，又率先迈出了大步。

祝更生、何燮侯、周迪道等人连忙跟了上去。

欢迎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从三里店一直响到枫桥镇。

欢迎大会的会场设在大庙，会场的讲台是原来的戏台。一匹红布做了会幅。上书8个大字：“热烈欢迎周副部长！”会幅下是一张条桌，上面铺了蓝布罩子，摆着两只花瓶、一把热水壶和几只茶杯；讲台的两旁还有几把靠背椅。台下挤满了各种服色的群众，他们都带着长矛、钩刀、锄头、铁耙等各式各样的土武器，显示了广大群众抗日到底的坚强意志与巨大力量。

周恩来迈着矫健的步伐进入会场，登上讲台，微笑着向群众招手致意。全场顿时沸腾起来，里面的人争先恐后地往前涌，外面的人摩肩接踵地往里进，大庙广场人山人海，挤得满满登登，水泄不通。

欢迎大会由祝更生主持，由枫桥战时中学教师郭子韶与赵树屏（共产党员）担任记录。

周恩来说：“年岁不好，大家生活很苦，我来看看大家。生活苦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去年枫桥一带大旱，田里几乎没有什么收成；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是由于日寇的侵略，使我们国破家亡，苦不堪言，我们只有抗日救国，抗战到底，才能变苦为甜，才能有希望。”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恩来的话犹如化雨的春风，滋润着人们的心田。不禁引起全场强烈的反应。

接着，周恩来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述了抗战的持久性和抗战必胜的道理。

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只是区区三岛，人力、物力都极为有限，远不及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日军初来时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侵占了我们许多的城市与农村，可是它那有限的兵力，侵入越深，占地越广，兵力就越分散，力量就越薄弱。我们全国亿万军民团结一致，对它打消耗战，打游击战，打运动战，打持久战，打人民战争，坚持到底，它自必势穷，后援无济，最终将被我们彻底干净地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周恩来的讲话深入浅出，比喻生动，幽默风趣，引人入胜。

他说：“日寇侵占我国，好比不会水的人游泳。每前进一米，水就在周围淹没他一米。游到哪里，水就包围到哪里，最后终于灭顶。”

他又说：“日寇侵占我国，又好比小老鼠偷鸡蛋，蛋壳固然是给它咬破了，但它的头部却给半只蛋壳套住了，从此再也摆脱不开。它前进到哪里，蛋壳套住它的头部领先到哪里，结果只好开不得口，完蛋！”

他的比方，一再引起全场听众的笑声。

周恩来还说：“日寇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一包围，他就举起双手，乖乖投降。”说到这里，他向讲台边迈了一步，指着自己身上穿的深黄马裤、呢子军装，向台下群众说：“你们知道我身上穿的这套军装是从哪里来的吗？”

台下静了一会儿。

“这是从缴获的敌人服装中，拣了比较合身的一套拿来穿的。不要小看它，这可是日军大校以上级别才够得上穿的高级料子呢！”

台下又响起了一片笑声。

周恩来也提醒大家：“敌人虽则并不可怕，我们完全制胜有术，但在当前和今后一定阶段，整个形势和力量对比，还是敌强我弱，敌进我退；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敌人将扩大侵略，我们要枕戈待旦，提高警惕，毫不松懈地准备再准备。”

周恩来说：“消灭敌人是要有具体条件的，这就是充分发动群众。我刚才打的两个比方，那水和蛋壳就是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广土众民，潜力无限，但要把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还得发扬民主，让群众自己当家作主，自觉挑起抗日救国的重担。”

周恩来把自己这次几千里行程中所了解到的群众发动起来的若干动人事例，介绍给在场的群众，反复说明发动群众跟发扬民主互为因果的道理，使大家耳目一新。他还谈到亲临东战场前线的感受：“江南是前沿地带，敌人隔江而望，有时开炮轰击，敌机更是经常进行扫射骚扰，但农民却照常插秧，棉麻地区已在整地。这种无视敌人、蔑视敌人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种不误农时、积极生产、支援抗日的行动，值得充分地肯定与发扬！”

周恩来最后指出：“大敌当前，民族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决抗战到底，其他的路都是为人民所不许，也是行不通的。”

周恩来的讲话长达40多分钟，不时为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

欢迎大会结束时，由民教馆金馆长领呼口号：

“拥护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到底！”

“肃清危害抗日救国的封建残余势力！”

“没收汉奸财产！”

“实行耕者有其田！”

散会后，在区署休息时，周恩来向周迪道、何志相指出，有些口号提得太“左”了一些，不利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发现区署没有挂孙中山的遗像，便对祝更生说：“中山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民主革命家，你们应把他的遗像挂起来！”祝更生请他题词留念，他欣然命笔，题了“一切为了抗战”6个字；还给另一个青年题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周恩来还特约白发苍苍的紫阳小学校长斯融交谈。表扬她：“老当益壮，不知白首。这么大年纪还抗日，真是难得！”斯融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只用手指指自己的胸膛，表示她衷心倾向进步，拥护抗日斗争。

祝更生为周恩来在枫桥区署隔壁的商会中备了两桌饭，是请枫桥战时中

学厨师帮助烧的，有清汤素鸡、扣肉等本地名菜十数味。陪同进餐的有何燮侯、陈季侃（前清举人，北洋军阀时期代理过甘肃省长）、周子豪（老教育家，北洋军阀时期当过浙江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骆雨农（名霖，比利时鲁汶大学医学博士）、赵君芳（早期日本留学生，时任枫桥战时中学校长）、潘泳候（北洋军阀时期当过甘肃省某县知事）、魏奕法（枫桥商会会长）等。还有几个搞接待的人员，以及周恩来的随行副官邱南章、警卫员刘九洲。国民党的长官与随从人员是不同桌吃饭的，这使得在座的知名人士均感到惊讶与赞佩。

席间，周恩来谈笑风生，问这问那，夹叙夹议，话题广及古今中外，情绪感染了每一位就餐者。

周恩来说：“我这次从绍兴走过来的路，正是历史上有名的‘山阴道’，晋代王献之有‘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诗句。南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言语》中也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今天实地体验，方知确实如此。只可惜兰亭呆的时间太短，纯属走马看花而已。《兰亭集序》这样的书界神品，没有较充分、完整的时间研读，是不可能得其神髓的……”

接着，周恩来向在座的几位老先生打听诸暨的历史及县名的取义。

陈季侃说：“‘禹会计而诸侯毕及也’。诸者。众也；暨者，及也，故名诸暨。它曾经是春秋战国时代越国的首都。”

周恩来问：“有县志吗？”

陈季侃答：“有，是家父主编的，本来可以送给部长，只是一时来不及找，只好以后再说了。”

“提到诸暨，就会提到西施与范蠡。除了这二人外，诸暨历史上还有哪些名人？”

“元代有文学家杨维桢，元末明初有著名画家兼诗人王冕，大画家陈洪绶等。”

“枫桥大庙供奉的是什么神？”

“大庙奉祀之神原来是个性杨的猎户。这一带荒凉寂寞，野兽出没，常常伤人。杨老相公每日出猎，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但他却在一次与猛兽的搏斗中遇害。后人为了纪念他，特建了这座大庙永以奉祀。”

“凡是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这座大庙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周恩来说罢，又问：“绍兴有个柯桥，诸暨有个枫桥，比较起来，两‘桥’的市面哪个灵？”

赵君芳说：“历来有这样一句俗话：柯桥每天有一千条撑竿到埠，枫桥每天有一千条扁担上市。”

“这说明枫桥比不上柯桥？”周恩来听了微微一笑，“有道理，有道理。”

周子豪说：“周副部长，这次视察东南前线，有何观感？”

“主要观感我在大会上已讲过了，这里再作些补充。”周恩来思索一下，接着说：“我这次来东南前线发现有‘三多’。一是谣言多。邮路伸展不广，前线难得见到即期报刊，因而种种谣言不胫而走，说明宣传鼓动工作远远跟不上形势。二是单帮客多。各式商品齐备，不少是内地急需的。这种单帮客成百上千，熙来攘往，就输送物资满足后方需要来说，那是采花酿蜜，积少成多，大有好处的。他们冒着一定的风险，赚钱不易，不宜歧视。三是不三不四的人多。我这里指的是敌人和特务，成分复杂，界限不清。”

周恩来还谈了关于如何贯彻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自己曾经被蒋介石悬赏通缉过的情况，说明国共两党虽有矛盾，但须顾全大局，团结对敌。

陈季侃、潘泳候、魏奕法均表示：“一定要抗战到底，决不做汉奸顺民！”

中饭刚毕，有几个文教工作者和特地从外乡赶来的青年，不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请求周副部长指教。这样，大家就在商会的会议室坐下漫谈。祝更生泡了浓茶，并备了枫桥香榧，请周恩来尝尝当地特产的风味。周恩来吃了几颗，称赞道：“枫桥香榧，果然有名，应该在更多的地方广为种植，不要老是作为枫桥的特产。”

停顿了一下，他问：“枫桥有多少儿童入学？有多少儿童失学？”

在座的没有一个能答得出来。

祝更生不好意思地说：“很惭愧”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数字统计。”

周恩来严肃地说：“要调查一下，使失学儿童都有读书的机会。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

“关于战时教育，周副部长能否作些指示？”

“战时教育，应广为揭露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我中华民族的野心及其奸掠焚杀的暴行，激发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同仇敌汽之心，群策群力，抗战到底，并树立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将来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繁荣、昌盛的强国！”

从外乡来的几个青年请求周恩来介绍他们到延安抗大学习。他委婉地说：“你们先到西安。那里有我们的办事处，负责处理这类工作，主任宣侠父是你们的同乡，我想不难得到方便。”

周恩来于下午4时离开枫桥，晚7时到达诸暨。诸暨县县长夏高阳领着县驻军副司令、局长、科长等一大批人，迎候于东门外一里处。

“哎呀，夏县长，恩来不过是路过诸暨去往金华，你又何必兴师动众呢？”周恩来大步上前，握住了夏高阳的双手。

“周副部长光临诸暨，是我们诸暨的光荣，我们还唯恐接待不好啦！”夏高阳激动地答道。

“这是说哪里话来！”周恩来一边说，一边与其他人握手，在与所有的人打过招呼以后，又问夏高阳：“今晚去金华的火车几点钟开？”

“深夜一点钟。”

“那你就不要再安排什么欢迎仪式与座谈会了。”

“好的。考虑到周副部长沿途劳累，我只准备了一桌便宴，由我和宣铁吾军长等几个人作陪。”

“宣铁吾在诸暨吗？”

“在这里。关于周副部长晚上要到诸暨的消息，我是下午打电话通知他的。”

“这样也好，终于露面了……”

周恩来语义双关，不明底细的夏高阳当然难以领会。但跟在周恩来后面的邱南章与刘九洲却不一样，自打3月17日踏上浙江这块土地，近半月来他们无处不碰到宣铁吾设的卡子，无时不遇到宣铁吾这个阴影，早就对“宣铁吾”这三个字深恶痛绝了。一听到周恩来的话，马上相视一笑，心里想的完全一样：“冤家路窄，狭路相逢，看你宣铁吾这个老狐狸还能将尾巴藏到哪里去！我们的周副主席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可不是好惹的！”

宣铁吾昨天到达诸暨。他来诸暨的目的有二：一是他的九十一军一直驻扎在诸暨，有一些重要军务要他处理；二是他想跟周恩来较量一下，他不相信周恩来真像他的下属说的那么厉害。他本想推迟或取消黄周的会晤，没料到周恩来不避风险，竟赶到天目山，与黄绍竑会谈，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多项协议。不管他电话遥控，还是派人盯梢，软硬兼施，均不能改变这一既成事实，派去的特工科长不但没有完成自己交办的任务，反而受到了周的感化，真是岂有此理！继而，他把希望寄托在绍兴专员公署专员贺扬灵的身上，妄图给周恩来一个下马威，没想到诬蔑、造谣、刁难、阻挠均不起作用，周恩来就像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一样，舌战群儒，不仅大灭了顽固派的志气，而且大长了共产党的威风。在绍兴，周恩来祭祖茔，谒禹陵，续家谱，视察三区政工队，为许多人题字，走到哪里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到哪里……绍兴军民简直把周捧上了天，这样大的政治影响，岂是他宣铁吾始料所及的，也有悖于委员长电令的初衷，他再不出面制止，恐怕后果更不堪设想。所以，他一接到夏高阳的电话，立即表示愿意出席便宴作陪，并深怪夏高阳通报过迟，还擅自主张，在枫桥召开群众大会，为周恩来增光添彩，把文章做到了他宣铁吾的家乡！是可忍，孰不可忍？

便宴在县政府举行。夏高阳下令不接待来客，并在里里外外布置了武装警卫，其气氛与枫桥午餐的气氛大不相同。

宣铁吾进门后，脱去军帽，向周恩来行了一个礼，并叫了一声“周老师”。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周恩来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因而执师生礼。

夏高阳介绍道：“周副部长，这就是宣铁吾宣军长。”

“惕我兄，”周恩来叫着宣铁吾的表字说，“我们早就认识的，你是黄埔第一期吧？”

“是的，黄埔第一期，曾跟周老师一起东征过。”宣铁吾不带感情地应道。

“你的军队驻在这里吗？”

“不错，就在近郊。”

“我记得你父亲是个裁缝，家境并不宽裕，你曾当过学徒，做过工人。”

“周老师真是好记性。由于穷，我只读过几年书，便到杭州的印刷厂当学徒，学徒期满，做了两年排字工人。为了改变生活的困苦状况，我跑到上海，经西南护法政府上海秘密招募处的介绍，到广州入孙中山先生的陆海军大元帅府充当卫士，民国十三年被保送至黄埔军校受训。”对于这段历史，宣铁吾津津乐道，一者表明他是平民发迹，不靠牌头，靠的是个人奋斗；二者突出他是跟孙中山先生的，是正统，而不是旁系。

“惕我兄出身寒微，当对寒微之人的生活状况比较关心或同情吧？”

“那是自然。”

“惕我兄紧跟孙中山先生，想必熟悉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吧？”

“当然熟悉。”

“很好。现在抗战了，我们又走到一块儿来了，理应精诚团结才是。”

“哎……”宣铁吾一时语塞，肯定不好，否定也不好。心中暗叫道：“糟糕！”怎么初次见面，第一个回合，自己就在不知不觉中，上了对方的大当，

吃了败仗呢？

他忙转移话题：“周老师，你这次来东南前哨，行程数千里，太辛苦了！”

“还好，这一路之上，多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与欢送，还得到惕我兄的关心与照顾，搞搞社会调查，看看军心士气，颇有收获，很受鼓舞。”

周恩来似乎不经意地说来，但“还得到惕我兄的关心与照顾”一句，却使宣铁吾听了如骨鯉在喉，很不舒服。他马上反唇相讥道：“关于老师的安全，委座是有专门交待的，学生须尽全力保护。因为我们浙江，异党活动十分猖獗，磨擦时有发生，社会很不安定呐！”

“请问：贵省保安处是否常做敌情分析？”周恩来问，似乎并未察觉到宣铁吾的讥讽之意。

“常做呀！”宣铁吾眨了眨眼睛，不明白周恩来为何要如此提问。

“既然常做敌情分析，那么一定会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实施的诱降政策。”

“注意到了。”

“这个诱降政策的基本特点，就是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国民党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达到其罪恶目的。”

“其所以要这样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不反对共产党，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投降。”

宣铁吾预感到有些不妙。

“所以，我在绍兴的一次座谈会上说：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决不是异党！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者是有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投降派、反对派、顽固派！‘限制’，就是要限制这些人，而不是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

夏高阳等和他请来的陪客，都激动地说：“周副部长讲得太好了！”

宣铁吾没有说话，只在脑中闪过了一个概念：“完了！又吃了败仗！”他这才相信他的下属的汇报，周恩来确实厉害。

周恩来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入席后，又借祝酒的机会，向宣铁吾提起北伐与东征这些值得宣铁吾夸耀的往事，宣铁吾的情绪开始好起来。

“惕我兄，我知道你是抗日的，‘一二·八’淞沪之战，你们88师不是主动请缨到上海前线，和十九路军并肩血战的吗？”

“这件事，周老师也有印象？”

“不仅我有印象，全国也有印象，凡是关心中华民族的存亡并为之奋斗过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谢谢周老师。”宣铁吾至此才真正感受到周恩来的人格魅力。

周恩来趁热打铁，继续说：“抗日战争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因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高原则，一切离开或超过这个最高原则的口号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一定会教育我们的党员，严格遵守这个原则；我希

望贵党也这样做，大家都要对中华民族负责！”

宣铁吾点了点头。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国共已是第二次合作了，我们希望长期合作下去，抗日胜利之后，还要一起建设新中国。任重而道远。能不能做到，这不取决于我们，我们是有诚意的，不仅仅在口头上，而且付诸于行动。我们希望贵党也能表里如一，说到做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在于正确对待。内部矛盾只能化大为小，决不能化小为大，因为任何把矛盾扩大化的做法，都只会对日寇有利，使亲者痛仇者快。我们现在正处在从一期抗战进到二期抗战的时候。二期抗战，照蒋委员长的解释，是我们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走入反攻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为了这个大局，我们不是都应该付出更大的努力吗？惕我兄，你说呢？”

宣铁吾仍旧点了点头，他不能不佩服周恩来的才智、韬略与魄力。尽管他接受不了周恩来的观点，可也驳不倒周恩来的观点。在这场较量中，他承认，他彻底地败了。在席散告辞回军部的路上，他的耳边还回响着周恩来那犀利的话锋、平静的语调和娓娓动听的言辞，以及这三者的奇妙的结合，他在小汽车中自言自语：“周恩来，一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深夜，夏高阳带了几个警卫，送周恩来及其随从到火车站。

周恩来掏出钱，要他买三张车票。

夏高阳说：“‘花车’已经挂好，不用再买车票。”

“不行，一定要买，我们不能占铁路的便宜！”

夏高阳拗不过，给买了三张票。

周恩来又拿出15元钱，交给夏高阳说：“10元钱是付给你的招待费，5元钱是付给祝更生的午餐费，烦你转交给祝区长。”

夏高阳不肯收，“请你吃饭，怎么好要你出饭费？”

周恩来解释道：“这是我们的制度，请你不要破坏！”

夏高阳只好收下。他不禁联想到以前接待过的国民党“要员”，他们都是官架子十足，吃饭时挑三拣四，总嫌这样不好吃，那样不合口，根本不要说拿出什么饭资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有本质的不同，从生活细节和生活方式上都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汽笛长鸣，火车离站，夏高阳还久久地仁立在那里。

十七 视察浙江省铁工总厂

4月1日上午7时30分，周恩来等3人抵达金华。由省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周处长以汽车接至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住第4号房间。

女招待小方一手拎了两个热水壶进来，微笑道：“你们回来了？”

“是方小姐吗？”周恩来热情地打着招呼，“请快放下，我们自己来吧！”

“我知道，我知道，”小方一叠声地说着，将四个热水壶分别放在两张茶几之上，学着周恩来的腔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哈哈……”周恩来记起这句他十几天前说过的话，高兴地笑了，“方小姐，记忆力真好！”小方出去不大一会儿，又捧来一束鲜花，插在写字台上的一个大花瓶中。洒扫得干干净净的房间里，顿时弥漫着一股清香。

“方小姐，这是茶花么？”

“是的。”

“你上次插的是一束白李花，这次为啥挑了一束红茶花呢？”

“我希望：白色被红色代替。”

“说得好！”周恩来赞扬道，抬眼瞥见院子里扫地的是一个中年人，不禁发问：“方小姐，小杨师傅哪去了？”

“严北溟先生被召到重庆的第二天，他就被撤换了。现在，旅行社里近三分之二的人，是省保安处安排的；近三分之一的人，是省政府安排的。像我这样的‘老’招待，只有两个了。”

“嗨嗨，蛮热闹嘛！”周恩来不禁沉思起来。他在想：如何摆脱监视与盯梢，与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取得联系，尽快会见东南局与闽浙赣党的领导人。

正如小方所言，旅行社里布满了宣铁吾的特务与爪牙，尽管黄绍竑也派“兵”遣“将”，采取了相应措施，但也无法遏制他们的活动。下面，就是他们从4月1日至3日的监视记录——

4月1日上午7时30分抵金华。由抗卫团总部周处长以汽车接至旅行社。其时同至旅社者有邱南章、刘九洲，住第4号房间。9时许，周处长返罗店。11时半有着便衣者往谒，与周同午餐。该便衣人乘182号小包车（该车系交通队物）回交通银行（经查明该行并无其人）。12时15分，曾秘书往谒。40分，军训处副处长兼第一科长胡子清往谒即出。未几黄道偕其副官来见，畅谈2时余始去。3时半，胡子清偕该处第二、四科长韩冶、颜某等再来会谈，即同乘汽车至井龙殿12号军训处视察。返旅社后，即又偕邱南章步行至军人服务部，其时吴大琨、刘良模亦先后入内，约15分钟后，周、邱出，返旅行社。5时许有新四军军官黄培元、贾冠军、朱普铨、黄之雄等4人往谒（4人住公信茂旅馆，伪称司机、站员）。5时半周乘车至罗店，赴黄主席之宴。因本日黄主席亦由于潜回抵金华罗店住宅也。是晚11时周由罗店返旅社就寝。

2日上午8时，黄主席至旅行社，偕周至军管区干部教导队，训话毕，周、黄皆分乘省府1号及37号小包车出中山门过渡，正值10时，同行者为主席之副官及卫兵两名。上午12时许抵丽，下榻建设厅，旋同赴伍厅长公馆午餐。下午1时许，黄主席偕周

及伍厅长、张锡昌（伍之私人秘书，共党遂昌县委）及马弁6人，分乘两小包车行抵桃山溪口，乘轮过渡，改乘预派迎接之18号车赴大港头，略事休憩，即赴孝（小）顺铁工厂视察。晚饭后，分召该厂职员个别谈话，言辞尚无不妥。旋即就寝。

3日上午9时，该厂举行纪念周，黄、周二人演说，每人均历1时许。周言词大致为“抗战期间，浙省尚有如此铁工厂，实堪告慰”等语。午后1时许，周、伍、张乘37号车，先于2时30分抵城，当赴建厅休息。黄主席于4时半始返丽城。当周车抵建厅后，伍厅长先后介绍建厅秘书兼调整处主任陈仲明，暨电话局长兼手工业指导所长赵曾珏与周谈话，系叙述工作情况。8时许黄为主持次晨国民公约公务员宣誓大会，乘1号车至方岩。周则乘37号车于11时许返金，仍宿旅行社。

记录中的“便衣人”，实际上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光焕，他受省委书记刘英的委派，特来旅行社与周恩来接头。

周恩来高兴地问：“刘英同志来了吗？你们的会议准备得怎么样？”

汪光焕答道：“报告周副主席：刘英同志是昨天到达金华的，东南局宣传部长兼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与福建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范式人到得更早，已在金华等了三四天，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浙江省委常委、浙南特委书记龙跃、统战部副部长吴毓和刚从东南局调来准备担任省委民运部长的薛尚实也先后到金。刘英同志建议：省委工作会议与东南几省负责人会议，是不是合并在一起开？”

“考虑到敌情变化莫测以及我这几天的日程安排，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但是，一定要选择好开会的地点，既要安全，又要保密。”

“开会的地点，我们已责成金衢特委书记林一心同志选择好了。”

“在哪里？”

“在金华城内塔下寺的一间民房。”

“你去看过了没有？”

“我与刘英同志都去看过了。在塔下寺后面的山坡上，居高临下，寺内与公路上的动静都看得一清二楚，前门通寺，后门通山，房后有一片竹林，便于掩护也便于转移。寺内有我们的人，万一出事，呼应照料也方便。”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会？”

“周副主席刚到金华，旅途劳累，按理应该休息。不过，这么一来，敌保安处就有了从容应付、充分准备的时间……”

“你们的意思是速战速决，打它个措手不及？”“是的。就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只等周副主席到会。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就什么时候开。”“那好吧，我可以以拜访黄绍竑黄主席为由，将车子拐到塔下寺去。听说黄绍竑还在于潜。”这时，邱南章走进来对周恩来耳语了一阵。周恩来惊讶地问：“姓杜的，他来干什么？”邱南章答：“他说，他的胳膊全好了，上次因伤未能陪同周副部长去绍兴，不胜遗憾之至；这次他要将功补过，保护好周副部长，直到离境。”“你去告诉他，我这里有客人，没有时间见他。要见，就明天吧！”

邱南章正要出门，周恩来又叫住了他：“另外，你去找找黄道，再打听一下曾秘书、张科长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请他们马上来一趟旅行社，我们

得利用新四军的合法身份，与这些特务与爪牙周旋。关于省保安处的动向，也可以告诉省政府在旅行社的人，我们得善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好！”邱南章领命出去了。汪光焕也要告辞，却让周恩来按住双肩又坐了下来。

周恩来说：“你是我的客人，今天中午就在我这里用餐。”

汪光焕不好意思他说：“怎么好打扰周副主席？！”

“不，用餐事小，研究对策事大，你没听见邱副官说的话吗？那个省保安处姓杜的特工科长要来看我，估计这会儿还在外面哩，你此刻出去不正好跟他撞个照面？”周恩来背着手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接着说：“看来，我们得准备两套方案。一套是按预定计划，在今天黄昏时分——下午是来不及了——去塔下寺开会；另一套万一受到干扰，会议开不成，你们省委与东南几省负责人就分头来见我，至于见面的地仍点，临时再通知。”

“就照周副主席的意见办。”

中午，曾秘书来到旅行社；接着，是黄道与他的副官。周恩来先后与他们商量的会见东南局与闽浙赣党的领导人的办法。

曾秘书告诉周恩来：新四军来的人都住在江南旅行社，张金锋科长回去了，替换他的是范特务长；曾山、黄道等人来金华，也住在这家旅行社。黄道告诉周恩来，他是3月25日到金华的，同来一行13人，带有驳壳枪9枝、汽车2辆，初住永安旅社，31日与新四军曾秘书同迁至江南旅行社。“这么说来，江南旅行社等于新四军驻金华办事处？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车有车？”周恩来听了十分兴奋。

“可不是咋的？”黄道说。

“好，就这么办！”一个主意灵光一闪，在周恩来的脑海中形成，他压低嗓门，对黄道讲了好一阵子。“要得，要得。”黄道连连点头说。

下午3时半，周恩来去井龙殿12号军训处视察，出门就碰到省保安处的特工科长吊梢眉。“你的伤痊愈啦了”周恩来问。

“托周副部长的福，痊愈啦！”吊梢眉答，顺势甩了甩胳膊。

“那你就陪我到军训处去视察吧！”

“周副部长可别折煞杜某，‘视察’二字，也只有周副部长、黄主席与我们宣处座配用。”“既然如此，那我就走了！”周恩来说罢，便与军训处副处长胡子清等登车而去。

吊梢眉没料到咬文嚼字竟是这么个结果，只好讪讪地在后跟着。

周恩来看看甩不掉这个“尾巴”，视察完军训处便返回中国旅行社。

乘车目标太大，周恩来决定步行。但当他与邱南章走到军人服务部门口，墙角人影一晃，竟发现蹲着个三角眼。

“这不是省保安处的密探组长吗？原来走得比我还快！”周恩来向邱南章使了个眼色，两人一齐向墙角走过去，吓得三角眼逃掉了。

既然从军人旅行社去塔下寺不便，周恩来又重新回到中国旅行社。

第三次出门，仍坐汽车，明确告诉旅行社的人，是去罗店，“赴黄主席之宴”。不曾想车到三岔路口，正要向塔下寺方向转弯，前面开来了一辆小车，隔老远就叫道：“对面车上坐的可是周副部长？”

邱南章听出是黄绍竑副官陈亦南的声音，忙从车窗探出身子应道：“车上坐的正是周副部长，陈副官有什么事吗？”

“奉黄主席之令，特来邀请周副部长去罗店赴宴的。”

邱南章暗暗叫苦，想不到“假戏真做”了！

周恩来并不显得沮丧，反而热情地问道：“陈副官，黄主席是什么时候从于潜回来的？”

“刚到不过半小时，”陈亦南将车子开到周恩来跟前，看看四周无人，又悄悄地说：“黄主席接到情报，宣铁吾的喽罗像苍蝇一样围着旅行社转，唯恐对周副部长不利，特派我来请周副部长去罗店一叙。”

“谢谢黄主席，也谢谢陈副官。”

车到罗店，黄绍竑偕夫人蔡凤珍已在公馆门口迎候。

“果然是周先生！”蔡凤珍欢呼道，回过头去望着自己的丈夫：“怎么样，这次打赌你输了吧？”

“输了，输了，愉快地输了！”黄绍竑高兴地应道，跑步上前，与刚刚下车的周恩来握手。

“季宽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呀？”周恩来好奇地问。

“是这么回事，”黄绍竑解释道，“我刚派陈副官开车去中国旅行社接你，夫人就一口断定你已乘车来罗店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夫人便跟我打了赌。真没料到，还是被她言中了。”

“这说明嫂夫人有先见之明。”

“哪里是什么‘先见之明’，”蔡凤珍谦虚道，“而是我盼望之切呀！”

“我又何尝不希望早日见到恩来兄呢？”黄绍竑分辩道，“所以，我承认输了，而且是‘愉快地输了’。”

“感同身受，心同此理，”周恩来感激地说，“贤伉俪的盛情，恩来心领了。”

“季宽，怎么还不请周先生进屋？我可要到厨房去，烧周先生最喜欢吃的‘武昌鱼’，不，‘金华鱼’啰！”

“哎呀，怪我，怪我，请进，请进！”

晚宴的时候，周恩来概括地介绍了这几天在绍兴的活动情况，黄绍竑说：“你还没离开绍兴，我就听到了。人家说你，‘身居高位而不忘亲友故旧，日理万机而拨冗返乡扫墓，其志可嘉，其情感人’。还有人说你‘当官不像官，什么人都好接近。每天工作到深夜三点，接待了那么多人，题了那么多字’。当然，也有个别人不相信，说什么‘共产党人祭祖，扫墓，续家谱。简直是不可思议’。他妈的，这是什么话，难道共产党人就不是人生父母养，不是吃五谷杂粮的普通人吗？”黄绍竑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

“季宽，你怎么骂起人来了？”蔡凤珍知道黄绍竑骂的是谁，连忙制止道。

“凤珍，你不用劝我，我受这小子的窝囊气已非止一日了。他不仅不把我这个省主席放在眼里，还派出他的虾兵蟹将，对我们尊敬的客人恩来兄进行监视、盯梢，以‘保护安全’为名，行‘限制自由’之实，做得太差，太不像话了！”

周恩来说：“季宽兄，恐怕他也有难言之隐吧？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在位，就得谋政。何况重庆委座……”

“委座既然不同意我的辞呈，并一再慰留我，续主浙江，那么浙江的事就得多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在浙江要抗战到底，不借重贵党的力量是不行的，他姓宣的应该少插手为是。”

“只要从大局出发，有理，有利，有节，我想你们之间的矛盾，还是不

难解决的。”

“恩来兄，你不是对我办的兵工厂很有兴趣吗？明天我陪你到云和县小顺镇的铁工总厂去参观一下如何？”

“恩来求之不得。”

“好，我们一言为定。明天上午我到旅行社来接你，先去军管区干部教导队，然后取道丽水，去云和。”黄绍竑说到这里，扭过头来吩咐陈亦南：

“陈副官，你待会儿打个电话给省保安处，就说我明日陪周副部长去丽水、云和一带视察，要三四天时间，叫他们不要派人去，更不要管老子的事！”

“是。”陈亦南应道。

这天傍晚，范式人、曾山、郭潜、黄道、刘英等，都来到塔下寺后面的那间平房，等待周恩来到此，召开东南几省负责人会议。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周恩来无法抽身前往，会议没有开成。汪光焕与黄道见过周恩来，他们分别讲了第二套方案与另一个见面或开会的地点，立即散掉。

1小时后，三角眼来到这间平房，打亮打火机，发现这是一间空房。

4月2日，周恩来由黄绍竑陪同，去视察浙江省铁工总厂。

浙江省铁工厂是1938年初，以内迁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地铁工厂的设备和人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地方性兵工厂，建厂目的是解决当时地方抗日自卫团队械弹的补充需要。厂址在浙江南部山区丽（水）浦（城）公路丽（云）和（县）段的小顺、砩头、玉溪、大港头等地。该厂分第一、二、三、四厂，生产步枪、轻机枪、手榴弹。炸药以及修造通用机械等。其中，以云和县小顺的第一分厂规模最大，有职工1000余人，月产步枪1000余支。厂总管理处设在小顺镇，因此第一分厂又称浙铁总厂。

浙江省铁工厂的领导机构是董事会，黄绍竑任董事长，省建设厅长伍廷颺为副董事长，黄祝民为厂长、总负责。黄绍竑在小顺建有别墅，位置在厂东南小山岗上，与厂部隔坑相望。

周、黄等人到达云和县小顺，就住在黄绍竑的别墅里。云和、丽水两县党部的主任委员都专程赶到这里。

黄绍竑问他们：“你们来干什么？”

他们说：“金华电话通知我们，周副部长要到这里视察，我们是来欢迎的。”

黄绍竑心里发笑：“什么‘金华’，还不是省保安处宣铁吾派来的？名为‘欢迎’，实为‘监视’罢了。”他正想打发他们几句，周恩来好像看透他的心思似的，抢先说了话：“感谢二位主任委员的盛情，感谢两县的父老乡亲！”

黄绍竑暗暗赞叹道：“恩来兄，真是大度啊！”

当晚，他们就下榻在黄绍竑的别墅。4月3日上午，在黄绍竑、伍廷颺、黄祝民和张锡昌（省建设厅秘书、中共党员）的陪同下，周恩来对小顺浙铁总厂进行视察。

他们参观了车间，还查看了工人的宿舍和食堂。在食堂，周恩来见到饭桶里的黄糙米饭，他用饭勺盛起米饭凑到鼻子前闻了闻，一股刺鼻的霉气使他皱紧了眉头；再仔细一看，还发现饭中有许多砂子。周恩来当场问黄祝民厂长：“这饭，你吃过吗？”黄祝民摇摇头：“没吃过。”

“又霉，又有这么多砂子，工人怎么受得了呀？”黄祝民叫来食堂总管，训斥道：“你不知道周副部长来视察么？你是怎么搞的？”

吃得又白又胖的食堂总管，连连检讨道：“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周恩来对这场“双簧”不感兴趣，他严肃地说：“祝厂长，加强食堂管理可不是为了应付上级视察与外单位参观啊！”

黄祝民也像那食堂总管一样检讨道：“鄙人用词不当，鄙人说走了嘴。”

“工人也是人，厂方必须关心他们的生活！”“周副部长说的是，我们明天就改。”

黄绍竑插话说：“不是明天，而是从今天中午起就改。”

黄祝民马上吩咐那食堂总管：“听到了吗？从今天中午起就改过来。”

“是！”

果然，这天中午，工人们就吃到了无霉无砂的大米饭，而且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件事，也在工人中传为佳话。

接着，周恩来在全厂工人职员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大会地点在总厂礼堂（原小顺镇秦香庙内），听讲的职工列队站满台下。演讲开始前，黄绍竑先简单地介绍了几句。然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走上讲台。他身穿黄呢军装，腰束皮带，脚着黑色军皮鞋，神采飞扬地向工友们招手致意。

“工友们，同志们！我今天参观了你们的铁工总厂，感到很荣幸。在战时，在一个省，能有如此规模的铁工厂，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我们的抗战之本，胜利之本，我向你们，向黄厂长，表示敬意！”

黄祝民带头鼓掌，掌声迅速地席卷了全场。黄祝民没想到周副部长会全面看待问题，充分肯定他的成绩，刚才因黄糙米饭吃批评所引起的不快，一下子消失殆尽。

周恩来满腔热情地指出：“抗日战争依靠谁？不仅依靠你，依靠我，还要依靠他，依靠全民族的力量。只有发动千千万万农民走出村庄，千千万万工人走出工厂，千千万万学生走出课堂，到抗日的前线去，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抗战要依靠你们——工人阶级。有人说‘工’字出头就入土’，这不符合劳动创造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一种谬论。道理很简单，农民不种田，工人不做工，人类就不能生存，社会就不能进步。按我的说法，‘工’‘人’二字合起来，就是‘天’字，工人阶级是顶天立地，创造世界的，谁也没有你们工人伟大！”

全场顿时活跃起来，响起了轻微的议论声：

“嗨，这种说法我还是头一次听到，真新鲜！”

“原来我们工人并不简单，地位还蛮高嘛！”

“周副部长是共产党，我们今朝算是开了眼啦！”

“共产党把我们工人当人看，就是不错！”

周恩来挥动了一下右手，继续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主席有过一段名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讲得好！不愧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这回是省建设厅长伍廷颺带头鼓掌，立即引爆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工友们，同志们！你们从全省各地集中到这里。正是克服中国民众无组织状态的实际行动。你们没来以前，这一带草长得很高，可以藏得住老虎。你们来了以后，披荆斩棘，白手起家，办起了这样大的工厂，试制成功了轻

机枪，造出了大批武器，支援前方，打击敌人，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武器这个东西，既是杀人的工具，侵略的工具，但因为日本侵略我们，屠杀我国人民，我们手里没有它，就要被杀死，国家就要灭亡，所以，它又是自卫的工具，反侵略的工具。我们只有制造武器，并掌握武器，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你们是引擎，也是发动机。现在抗战要依靠你们；将来，抗战胜利后，建设国家也要依靠你们。你们一定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走在全国人民的前面，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全场又一次响起了狂热的掌声。

周恩来的演讲历时 1 小时，讲完以后，又看了铁工总厂的武器试验与实弹射击，方才离开，黄祝民厂长一直把他们送到了丽水。

这天晚上，黄绍竑为主持次晨国民公约公务员宣誓大会，乘 1 号车去方岩；周恩来及其随从则乘省政府的 37 号车，于 11 时许返金华。

十八 会见东南局与闽浙赣党的领导人

关于周恩来4月4日——4月6日的活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记录”如下：

4日上午6时30分，新四军范特务长，及查民愈、曹[曾]山、曾秘书、黄道在江南旅社1号房间内秘密会谈，并于门前放一步哨。9时许散会，9时35分曹[曾]山与范特务长至中国旅行社。李建及其夫人于10时至文化资料室及柴场巷《妇女战线》社召开妇女座谈会，至下午1时10分始返江南旅行社。是日上午10时50分，曾秘书携带皮包谒周，约15分钟即返江南旅行社。10时56分，自卫队教导总队队附谢家驹亦晋谒周，约1小时，由邱南章送出门外。11时零，周派少校副官廖至江南旅行社迎黄道、曹[曾]山等至社，谈约40分钟，黄仍返江南（查黄系新四军高级参谋，早于3月25日至金华，同来一行13人，带有木壳9支，汽车2辆，初住永安旅社，31日与新四军曾秘书同迁至江南旅社）。旋有住净渠头内地会教士德人男女各一，率一华籍翻译，亦至社谒周。下午2时余，周与廖步行至铁岭头军人服务部召集上海市慰劳第三战区流动剧团及台湾革命党、军人服务部工作人员，及骆耕漠、刘良模、张碧瑜等50余人训话。周先对流动剧团谓“你们不久要到皖南去工作，虽然你们是戏剧宣传工作，但不要忘记你们的中心工作，务须认真苦干，不要负了上面的期望。”次对台湾革命党谓“你们是组织外胞工作，希望努力的去做，并望从中选择基干，不要忘记你们的任务是什么。”后对军人服务部工作人员谓“你们的工作一面是宣传，一面是组织。同时你们在浙江是负有重大使命的，不要忘记你们的任务。”等语。至5时40分，周与廖始离部步行返社。4时半黄道、曹[曾]山、李建、曾秘书等7人至旅行社待周返晤，7时许黄等离社。7时40分，黄道又独自访周。文自卫队[团]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处长裘时杰，于7时30分至旅行社访周。7时45分金华政工队长徐旭等4人，亦至旅行社来访周，9时50分始退出。

5日，上午6时50分，黄道至旅行社谒周，5分钟即出。继有廖副官，手持纸包一个（此包系4日下午周、廖离铁岭头时由廖带回者），乘新四军铁篷大车至铁岭头进内，旋原车返。9时20分，有一年约20左右，着学生装、外罩黑大衣、戴近视眼镜之女子（系共党葛琴）至旅行社谒周。张郁文、孙希文、邵荃麟、骆耕漠等亦来谒，至11时10分出，返柴场巷15号《东南战线》社内。12时，周与邱南章同至江南旅社20分钟，以警报关系即偕黄道等乘新四军大卡车向金兰公路而去。至2时返旅行社。2时半，周应金华县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及战时青年读书会之邀（系金华县政工队长徐旭代表邀请），至县抗日自卫会作公开演讲（地点为金中附小）。讲题为《第二期抗战中应有之努力》。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4点。周详述第二期抗战之意义与战局演变，及我抗战以来敌人所遭受到之种种困难与外力压迫；最

后周并谓今后浙东局势或将不能如过去之平静，吾人欲克服此未来之困难，必须切实做到民众重于士兵，后方重于前方，部队重于机关，敌人后方重于安全后方，政治重于军事，精神重于物质。6点云云（参加听众达500余人）。3时半演讲完毕，即至自卫队[团]总司令部，约1小时返旅行社。20分钟后，带卫兵一名乘93号汽车出中正门过渡，向永康而去。查周下条要车时，说明“赴武义接贵小姐”，对外则称赴方岩辞行，实则至武义，下车后，步行至武义大桥即返（既无目的地，又无来人接洽），更无贵小姐接来，显系故作烟幕），仍乘原车至永康，在各旅社寻人未获。至粮食委员会鲁觉侯（周之亲戚，绍兴人）处夜膳，于10时许，由永康起行返金华，在岭下朱附近（距金华40公里）以[因]汽车抛锚，周即带卫兵步行返金，<即>至旅行社时为鱼晨4时半。查5日晚黄道等亦乘车夜出，6日晨始返金华。

6日，上午9时半，周至司令部辞行。10时偕黄道等20余人，乘新四军铁篷[篷]卡车向金兰公路赴赣。

以上“记录”，与实际情况大致差不多，但也有不少错讹与模糊之处。周恩来以高超的智慧、机动的策略与丰富的斗争经验，摆脱了监视与盯梢，会见了东南局与闽浙赣党的领导人，参加了浙江省委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这是省保安处防范的重点，也是他们意想不到的败绩。

经过了诸暨的那场“短兵相接”，宣铁吾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回到金华后，对黄绍竑与周恩来的接触，也自然地放松了监控。但当他得知共产党的一些头面人物陆续到达金华，正设法与周恩来接头时，不禁又紧张起来。一种多年来形成的职业习惯告诉他：必须先行一步，防患于未然，必要时就把那些类似共党省委书记刘英的嫌疑犯都抓起来，委座不是说过吗？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

然而，黄绍竑坚决反对抓人。在4日上午主持了国民公约公务员宣誓大会后，他明确告诉宣铁吾：“周恩来不几天就要离开浙江，在这几天内，你可要告诫你的部下，不得无事生非，不可随便抓人！”

“难道对违害社会、蛊惑人心的共党分子也不管吗？”宣铁吾颇为不满地反问。

“我只知道，落实委座来电压倒一切。委座要求‘热忱欢迎，保障安全’，我们可要善始善终啊！”黄绍竑避实就虚，回答得十分巧妙。

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徐旨乾插话：“我说宣处长，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人家周恩来就是最大的共产党，你在金华抓小共党。岂不是杀鸡给猴看，还谈什么‘热忱欢迎’？如果共党真闹起来，把浙江搅成一锅粥，就更谈不上‘保障安全’了！”

徐旨乾是直性子，讲话不注意修辞，过去对宣铁吾多有得罪，宣铁吾对他十分反感，立即反攻道：“照徐参谋长的意思，委座亲手颁布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也是错误的，根本不需要实行啰？”

“我没有这样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徐旨乾马上严正声明，“黄主席与诸位长官，可以证明！”

省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参谋长张绍棠打圆场道：“算了，算了，宣处长

你真要抓人，就等周恩来离开浙江返回重庆后，再抓吧！”

“……”宣铁吾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有些后悔，不该来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什么“重要会议”？“国民公约公务员宣誓”，有你黄绍竑一个省长就够了，可今天却把全浙江党、政、军的要员都请来了，这么大的声势，这么大的排场，用得着吗？会不会是他黄某人撒的烟幕弹？他大前天晚上不是叫他的手下人给我打电话，说他要陪周恩来去丽水、云和一带视察三四天么？怎么两天就回方岩了？他来了姓周的却没来，准是去了金华……哎呀，不好，我上了黄绍竑的当了！他这是调虎离山，为了周恩来活动方便，故意这样做的！

想到这里，宣铁吾提起皮包就往外跑。

张绍棠一把抓住宣的胳膊，惊讶地问：“宣处长，你要到哪里去？”

“去金华，有重要的公务要办。”

“马上就要开宴了，你还是吃了饭再走吧！”

“不，事情紧急，我一刻也不能停留。”

“黄主席在跟省党部方书记长谈话，你是否等一等，向黄主席打个招呼？”

“来不及了，就请张参谋长代劳，给我向黄主席讲一下吧！”

宣铁吾跳上自己的专车，便向金华奔去。尽管他心急火燎，紧撵快赶，还是慢了一步。到达金华已是下午2时。他顾不上吃饭，也顾不上喝水，找来部下，就要他们汇报。

三角眼说：“上午6时30分，发现新四军范特务长、查民愈、曹山、曾秘书与黄道，在江南旅行社1号房间内秘密会谈，并于门外放一步哨。直到9时许，方才散会。”“这批人中，有没有周恩来？”这是宣铁吾最关心的事。

“没有。”

“黄道的身份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他是新四军高级参谋，上月25日到金华的。”

“曹山呢？”

“他到金华没几天，好像也是新四军的什么参谋。”

“不能‘好象……什么……’干我们这一行的，必须百分之百的准确才行。”

“是，我马上布置人去查。”

“有个重要的共党分子叫曾山，是他们东南局的负责人，这个曹山是不是曾山？你们要重点搞清楚！”

“是！”

吊梢眉说：“这个曹山与范特务长，在9时35分去过中国旅行社。”

“那他们一定见到周恩来了？”宣铁吾不禁有点兴奋。

“见到了。”

“谈些什么？”

“不知道。”

“唉——”宣铁吾掩盖不住自己的失望。“10时50分，新四军曾秘书带了个皮包来看周恩来，呆了一小时，才由邱南章送出门外。”

“还有什么情况？”

“11时零几分，周恩来派省政府的廖副官到江南旅行社迎黄道、曹山过

来，谈了 40 分钟左右，才送他们二人回去。”

“现在，周恩来在干什么？”

“他刚刚与廖副官一起步行到铁岭头军人服务部去了。”

“看来，我们确实晚了一步……”

“没有晚，我已派了两个弟兄，跟踪到铁岭头！”

“你懂个屁！”宣铁吾把一腔火气发在特工科长的头上，“新四军来往穿梭，说不定中间就有共产党东南局与浙江省委的人，他们化整为零，早接上头了，你们还蒙在鼓里呢！”

三角眼走上来为吊梢眉说情：“报告处座，卑职与杜科长分头把守两座旅行社，确实不曾发现共党省委书记刘英……”

“我说前一段你们为啥老是失败呢？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你们不动脑筋！难道刘英会把他的名字写在脸上吗？他来去活动就不会化妆什么的？要知道：我们对付的不是一般的强盗、土匪，而是深得人心、相当高明、最会做工作又极富牺牲精神的共产党！”宣铁吾对着三角眼，又对着吊梢眉大声训斥起来。

“处座，难道我们就不能抓几个嫌疑犯吗？”待宣铁吾的训斥告一段落，三角眼怯生生地问。

“是呀，委座不是讲过：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吊梢眉也附和道。

“能够抓人，我还要你们汇报做啥？”宣铁吾又激愤起来，“都是他娘的黄绍竑反对，还有老不死的徐旨乾，笑面虎张绍棠，反倒拿老头子的来电压我……”

两位部下有些不知所云，面面相觑。

宣铁吾见状，知道自己说走了嘴，连忙煞车换道，向二人下令道：“人不是不能抓，而是要等到周恩来离开浙江之后。谁亲共，谁捣乱，一总算账，决不轻饶！而这两天，你们要严密监视周恩来的一举一动，竭力破坏他跟共产党人的联络，一旦发现共党浙江省委集会，立即向我报告！”

“是！”三角眼与吊梢眉同时答道。

宣铁吾的分析是对的，刘英确实善于化妆，他这次化装的不是商人，而是留美髯、戴花镜的中医医生。他于 3 日晚上以“往诊”为名，被黄道用车请到江南旅行社，并在那里等候周副主席。同一晚上到达该旅行社的，还有江西省委书记郭潜、福建省委组织部长范式人，这二人是浙江国民党特工人员不熟悉的，误以为是黄道的随从，因此连姓名也不见于“监视记录”。至于东南局副书记曾山，早几天前来金华时便住在这里了。

但是，宣铁吾并没有料到：周恩来 3 日晚 11 时许返金，4 日一早就到了江南旅行社，实现了渴望已久的与东南局及闽浙赣党的领导人的会见。在分别听取了各自的工作汇报后，周恩来作了简要的讲话。他概括地介绍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基本内容，号召三省的共产党员要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着重讲了“团结全民族和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扩大共产党和防止奸细混入”、“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等几个问题。由于这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安排，他于 9 时离开江南旅行社回到中国旅行社。下午 6 时至 7 时，他又对应召来中国旅行社的黄道、曾山、郭潜、范式人、李

建、曾秘书等7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与补充。特别强调要对国民党做好两手准备，要争取合法地位推动抗战，不要给国民党以制造磨擦的口实。

4月5日，气氛格外紧张。浙江省委工作会议决定在江南旅行社召开。之所以选择这个地址，一方面是因为新四军的骨干多住在这个地方，便于掩护；另一方面，该社与中国旅行社都在火车站附近，距离比较近，便于周恩来活动。为了保证这次会议顺利召开，一早起，黄道与浙江省委文委的同志都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尤其是省政府的廖副官，拿着个4日下午从铁岭头带回来的纸包，从中国旅行社走到江南旅行社，又从江南旅行社乘新四军铁篷大车到铁岭头，以后又从铁岭头乘原车返回，引起了吊梢眉与三角眼的共同注意，把他们及他们的爪牙牵得团团转，因而放松了对江南旅行社的监视，与会人员便乘虚而入，与一直留在江南旅行社的刘英聚齐。紧接着，葛琴去中国旅行社看望周恩来，张郁文，孙希文、邵荃麟，骆耕漠等走马灯似地拜谒周恩来，使布置在中国旅行社的特工人员掉以轻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将近中午，周恩来与邱南章突然到了江南旅行社。他们不走正门而走侧门，进入了里进靠右面的一个房间，随手便把房门关上了。

这是一间统铺客房，早来的人都坐在床上。看见周恩来进来，连忙伸脚找鞋争着下床。

“同志们，用不着挪动位置，还是坐在床上吧！时间宝贵，我们要赶紧开会，不必来什么客套了。”周恩来一挥手，制止住了大家，自己也拉过来一条长凳坐下。

“好，照周副主席的意思办！”坐在正中间的一个“中医”说，首先把腿盘了起来，其余的人有学他的样的，也有不会盘腿索性靠在墙上的。“中医”正是省委书记刘英，其余四人则是省委常委汪光焕，省委常委、浙南特委书记龙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省委民运部长薛尚实。

“刘英同志，人都到齐了吗？”周恩来问。

“到齐了。”刘英答。

“好，那么我们开会吧！”周恩来也不讲什么繁文缛节，站起来便直奔主题：“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我先作一发言，发言完了大家再提问题，我尽可能地做些解答。至于浙江省委下一步的工作如何安排，则在这次会后你们再找时间研究决定。”

邱南章给周恩来泡了一杯茶，又给浙江省委其他领导人的茶杯里续上水，便离开房间，来到廊檐下，那边早就安排了一个步哨。

邱南章有些激动。他原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少校科长，今年2月16日，当周恩来随带警卫员刘九洲，偕同新四军军长叶挺，由重庆乘飞机到达桂林时，才被办事处派遣做周恩来的随行副官的。49天的朝夕相处，几千公里的旅途同行，使他对这位自己早就仰慕的副主席有了深入、细致的了解。那高尚的道德情操，那忘我的奋斗精神，那宽阔的度量胸怀，那朴实的生活作风，那机敏的应变能力，那丰富的斗争经验……都给他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他暗暗对自己说：“邱南章啊邱南章，你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你办事就要办这样的事！为了周副主席的安全，牺牲生命也是值得的！”

正当邱南章浮想联翩之时，保安处密探组长回到了江南旅行社门口。

他问隐蔽的两个密探：“刚才有人进去吗？”

密探乙打了个哈欠，说：“没有，没有呀！”

密探甲报告道：“我监视的正门没人进，侧门倒是进去过好几个人。”

“有没有周恩来？”

“周恩来与他的副官来过，是不是从侧门进去了，我不敢肯定。”

“那是什么时候？”

“大约半小时以前。”

三角眼走上前，对着失职者的脸，重重地扇了两个耳光，大骂道：“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不来报告，你小于是不是想通共？”

密探乙捂着红肿的脸，求饶道：“请组长大人宽恕！”

“你干吗还站着，还不给我冲进去！”三角眼命令道，并指着密探甲，“还有你，也一起冲进去，看看有没有周恩来？看看他们是不是在开会？如果有周恩来并且在开会，立即向处座报告！”

“是！”

两个特工正要行动，蓦地响起了空袭警报，一队日本飞机出现在东北天边，正迅速地朝金华城里飞来，行人慌忙奔走，街上一片混乱。

就在这时，从江南旅行社里走出七八个人来，登上随即而至的新四军军车，便向郊外开去。“周恩来，‘我看见周恩来了！’密探乙大声叫道。“他们肯定是在开会，怎么样？现在就给处座打电话吗？”密探甲向三角眼请示。

“不，我们先跟上去，查清他们的去向，然后再报告。”三角眼说着，率先向停在马路对面的一辆吉普车跑去。

密探乙与密探甲紧跟着横穿马路。

恰在此刻，有一架日机飞临头顶，扔下了一枚炸弹。“轰！”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响，他们三人都扑倒在地上，头上身上都盖满了厚厚的尘土。

“那辆新四军的军车呢？”三角眼使劲探出身来，仓皇四顾，连个轱辘的影子也没有。

“早开走了。”密探乙掸掉灰尘，站起来答道。

“我是问你，它朝哪个方向开去的？”三角眼没好气地咆哮着。

“日机轰炸，我没有……没有看清楚。”密探乙胆怯地嗫嚅道。

“好像是兰溪方向。”密探甲的回答也不够坚决。

“不能‘好像……什么……’干我们这一行的，必须百分之百的准确才行！”三角眼昨天受过宣铁吾的训斥，他马上摹仿宣铁吾的腔调再训斥他的属下。

“是，我马上去弄清楚。”

“等一下，让我先去挂个电话。”三角眼只好把这不准确的情报向宣铁吾去报告，心想又少不了一顿勉了。果然，宣铁吾听了汇报很不满意，在电话中狠狠地剋了他一通，最后命令道：“迅速给我跟上去，哪怕开到兰溪、永康，也要查到他们的下落！我叫杜科长配合你。”

然而，等到三角眼等人驱车上路，找遍了金兰公路、金永公路，哪里有周恩来一伙人的影子？！

实际上，周恩来等人并没有走远，就在通往兰溪方向的一个树林里继续开会。大家席地而坐，听周恩来讲话。周恩来精神抖擞地站着，双目炯炯有神，不时向四周扫视，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人在偷听。……直到警报解除，下午2时许，周恩来等方乘那辆军车回到江南旅行社。等三角眼的密探组赶回时，周恩来与邱南章已返中国旅行社，并应邀去金中附小演讲去为此疏漏，宣铁吾大为恼怒，他下死命令给三角眼与吊梢眉：“一定要盯牢周恩来，再

要被周恩来甩掉，就按处规自裁。”吓得他二人出了一身冷汗。在周恩来一个小时的演讲过程中，一步也不敢离开，连小便也憋着。

3 时半，周恩来离开金中附小，去省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他们也跟着去总司令部。4 时半，周恩来返中国旅行社，他们也跟着到中国旅行社。20 分钟后，周恩来带着警卫员刘九洲到门口乘车，声称“赴方岩辞行”，吊梢眉立即查阅周恩来的要车条，上写“赴武义接贵小姐”，不禁产生了怀疑。

他想：共产党惯于声东击西，“赴方岩辞行”是假，“接贵小姐”是真，说不定这“贵小姐”就是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甚至比刘英还要大的东南局书记。我可要跟牢、盯死，只待周恩来一转身，便将“贵小姐”捉拿归案。即使有违“不能抓人”的指令，处座也会高兴的。昨天他不是无意中泄露了秘密，所谓“不能抓人”，是黄绍竑、徐旨乾等人的意见，宣处座本人是反对的。这可是一个立功、升官的机会啊！

吊梢眉立即跳上大门口的一辆小包车，跟着周恩来乘坐的 93 号汽车，出中正门过渡，向永康方向开去。果然不出他之所料，前车开了不久，便放弃方岩，直奔武义。他便也跟到了武义。由于前段时间他同周恩来有过接触，了解周恩来的机敏、坚毅与嫉恶如仇，他不敢与周恩来正面相遇，只是跟在后面，并保持相当的距离。

然而，大大地出乎他意料之外，周恩来到武义下车后，步行至武义大桥即返，既无目的地，又无来人接洽，更无“贵小姐”接来，纯属施放烟幕而已！吊梢眉空欢喜了一场。

待周恩来乘原车至永康，在各旅社寻人未获，又去拜访亲戚、粮食委员会的鲁觉侯时，吊梢眉已心如死灰，毫无兴趣了。

吊梢眉做梦也不会想到，他跟踪了几个小时的目标，并非周恩来本人，而是周在黄道手下找来的一个替身，身材、轮廓都肖似周，如不近看很难找出他与周的差别。周恩来本人并未离开金华，而是在特工们跟踪出城后，由黄道等接至江南旅行社，继续讲话并解答大家的提问，开完了浙江省委工作会议。当晚，乘黄道的大卡车，与黄道一起到永康，在一家早就约定好的旅社里换下替身，才去拜访鲁觉侯的。不巧的是，鲁觉侯因采办粮食去上饶出差未归，又没有见到，而由省粮食调配委员会主任朱惠清接待。过了几天，周恩来到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公署所在地的江西上饶，第三次打听鲁觉侯的行踪，由于鲁觉侯下乡办粮食去了，仍未晤见。周恩来便手写字条一张，内容如下：

我是懋臣公的儿子，曾两次拜访，均未得见。今后希多联系。
我的通讯地址是重庆

翔宇
民国二十八年四月 日

这张字条托在上饶长官公署接洽运粮车辆的绍兴粮商子余先生的内侄陶康侯转交。周恩来三次专访祖母的亲属，至诚之情，深刻地留在浙江人民的记忆之中，一直传为美谈，此是后话。

在浙江省委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前后共讲了三四个小时。他的声音清晰、有力，浙江省委的同志都听得十分用心，并做了笔记。

周恩来分析了全国和浙江的抗战形势。他说：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

目前中国的抗战，已从敌人的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开始过渡到敌我相持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将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一个阶段。他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对沦陷区人民实行怀柔政策，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对我国实行全面侵略，企图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灭亡中国的罪恶行径，指明我们党的任务是——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反对投降，打击国民党内的汉奸和亲日派，增强抗战力量，阻止敌人进攻，准备反攻，收复失地。在争取国民党长期抗战、与我长期合作中，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保持党在政治上对国民党批评的自由，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谈到浙江的抗日形势时，周恩来指出：浙江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处于辅助地位；在抗战的第二阶段，其地位将要重要起来。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复兴社和C·C系、军统和中统的力量都比较强，从上到下都有一整套组织。浙江文化水平高，国民党统治的手段也比较“高明”，这是浙江统治阶级的一个特点。目前浙江统治阶级内部党政军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复兴社、C·C系与桂系黄绍竑的矛盾。黄绍竑原来是桂系集团的主要人物之一，后来又依附蒋介石，是对这两方面都有关系的人物，他与政学系也有关系。蒋介石用黄绍竑当浙江省政府主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分化拉拢桂系集团。浙江的实权掌握在蒋介石手里，黄绍竑要发展是很难的。上海战役以后，张发奎的集团军曾驻在浙西一带，黄绍竑以为是个机会，便利用抗战的有利形势，依靠张发奎的势力，在浙江发展自己的实力。首先是搞国民抗敌自卫团，建立了6个支队，后又扩编为4个纵队，等于4个师的兵力，黄绍竑自兼总司令，下面的纵队、支队司令如黄权等人都是广西人。第二是搞军火生产，在云和的小顺及大港头等地建立兵工厂，生产一些轻武器和弹药，装备部队。第三是吸收知识青年，在每个县建立政治工作队。这是黄绍竑的三个宝。复兴社和C·C系极力阻止黄绍竑势力的发展，他们的矛盾越来越大。我这次专程到西天目山，与黄绍竑会谈，就是利用矛盾，支持黄绍竑的抗日爱国行动，扩大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接着，周恩来介绍了他与黄绍竑会谈的内容，以及达成的协议，说明“一分为二地看待黄绍竑，充分利用他的积极面，努力限制他的消极面，是有利于大局，有利于抗战的”。同时，周恩来也指出：黄绍竑要在浙江独树一帜，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他的这些力量，最后必将为蒋介石搞掉。在风云突变，反共反人民的势力占上风的时候，黄绍竑也会发生动摇。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分析是对的，1940年，蒋介石派俞济时来浙江，把抗敌自卫团4个纵队改为4个师收编过去了。兵工厂则以“收归中央办理”的名义，逼使黄绍竑交出。与此同时，各县的政治工作队也被保安处长宣铁吾以“整肃”的名义予以解除。在政工队的一些共产党员与进步青年，除少数转入地下活动外，大部分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

在谈到浙江党的工作时，周恩来说：浙江党的组织经过了1938年的大发展，今后要加强巩固工作。虽然也要继续发展，但巩固必须重于发展，质量必须重于数量，对来历不明、政治面目不清的党员要进行审查，严防国民党特务和汉奸混入党的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培养干部，特别要培养军事干部，派他们到沦陷区去工作。

周恩来还专门提到：绍兴党组织基础差，成效甚少，要加强绍兴党的力

量，尽快开展绍兴工作。一个月后，浙江省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先后派了50余名党员骨干去绍兴，成立了中共绍兴县工委，为宁绍地区沦陷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周恩来讲完话以后，大家提了几个问题，周恩来一一作了解答。如有人问：“可否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周恩来答复道：“蒋介石视军队如性命，最怕我们在他的军队里发展党员，为了团结蒋共同抗日，我们向他讲明了不在他的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但我们可以用交朋友的方式去进行工作。过去‘左’倾路线时的兵运工作是要兵不要官，作用不大。现在要着重做军官的工作，同他们广交朋友。争取了一个‘判官’，胜过一百个‘小鬼’。这样，作用就大了。”

参加会议的同志绝大多数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第一次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心情都特别激动。会后，他们根据各自的笔记，综合整理了一个专门材料，发给各特委领导干部学习，同时作出了《关于（学习贯彻）周恩来同志指示的决定》。在7月下旬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在一系列决定和文件中，都可以看到周恩来指示的闪光。

十九 “前进吧，浙江！”

在金华的最后几天，周恩来除了会见东南局与闽浙赣党的领导人，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外，还找在金华搞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部分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谈话，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抗日救国的大业，真正是“惜时如金”，废寝忘食啊！

被周恩来约见的文化界共产党员，有浙江省委文委书记、《东南战线》主编骆耕漠，省委文委委员、《东南战线》副主编邵荃麟，省委文委委员、《东南战线》编辑葛琴，中共党员、《东南战线》编辑杜麦青，金衢特委青年部长兼金华县委书记、《浙江潮》编辑翟毅，共产党员、《青年团结》周刊主编匡辛芜等。周恩来详细地了解了各刊物、杂志社的人员、编辑内容、销售、经费等情况，询问了他们和读者的联系、读者的反映以及社会效果等。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对如何办好报刊，谈了几条重要的意见。

他说：“无论办报纸，还是办刊物，都要十分重视和读者的联系，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吸引群众和我们一起办报刊。离开群众，将寸步难行！”

周恩来对某些“左”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报刊的宣传要避免对国民党的不必要的刺激，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拿起一本《青年团结》杂志，说：“封面设计用红五角星，国民党见了不舒服，我们没必要这样做。我还看到过上海出版的《中国的新生》，刊登了史沫特莱写的《西安事变》一文，这是使国民党很感头痛的。该文还披露了蒋介石的惶恐不安，这就更没有必要了。”

周恩来具体指示：在《东南战线》、《浙江潮》等刊物的宣传工作上，不要搞得太“红”，要讲究斗争策略，隐蔽一点。他翻开一本《东南战线》，指着其中转载《新华日报》的一篇短文——《周恩来的小副官》，说：“这就不够策略。”又指着另一篇专稿《项英将军》，批评道：“这就更不策略了，应该‘内外有别’。”

周恩来问翟毅：“你们这家杂志，为什么取名叫《浙江潮》？”

翟毅答：“浙江潮就是钱江潮。钱塘江大潮乃天下奇观，早在宋代，便有‘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的说法。当它来时，‘远若素练横江，声如金鼓；近则亘如山岳，奋如雷霆’，刹那间，波涛千顷，万马奔腾，真有‘涛来势转雄，猎猎驾长风。雷霆云霓里，山飞霸雪中’的壮丽气势。我们的杂志取名，就暗含着摧枯拉朽，迎接革命高潮到来之义。”

这种象征取义，是不错的。可是，‘潮来溅雪欲浮天，潮去奔雷又寂然。’潮来潮去，是有一定规律的。早在东汉时代，生长在钱塘江南岸上虞县的哲学家王充就在《论衡》中指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没有太阳、月亮的引力，潮就不会形成；不到八月十八这天，潮也不会如此壮观。革命高潮的到来，更需要一个酝酿、积蓄、等待的过程。时机未到，决不能好大喜功，盲目冒进；更不能虚张声势，大轰大嗡。”

“周副主席，你讲得太形象、太深刻了！”

“关于钱江潮的奇观，我是从历代文人学士的诗文中领略到的。年轻时读西汉文学家枚乘的《七发》，对曲江潮的描写十分神往。‘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澄澄，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像这些精彩段落，我都会背诵。有人考证，‘曲江’是江苏扬州西南的长江；有人则认为，‘曲江’就是浙江的钱塘江。我个人的看法，偏向于后一种。至于晋代大画家顾恺之观赏钱江潮后作的《观潮赋》，北宋诗人苏东坡写的诗《八月十五日看潮》，印象更深。特别是苏东坡的诗，‘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体上钥，夜潮

留向月中看。’诗人白天看了江潮还嫌不足，竟寄语天上重门不要上锁，好让他到月宫上去看钱塘江的夜潮，这真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了，足见钱江潮的雄奇魅力。”

“周副主席的文学知识，相当丰富哇！”

“哪里的话，我只不过对祖籍浙江的一切，更加关心罢了。说来惭愧，我虽然读了那么多关于钱江潮的诗文，可还没有到实地去观察过一次钱江潮哩！”

“观潮的最佳所在，莫过于海宁盐官。那里有清雍正八年至九年奉把建成的海神庙，有明万历四十年建成的占鳌塔，还有观海台、观潮亭，以及宽敞、雄伟的海塘……可惜现在都沦陷了，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翟毅说着，说着，不禁叹息起来。

“没有关系，翟毅同志，我们会收复失地的。”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也许五年，也许六年，我们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再过四年或五年，我们将建成民主、自由、共和的新国家。到那个时候的八月十八，让我们携手同游海宁盐官，欣赏这举世无双的钱塘大潮吧！”

“好，周副主席，一言为定，我就等着这一天啦！”

“不，不是‘等着’，而是用战斗去迎接！”

“对，用战斗，用行动去迎接！”

听说上海市慰劳第三战区流动剧团及台湾革命党，都住在铁岭头军人服务部，周恩来立即赶到那里，和大家见面。他们还未进门，便听到嘹亮的歌声：

新的女性是觉醒的劳苦大众，
新的女性在斗争中挺起胸，
冲破牢笼，
要砸碎千年的枷锁，
争取解放，
赢得妇女的新生。

.....

原来刘良模率领的青年军人服务部歌咏队正在练歌。看到周恩来进门，立即欢呼道：“周副主席，你从云和回来啦？”

“回来了。”周恩来应答着，发现队伍开始散乱，立即制止道：“咦，你们怎么不练了？这支《新的女性》，我听听，唱得不错嘛！”

刘良模说：“这支歌，我们已经练了三遍。如果再唱，是不是换一支？就请周副主席指挥！”他掉头问队员们：“大家说好不好？”

“好！”回答响亮而又整齐。

“唱什么歌呢？”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要不，就唱《义勇军进行曲》”

吧！”他两手高举，再向下一沉，歌声便飞翔起来：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

.....

歌声惊动了在屋子里的流动剧团与台湾青年，他们纷纷跑到院子里，跟着一起合唱：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
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
进！

歌声停歇，接着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刘良模立即将流动剧团与台湾革命党的青年介绍给周恩来。

“同志们好！”周恩来跟他们一一握手。“周副部长好！”流动剧团与台湾青年都激动地说。

流动剧团的领队吴大琨提议道：“请周副部长给我们讲话，大家欢迎！”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站在院子的中央，大声说：“青年同志们，正如《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唱的那样，我们的中华民族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要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我们求生路，便只有抗战，便只有坚持抗战到底。青年在这时代所占的地位，是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你们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救国，建国，我想用‘任重道远’这四个字，加在你们身上是非常恰当的。”

接着，周恩来对流动剧团说：“你们不久要到皖南去工作，虽然你们是戏剧宣传工作，但不要忘记你们的中心工作，务须认真苦干，不要辜负了上面的期望。”

他对台湾革命党说：“你们是组织外胞工作，意义重大，一定要广泛联系，热情耐心，并从中选择基干，巩固并扩大已取得的成果。”

他对军人服务部工作人员说：“你们的工作，是一面宣传，一面组织，二者不可偏废，要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要忘记你们在浙江的重大使命。”

周恩来还讲了其他一些问题，听众们无不点头受命。

4月5日，金华战时青年读书会邀请周恩来给该会会员作报告，尽管这天他要参加浙江省委工作会议，还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金华战时青年读书会是金华县委领导下的一个外围群众组织，由县委青

年部长杜麦青负责，平时的任务就是组织青年学习进步书刊，讨论进步书刊，联系抗战的实际，提高思想觉悟。原来C·C系在金华办了个“励志社”，专以笼络、腐蚀青年为能事，名声一直不好。自从战时青年读书会办起来以后，“励志社”的消极影响受到了抵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大大增强，C·C系怎能不怀恨在心？

金华县长谭计全是读书会的挂名会长，平时不大管读书会的事，听到这个消息，特别显得积极。他主观决定，把听众从读书会会员扩大到金华青年和各界代表人士，并亲自前往中国旅行社谒见周恩来。

“周副部长，我应该叫你老师。”谭计全在自我介绍后，笑呵呵地说。

“怎么，你也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吗？”周恩来不无惊讶地问。

“不错，第二期，后来一直在黄绍竑黄省长部下效力。”

“那么，你也是主战派了？”

“不敢当，愿为抗日救国殚精竭虑，肝脑涂地。所以，特来恭请周老师，去给我县青年及各界人士作一次报告。”“会场设在哪里？”

“在金中附小，那里场面大，又有层次，可以容纳得下好几百人。我已经布置好了，绝对保证周老师的人身安全。”

“时间？”

“下午两点。”

“两点半吧，我准时到会就是，你不必再来接了。”

“好。”

报告会的通知发出，群众闻讯十分高兴，奔走相告，踊跃参加。省党部书记长方青儒听了，却气得胡子直翘。

“这个咒不死的谭计全，怎么去舔共产党的腩沟，拍共产党的马屁？”他倒背手在房中来回走了两趟，突然停下来，问他的秘书。

“还不是黄绍竑的意思，他与周恩来拉拉扯扯，他的部下怎不争相效尤？”秘书答道。

“周恩来这次来浙江，我一直不想见他，就是想遏制一下他的政治影响。没料到他一到金华，就直奔西天目山，搞什么‘黄周会晤’，勾勾搭搭；又到绍兴扫墓、祭祖，到处题词，沽名钓誉……真是出尽了风头，赚够了资本，反倒衬出我没有涵养，小家子气“书记长，你老心地仁慈，把人家想得太好了……”

“怎么，我刚才讲的话不对么？”

“书记长，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那都是周恩来的策略。你老不是常教导我说，共产党就会搞统战吗？”

“对，对，对，你不提起，我倒忘了，是统战策略，是收买人心！这最后两天，可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你给我传下话去，告诉“励志社”，告诉所有C·C系的人，一律不得参加周恩来的报告会！”

“是。”

然而，尽管如此，还是禁不住，还是来了一批人，如他们的文化建设委员会的一些摇笔杆的秀才。

金中附小的校址，原来是由一个祠堂或庙宇略加修建而成。面积比较大，梯形，建筑分三个层次，报告会会场是在高处第三层的大教室内，可挤坐近百人。室外有片狭长空地，砌有一道砖石栅栏，席地坐满了人，还有坐在下一层台阶上听的。总计听众达五百余人。

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真有点“春和景明”的气象。周恩来在讲台上作报告，谭计全一直恭敬地立在讲桌的左后侧，目光平视，挺胸、收腹，标准、规范得像一座雕像。看他脸上的表情，庄严、肃穆，说他是一尊护法神，也未尝不可。

当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到，最近召开的衡山会议是“蒋委员长”亲自出席主持时，刚刚“稍息”的谭计全，立刻按照国民党党规，把皮鞋鞋后脚跟一合，随着“卡”的一声，打了个“立正”。有些听众突然听到这个怪声，看到谭计全的怪相，几乎要笑出声来。前排的一位女士，就张口“嘻”了一下，但当她抬头接触到谭计全那嗔怒的目光时，又连忙忍俊住了。

周恩来注意到这个情况，随后的报告中就不提“蒋委员长”，免得这位黄埔老学生再烦神紧张。

周恩来整个报告中的内容，都紧紧地扣住了它的题目——《第二期抗战中应有之努力》。

一个“励志社”的成员说：“早知报告这么精彩，我们那些兄弟都应该来听听的。我这是偏得了！”

另一个文化建设委员会的笔杆子说：“周副部长讲的就是有道理，共产党人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比较起来，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应该感到羞愧还有一个C·C分子说：“方书记长为什么不准我们来听报告？我现在知道了原因。”

由于场地的限制，还有许多青年挤不进去，便站在门外路边，等了一个钟头，直等到报告会结束，周恩来离开，才得以一瞻风采。

“我看到周恩来了！”

“周副部长跟我握了手，讲了话。我虽然站在门外，可是，比门内人的运气还要好。”

“谁说共产党‘灭绝人性’，我看共产党最讲人性，最有人情味。”

“有这样的人带头，抗日战争一定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

欢呼声轰动了一条街。

在即将结束浙江之行，就要告别浙江的时候，周恩来举办了一欢记者招待会。宣铁吾、方青儒都派了自己控制的报纸杂志的记者参加，妄图捞到在此之前没有捞到的东西。中共浙江省委对这个会也十分重视，指示有共产党员负责的报纸杂志也派专人参加，使得这次记者招待会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一次较量。

参加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报纸、杂志有：《东南日报》、《正报》、《中央日报》（驻浙江记者站）、《扫荡报》（驻浙江记者）、《东南战线》、《浙江潮》、《战时生活》、《青年团结》、《刀与笔》、《浙江妇女》、《东南儿童》、《台湾先锋》等，将近20家，约30余人。

记者招待会开始，周恩来先简述了这次浙江之行的情况。他说：“我于上月17日由皖南来到浙江，转赴浙西天目山访晤省府主席黄绍竑，面商要公，并交换意见，获得了圆满的结果。在浙西公毕后，去了一趟原籍绍兴，省亲、祭祖，了却多年夙愿，于人生也是一件快事。不久即将离浙赴赣，特借此记者招待会，向省府黄主席，向浙江党、政、军各界，向报道我此行的新闻单位及在座的各位朋友，表示深切的感谢！”

接着，周恩来回答众记者的提问。

《青年团结》社的杜青野问：“周副部长，你这次浙江之行，印象如何？”

周恩来答：“本人此行，从金华出发，途经淳安、桐庐、分水、于潜、萧山、绍兴、诸暨等县，巡视了前线并登上了天目山，印象良佳。浙东、浙西一般民众抗战情绪热烈，‘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之声到处可闻，响彻云霄。且浙西来自沦陷区域的青年干部，正磨砺以待，时作慷慨悲歌之词，有不复河山誓不休之慨……十分鼓舞人心。”

《妇女战线》社的丁浩问：“周副部长，绍兴是你的又一个故乡，你这次回去，对那里的看法怎样？”

周恩来答：“本人离开绍兴多年，此次还乡，感触良多。绍属第三区专署暨区司令部以下，有直辖政治工作队二队与妇女营、少年营、青年营等，多为知识分子所组成。他们一齐渡过钱塘江，袭击敌人，创造了振奋人心的战绩。这种大无畏的气概，这种甘于牺牲的精神，都是值得宣传，值得提倡的。我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妇女营，她们持枪杀敌，不让须眉；成队地深入敌后作战，为全国妇女带了一个好头。杭嘉湖地区和宁绍平原的妇女，素称文弱的江南人，她们都能够打鬼子建功立业，全国还有什么地方、什么人，不能够抗日打仗的呢？”

丁浩激动地说：“谢谢你，周副部长，我代表绍兴妇女，也代表浙江妇女，谢谢你！”

“周先生，敝人有一事不明：你既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到浙江来理应执行国民政府的公务，为何却频频与共党接触呢？”

大家循声看去，认得是C·C系控制的《东南日报》副社长，不禁对他这种不礼貌与挑衅感到气愤。

“这位先生好像不是上月18日晚采访我的那位年轻记者，关于我这次‘东南之行的目的与任务’，我已讲得很清楚了，且已见于贵报之报端。如果你不清楚，建议你回去翻翻你们上月的报纸！”周恩来从容而平静地答道。

“哈哈……”周恩来不露痕迹的讽刺，引得全场的人都笑了。

发问者狼狈不堪，他秉承方青儒的意志，本想投石问路，刺探一下周恩来有没有跟共产党东南局、浙江省委取得联系。不料，“偷鸡不着反蚀把米”，闹得自己下不了台。

“周副部长，据说你每到一地，都要发表演讲，每次演讲都照例要突出贵党，是不是有意要扩大贵党的影响？”

众人掉头望去，见是与宣铁吾相好的《扫荡报》女记者，一时都觉得奇怪：复兴社与C·C系不是常闹矛盾的吗？今天是怎么啦？竟互代对方提问，互相帮起忙来？

“这位小姐，一定读过蒋委员长告国民书，读过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五中全会的训词，总不会反对宣传抗日救国吧？”周恩来待对方点头认可后，接着说：“既然如此，本人利用每次演讲的机会，反复表明我党抗日到底的决心，又有什么不对呢？至于影响，要由实践来检验，由人民说了算，不一定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只有真心实意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女记者无法不再一次点了点头。

《正报》记者问：“周副部长，你对浙江的政治、党务，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答：“我感到浙江的政治党务，均较邻省生色，尤以浙西党政军

各项措施与办事人员，令人钦佩。本人曾顺便出席浙西中学的开学典礼，其热烈气氛、空前盛况，今后再也不会忘记。在日寇铁蹄蹂躏中华、硝烟遍地、炮火连天中，浙西中学能有如此规模，为国家民族培育英才，真是预兆教育界前途的好现象。希望浙江各界人士，发扬大禹治水的精神，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意志，努力工作，英勇战斗，保卫家乡，建设家乡！”

《东南战线》社记者徐进问：“周副部长，你跋涉千里来到浙江，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不知这次去后，什么时候还能再来？”

周恩来答：“这是春天的跋涉，为的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后还会有夏天的跋涉、秋天的跋涉，为的是更新、更高的目标。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祝愿你们，并通过你们祝愿全省军民，在未来的风雨中更加坚定，更加成熟。前进吧，浙江！”4月6日，上午10时，周恩来及其随从乘新四军铁篷卡车，离开金华去江西。

后记

写完了最后一页，我不禁长长地松了口气。此刻，正是凌晨零点十五分，一场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始。我这边的战斗刚刚结束，地球那边的战斗又要打响。隔着玫瑰般的夜色，我看见窗外老和山巍峨的剪影，莫非是它隔开了两个世界，又连接了两个世界？

我感到有些惭愧，直到前年准备接受这部长篇纪实文学的创作任务时，我才熟悉了周恩来的这段历史。战火纷飞的时代，救亡图存的事业，在许多雄壮生动的活剧开场与尚未开场之时，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他不畏矢石，不辞劳苦，作了一次英勇的浙江之行。我是沿着他留下的足迹，走这一段峥嵘的历程的。他用时11天，我耗时1年又66天。每走一程，都风光无限。那气氛，那声威，那风度，那谈吐，那敌忾，那亲情……都让我久久地不能平静。是这位伟人选择了历史，也是历史造就了这位伟人。

长篇纪实文学，顾名思义，是文学与纪实的结合。结构形态取长篇，基本要求是真实，表达方式要艺术。这种文件，对于我们的文坛，对于若干作家，已不那么陌生了。对于我，却是第一次尝试。我是怎样进行这尝试，并力求写出自己的特色的呢？

一是真实性。书中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甚至主要讲话内容，都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力求复制和还原出一幅幅与当时一模一样的场景和情节来，在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的本相上下功夫，将历史本色化与故事传奇化结束合在一起。这里强调的“还原”，主要是还原当时的时代气氛，当时的价值标准，当时的交际主式，当时的思维习惯。尽量运用当时的道具（如报刊等），做今日的文章；抄录当时的语言（如几次讲演），保持今昔的差距，但也不刻板，不拘泥。

二是铁饭碗侧面。周恩来是这部书稿的主角，也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言行散见于对那次难忘的东南之行的回忆录中，也散见于他的文集、文章与谈话中。如何将零散的集中在一起，就有一个排列组合的问题。每一个零散都是一个角度，注意保持其角度的独特性，对于排列组合以体现周恩来的性格大有好处。1939年的春天，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也充满了尖锐激烈的斗争，把主人公放在矛盾的焦点、斗争的漩涡，便是很自然的事。种种矛盾决定了种种关系，展示这些关系，也就展示了周恩来的各个侧面。斗争的主线，是取消（或推迟）还是坚持黄（绍竑）周（恩来）会晤；是阻拦还是实现周恩来与东南局、闽浙赣党的领导人的会见；是扩大还是贬低周恩来即共产党的影响，突出这条主线，也就突出了周恩来的智慧、胆识、意志与策略。至于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情感体验，则是通过回忆、叙述（讲故事般的叙述）、对山水文史诗词的旁征博引、唇枪舌战等方式体现出来。即有正面描写，也有侧面描写，还有着重印象、效果、反映的描写，是这一切的综合。

三是疏密度。这部书稿，以编年史形式、日记体首括，为结构主干与故事发展线索。为体现其真实性，甚至原文抄录了四五天国民党特工人员的监视记录，但又作了必要的更正与补充。一切从主题出发，从人物（主要是周恩来）出发，该简就简，该繁就繁。如三天的行程集中在一章（第六章“目标：天目山”）；3月28日在绍兴，分为三章（第十一章“倡导‘绍兴精神’”、第十二章“拜望姑父王子余”、第十三章“越王殿舌战群小”）。一般来说，在交待事件上简，在刻画心理上繁；在风俗上简，在文化上繁。周恩来的东

南之行包括了浙江之行，比较起来，浙江之行是繁，浙江之外的视察新四军军部与去江西是简。在浙江的 21 天与周恩来的一生比较，前者是繁，后者是简。把简的东西渗入繁中，做到以简驭繁，繁简结合，加上语言的节奏、语气的徐急，甚至于空白，便生成了作品的疏密度。

由于是第一次尝试，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疏漏与失误，我热忱地欢迎行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这里，特别要感谢中央党校出版社的杜世伟同志，没有他的提议与帮助，这部书稿的写作是不可能的。我还要感谢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绍兴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与省政协文史办，没有他们在史迹与材料方面的供应，这部书稿的写作也是不可能的。

1994 年 6 月 28 日于西子湖畔

1996 年 8 月改定

